

昆都仑文史第三辑目录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转载）……………周恩来

昆都仑地区历史纪略……………李绍欽（1）

昆都仑建区三十年……………李敬三（18）

昆都仑地区发展概述……………张清（23）

林荫路街道办事处成立前后……………〔蒙古族〕龙泉（35）

昆都仑区分管农业的三年……………黄安民（41）

包头钢铁公司三十年概况……………王耕樵 靳楷龄（43）

稀土之乡的一颗“明珠”……………冯建平（51）

包头第一热电厂发展概略……………保玉堂（59）

“小包钢”今昔……………高志勤（68）

记包钢的第一批开拓者……………易磐（72）

《包头日报》的变迁……………〔蒙古族〕巴奎勋（74）

内蒙古话剧团简史……………郑玢 有忠（81）

昆都仑河畔的一块绿色园圃……………秦新民（90）

邓拓包头之行及其有关史料.....	胡 晓 (96)
田间, 疾步走在沙原上.....	李 汀(110)
《聊斋志异》手稿轶事 蒲松龄第 十世孙蒲惠章在包头.....	石圭平 张树宽 刘凤荣(115)

回忆建国前后在内蒙西部区的

几次战斗.....	[蒙古族] 齐凤仪(121)
我与电影.....	[蒙古族] 汪 焯(146)
我对中蒙两国划界定桩的 回忆.....	[蒙古族] 郑林台口述 曹玉华整理(152)
追记包钢副总工程师周同藻.....	祝 福(156)
缅怀昆区文史委员希格同志.....	杜守恒(159)

血红蛋白研究专家秦文斌教授.....	朱企泰 阎充英(162)
从医五十年.....	郭体绪(170)

董其武副主席对我的接见.....	刘发林(173)
------------------	----------

本辑图片摄影: 崔晓华、穆中艺、杜守恒、孟亚力

昆都仑地区历史纪略

李绍钦

(一)

昆都仑区系因昆都仑河而得名。

昆都仑河，古代名石门水，又名呼延谷、伪为带汗谷，大约在明清两代才改为今名。

昆都仑河形成於240万年前第三世纪末，那时受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的影响，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继续抬升，山与山之间的断裂带不断下陷，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山脉和山前、山后平原，昆都仑河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

昆都仑河是阴山山脉较大的河流之一。最早记述这一地区的是《汉书·地理志》，但它只提到石门障，过分简略，无法考查其确切方位。到北魏末年，（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伟大历史地理学家酈道元注《水经》时，始有如下详尽的记载：

“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禄城。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还，诏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居幕南，保光禄，徐自为新筑城也，故城得其名矣。东北即怀朔镇城也。其水自障东南流，径临沃城东，东南注于河。河水又东径稠阳县故城南”。

文中所说的石门水，就是今天的昆都仑河。石门障，遗址位

于昆都仑河口东岸的一小土丘上。遗址东北侧即郊区边墙壕村。石门山，似乎是昆都仑水库依凭的大山——瓦窑坝。瓦窑坝是大青山的一处山脊，山脊南北都比较平缓。由于数百万年的风吹雨刷，山脊切穿了，河流穿城期间。两岸山峰高耸峥嵘，俨如石门，因以得名。古时名黑山，亦谓之杀狐山。

光绪《山西通志》卷三十称：“以（水经）注核之，临沃县在包头镇（指今包头市东河区）西，稠阳县在包头镇东”同书卷五十四说：“汉稠阳县当在昆都仑沟东之古城湾”。《山西通志》的这一考证，从古城与河流的相互关系来推断，是比较合理的。现代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均认定古城湾乡古城为汉代古城，即汉代五原郡下属的稠阳县。从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北凭阴山，南临黄河，自古以来，凡穿越昆都仑河谷南来北往的使臣、军队、商贾、各族群众，均需途经这一古城。古城实为控扼昆都仑河谷通道的咽喉之地。因此古代即以此城名这一条交通要道称之为稠阳道，又称为中道。

宋《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云州、云中县”下引隋代《冀州图经》说，周、秦、汉、魏以来，从黄河流域通往蒙古草原的道路有三条，“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可见稠阳道、中道，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交通要道。

为什么呢？因为阴山以北地区的蒙古大草原，适宜于畜牧业经济，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都劳动、生息在这块广袤的大草原上。商周时代的鬼方、贡方、玁狁、熏粥，战国时代的楼烦、林胡，秦汉时代的匈奴等，都是首先活动在这一大草原上，然后逐渐南下，与中原的华夏族接触、交往、直至融合。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说，蒙古大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

而大草原的南部有阴山山脉横亘其中，古人称它“中外大限，

常以此分。”。明《九边考》说：“自阴山而北，皆大碛，碛东西数千里，南北亦数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中国得阴山，则乘高一望，寇出没纵迹皆见，必逾大碛将居其北，去中国益远，故阴山为御边要地。阴山以南，即为漠南。彼若得阴山，则易以饱其力内易犯，此秦汉唐都关中，必逾河而北守阴山也”。《九边考》概括了阴山自古以来的历史战略地位，点明了我国汉族与北游牧民族对阴山的依存关系。汉武帝时，郎中侯应讲的一段话，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点。他说：“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则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而阴山以南地区，则千畴相望，沃野千里，东有土默川平原，西有河套平原，灌渠纵横，田畴交错。阴山山脉介于草原和平原之间，山势险峻，俨然一天然屏障，堵塞了南北交通。因此，南北交通，只能穿越经流水侵蚀的天然河谷通道。这些河谷通道中，自西起，主要有：磴口西北的狼山哈隆格乃山口（古名鸡鹿塞），乌拉特中旗狼山石兰计山口（古名高阙），包头昆都仑河谷，呼和浩特北蜈蚣坝。其中，昆都仑河谷，平坦宽阔，可通车马，又恰处阴山山脉中段，西北可至龙城，南下直达长安、洛阳（中国古都），所以是最理想的交通要道。古代称为中道，是名实相符，当之无愧的。

（二）

既然名之曰中道，那么，自古以来南北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往，自然十分频繁。随之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夹杂着无数残酷的苦难的经历。

最早见于记载的，当推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灭代国、林胡、楼烦（公元前300年）拓地至河套，在包头地区设置了九原县（今昆都仑河畔的孟家梁古城，在包钢废钢厂

内)。赵武灵王为了与秦国争雄，亲自率领官员和将士来到九原，以这里为基地，训练军队，设置马苑，屯垦农田。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南渡黄河，经鄂尔多斯、陕北高原，南下攻秦。解放后，在麻池古城发现了大批赵国布币和“安阳布范”（铸造有“安阳”二字钱币的模子）；大青山、乌拉山南麓，有赵国修筑的长城遗迹，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匈奴强大，占据了今包头和伊盟地区，直接威胁着秦国京城咸阳，加之方士对秦始皇说：“亡秦者胡也”。於是秦始皇加意防胡，於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匈奴，占据了阴山、北假（今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地区），改赵九原县为九原郡，郡址仍然设在九原县，下属四十四县（一说三十四县），管理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又在全国征调劳力，修筑长城和直道，屯垦农田。秦长城遗址全国只有包头境内的一段（固阳县北色尔腾山山岭上），还保存完好。秦长城南侧，有许多城障，如增隆昌古城，大乌兰古城，小召门梁古城、梅令山古城等以及许多烽火台，至今遗迹犹存。秦直道，从云阳至九原郡，全长一千八百里（相当于今一千四百里）。经过一些专家的考证和陕西交通厅史志办去年的实地考察，其路线大体上是：

南起陕西淳化县秦林光宫，沿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主脉正脊北行，到黄陵县沮源关。沮源关以上，经子午岭支脉的富县、甘泉、志丹，折向安塞、子长，在榆林县北入鄂尔多斯草原，再北行至包头市西，秦九原郡郡址。

蒙恬的军事指挥中心设在上郡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而他的前哨阵地是在九原。以九原为中心的北方边防网络，西南通至陇西（今甘肃临洮），东至辽西、辽东（今辽宁省凌源、辽阳）。从这一军事布局看，昆都仑沟当时既处军事枢纽之地，车水马龙，当是十分繁荣了。

汉朝初年，匈奴又复强大，南下占领了河南地（今包头和伊

克昭盟地区)，直到汉武帝时，汉朝国力恢复，才开始反击匈奴。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郡（今托克托县土城子乡）出兵，西北行，收复九原郡，途经昆都仑沟，至狼山高阙，又夺回了河南地。武帝改九原郡为五原郡，又将五原郡的西部地区（今巴彦淖尔盟和宁夏北部）划出来，增设朔方郡。五原郡的郡址仍在九原县。

五原郡鼎盛时有户39,322户，口231,328人。下属十六个县：九原县、固陵县（今址不详）、五原县（今哈德门沟口左岸古城）、临沃县（今麻池古城）、文国县（今址不详）、河阴县（今昭君坟二狗湾古城）、蒲泽县（今址不详）、南兴县（今准格尔旗东魏家峁）、武都县（今准格尔旗北蓓亥树湾一带）、宜梁县（今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乡三顶帐房古城）、曼拍县（今达拉特旗东南马场壕一带）、成宜县（在三顶帐房古城之西）、稠阳县（今郊区古城湾古城）、莫黑县（今址不详）、西安阳县（今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岸）。

五原郡还有三处都尉驻所，即田辟、西部都尉治所（今乌拉特前旗公庙子古城）、原亭、中部都尉治所（今乌拉特前旗堡子湾古城），付阳城，东部都尉治所（今址不详，大约在哈德门古城与三顶帐房古城之间）。蒲泽县是五原郡的属国都尉治所，是专门管理匈奴降户的机构。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共采取了十二次大的军事行动。其中从昆都仑沟出兵的有五次，五支军队；

元光六年（前129年），公孙贺将万骑出云中；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出云中至高阙、陇西；

元鼎六年（前112年），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

天汉四年（前97年），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出五原；

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至郅居水（今色楞格河），后来全军覆没了。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元封元年（前110年）冬十月，汉武帝置十二部将军，勒兵十八万骑，亲帅师行，至单于台，向匈奴单于显示军威。这次行军路线是，经秦直道，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据史书说，这次出师，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既然经过五原郡境内，其具体线路应是：穿过昆都仑河谷，西北行，经营家窑子、大十分子、格尔此老至石哈河。由此西行至朔方郡境内的北河（今乌加河，是古代黄河河道）。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两条道路可达北河，一条是出昆都仑沟后东北行，经固阳县城、西斗铺、红泥井至石哈河、北河。这样走就绕道了。另一条是出昆都仑沟后西行，经明安川至大余太，至北河。但这一条路线不可能“出长城”。单于台的方位大约在今石哈河一带。

这样威武壮观的一支军队，在二千多年前经过昆都仑河谷，恐怕是这条河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事。武帝至单于台后，派遣使者郭昌风告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下，而今单于能够与汉作战，天子自将兵待边等候；不能，即南面向汉称臣。何若远走漠北苦寒无水草的地方去呢？单于大怒，立斩负责接待使者的官员，留下郭吉，让回去。

汉宣帝时，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遭其兄郅支单于的突然袭击，部落溃败，南下附汉。甘露二年（前52年），到五原塞来，要求明年正月至京城朝见汉天子。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接他，到长安后宠以殊礼，赏赐给许多礼物；单于表示自愿留居光禄塞下。呼韩邪单于朝长安，是经昆都仑沟到五原郡，从五原至长安。甘露四年（前50年），呼韩邪单于又一次去长安朝见汉天子。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又请求朝长安，声称自愿为汉家婿，元帝将王昭君许配给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和亲”。昭君和亲出塞，途经什么地方呢？从麻池古城附近发现《单于天降》、《单于和亲》的瓦当来判断，出塞时也应

是经过昆都仑沟，走中道北上。

自呼韩邪单于附汉后，汉匈关系十分融洽，使者往还不绝，汉朝从五原、云中两郡运去大批粮食接济他。呼韩邪之后又有两个单于先后去长安朝汉天子，边境安宁六十余年，人民安居乐业，昆都仑沟成为双方友好往来的通衢。

西汉末年，王莽破坏了汉匈关系，派大军征讨匈奴。其中驻扎在五原的这一支军队，严重骚扰人民，引起了五原人民的起义。王莽灭亡后，匈奴支持卢芳，割据今内蒙西部山西北部地区，建都五原，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由於长期战乱，到东汉光武帝建武16年（公元40年）收复这一地区时，人口减少到二万二千多人，“障塞破坏，亭坠绝灭”，正是一片荒凉景象。

进入东汉后，匈奴内部分裂，游牧于南边，管辖八部及乌桓之众的右翼鞬（音郁尖）日逐王比，被拥立为呼韩邪单于（比是呼韩邪单于之孙，效法其祖父，故也名呼韩邪），率领部下四、五万人，於建武24年（公元48年）到五原塞来，请求归附汉朝。汉朝收他们安置在五原郡的西境，后来又迁到云中，美稷（今准格尔旗纳令乡）赏赐甚厚，还运去大批粮食、牛羊，赈济他们的灾荒。直到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约四十年间，南匈奴社会生产逐渐恢复，人丁兴旺，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多。而在这同时，北匈奴由于连年天灾和遭受周围各族的攻击，生产萎缩，内部分崩离析，不断有部南下投奔汉朝。这些南下的部落，多数都是到五原塞来。如章帝建初三年（公元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到五原塞归附。章和元年（公元87年），北匈奴大乱，五十八部，口二十万南下投汉，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到五原塞来归附。可见，五原塞、昆都仑沟这时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

南匈奴附汉后，并不是一切皆通畅无碍，由於边关官吏的大国思想等多种原因，曾发生过许多次的叛乱。叛乱部落往往北奔

漠北，因此，五原地区，为镇压叛乱，也发生过多**次流血屠杀事件**，这就不详细介绍了。

由於北方边塞地区在汉朝末年逐渐成为以匈奴、鲜卑、乌桓各族的游牧地，因此，东汉朝廷逐步撤并郡县，顺帝永建五年（公元140年），徙朔方治五原，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撤销五原、云中、朔方、定襄四郡建制，将百姓迁至山西，置新兴郡以统辖之。因此，我们说三国时代的吕布是五原郡九原县人，也即今昆都仑河畔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桓灵时人，那时五原郡尚未撤销。

下面介绍鲜卑族中的一支——拓拔鲜卑。

鲜卑族原来居住在大鲜卑山（今鄂伦春旗境），后来不断向西南迁徙，到东汉中叶（公元120年），便迁到了雁门、五原来，与南匈奴军队，汉朝的军人经常发生战斗。公元二世纪中期，鲜卑大人檀石槐尽占有匈奴故地，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立单于庭，分其地为三部。西部部落中，有一支名拓拔鲜卑的，活动在五原西部，首领诃汾是檀石槐部落联盟中的西部大人之一。三国魏文帝时（公元220—225年），部落大人力微，遭到其他部落的侵袭，部众离散，被迫依附於强大的没鹿回部大人**奚宾**。奚宾居住在五原（今昆都仑河）一带。力微也率部住在这里。奚宾死后，力微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吞并了他的部众，势力强大，拓地益广，成为魏国的边患。力微在五原居住了近四十年，於公元258年移居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北土城子），组成了一个以拓拔氏为首的部落大联盟，控弦之士达二十余万。后来这个联盟几起几落，直到公元386年，拓拔珽当了部落首领，始逐步征服北方各部，建立北魏王朝。

在力微时期，蒙古草原遭大水灾，先后有三十多万匈奴和杂胡入塞，并迁至内地。这是我国历史上著称的民族大迁徙时期。五原郡地处中道，所以迁到这里的部落很多，从这里迁走的也很

多。据专家们考证，这些迁徙的十九种部落中，最著名的屠各种，南匈奴异姓贵族须卜氏，都曾在五原一带住牧。建立夏国的赫连氏铁弗匈奴，也长期在五原及伊盟一带活动。

拓拔珪建立北魏王朝，在他立国的三大决定性战役中，有两大战役就是在昆都仑河口的五原进行的。

一次是与铁弗匈奴刘卫辰之战。铁弗匈奴驻牧在鄂尔多斯一带，一直与拓拔部争夺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战争不断。公元386年，铁弗匈奴部首领刘卫辰派儿子直力鞬率兵五万，占领了五原，并沿昆都仑河北上，攻至黑城（今武川县境）。拓拔珪率兵击败了直力鞬，缴获了他贮藏五原的粮食，又从金津（今黄河昭君坟渡口）渡河南下，彻底消灭了刘卫辰父子。

一次是与后燕之战。公元395年7月，后燕（都城在河北定县）国主慕容重派太子慕容宝统兵八万，进攻北魏。燕军一直打到五原，但是却找不到魏军主力决战，驻师五原三个多月，天气凉了，士兵还是单衣，便急于返回去。原来准备把魏在五原的一百多万斛（一斛约二斗）粮食运回去的，也顾不上了。11月初，慕容宝烧船夜行。那知天气骤冷，黄河结冰，拓拔珪率兵乘机东渡河追击，在参合陂（今凉城县境）彻底击溃了后燕军，活埋了投降的四、五万人。之后，拓拔珪南下山西、河北，消灭了后燕国。

还有一次是与高车之战。高车住在贝加尔湖一带。公元399年，拓拔珪三路出师，大破高车，俘虏了九万多口，安置在阴山和五原一带。这次战争虽然不在五原进行，但降户却安置到五原了，所以说五原应是北魏的发祥地。

北魏初年，多次进攻高车，虏掠其人口几十万，都安置在阴山和五原一带。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描绘高车人在这里生活的优美牧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整个敕勒川那时是个大牧场，但五原昆都仑河流域，却是北魏的农垦区。酈道元《水经注》说：“水上承大河于临沃县，东流七十里，北溉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临沃县即麻池古城。在麻池古城东七十里，南北二十里的范围内，都是引水灌溉的农田，有农户三万余家。可见其农业的殷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原又是北魏的后方基地。

北魏初年，乌拉山名跋那山，许多柔然族人居住在这里，他们先后都被北魏歼灭了。等到北魏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后，柔然族又在蒙古高原出现。他们背拊北魏，严重威胁它的安全。因此，历代北魏皇帝都北巡阴山，狩猎五原。据统计北巡达三十多次，亲自率兵征讨柔然有十七次。当时，五原一带飞禽走兽很多，是一个天然猎场。北魏的皇帝们曾多次到这儿打猎。公元413年，明元帝拓跋嗣在这儿校猎，一次就获兽十万。

柔然汗庭设在鄂尔浑河畔，因此，从五原率师出石门水（昆都仑河），是当时北征的主要路线，称为中道。北魏太武帝、献文帝等皇帝每次出师，均从这里出发，北至怀朔镇（今固阳县白灵淖乡城圈鬮村）。怀朔镇是北魏为防御柔然，修筑在阴山北麓的六镇之一，也是六镇中最重要的一个镇。从上述史实中，可想而知北魏时期，昆都仑沟车马啸鸣之景状了。

北魏末年（公元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起义队伍是戍守北疆的各族官兵。起义先从沃野镇（今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发难，得到各镇的响应，势如燎原。起义军攻打怀朔、武川二镇，在五原和白道多次挫败北魏大军，还把北魏广阳王元渊、侍中李崇的大军重重包围在五原城内。后来由于柔然军队的援助，起义军战败，数十万人南渡黄河，被迫投降，迁到河北、山西一带驻扎。谁知这支义军成了星星之火，走到那里，便在那里迅速掀起新的起义浪涛，促使北魏灭亡。这支义军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以怀朔镇官兵为骨干，一支是以武川镇官兵为主体，建立了北

齐北周两个王朝。后来北周消灭了北齐，杨坚又篡夺了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

柔然汗国於公元552年被从西方兴起的突厥所消灭，强大的突厥汗国建都於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成为北齐、北周争相交好结欢的对象。双方倾府藏之财以讨好突厥，仅每年馈赠的缙絮绵彩就有几十万段。诚如突厥他钵可汗所说：“但使我在南边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耶！”突厥所获得的这大批丝绸，除自己享用外，大量地运销到波斯、罗马诸国。当时昆仑沟恐怕是运送丝绸的主要通道之一。

隋文帝建国后（公元581年），改变了北齐、北周的政策，多次派兵到阴山地区征讨突厥，终于迫使突厥归顺了隋朝。因此，今昆都仑地区当时是突厥族人游牧的场所。

唐朝初年，突厥又复强大，分为东突厥、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与突厥在铁山（今白云鄂博）打了一仗，消灭了东突厥。这次大战中，唐李勣的一支军队，很可能是从昆都仑沟北上，到今乌拉特中旗的磴口，堵住从铁山败逃的突厥颉利可汗，对消灭东突厥立下了卓越战功。

到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裴行俭率三十万大军征讨突厥，在黑山（又名呼延谷，即昆都仑河谷）大破突厥阿史那泥孰匐。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趁突厥默啜可汗出兵新疆之机，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受降城，占领了阴山地区。其中中受降城建筑在呼延谷南偏西八十里的拂云堆祠。拂云堆祠是默啜可汗每次出兵打仗前，到那里祭酹求福的神祠。可见默啜可汗曾在距昆都仑沟不远之处设立过牙帐。中受降城的地址，考古学界初步考证在三顶帐古城。后来，大批突厥降户归顺唐朝，被安置在沿边一带。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伊克昭盟境内的突厥降户反叛，将军郭知运尾追至呼延谷，大破叛军。

突厥灭亡后，回纥统治了漠北。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纪》中记载了通往边境和国外的七条主要交通干线。其第四条为中受降城入回纥道，“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纥使所经，又五百里到鹑鹑泉，又十里入磧，经……八百里至燕子井，又西北……七百里至回纥衙帐。”

从所记呼延谷至鹑鹑泉五百里度之，出昆都仑沟后，系城明安川上，经小余太、石哈河、新忽热至索伦格尔，再西北行到鹑鹑泉，恰为五百里。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中兴名将郭子仪以左卫大将军身份，在木刺山（即乌拉山）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驻防。因此，当安史之乱时，郭子仪与回纥兵曾多次在呼延谷会师，南下平叛，立下了卓越功勋。所以唐朝每年酬赏回纥二万匹缯彩，还先后下嫁四个公主与和亲，并在西受降城开设马市，以匹马四十匹绢之值进行交易，每年付绢几十万匹。所有这些政治、经济的往来，都得经过昆都仑沟，当时，这条沟中，车水马龙，有的车队竟达一千多辆。可以说，中受降城道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毫不夸张的丝绸之路。

（三）

辽、金、元时期，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没有遭受过大的破坏。由于各族的大迁徙和政权的更迭，这里形成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以汉族为主，还包括了突厥，回鹘（即回纥）、鞑靼、吐谷浑、沙陀、奚、党项、蒙古、汪古、契丹、女真等许多族。辽、金、元三代，京城远在东方（今宁城和北京）政治中心东移了，这里的位置就偏处西阳了，也不再是通往漠北的孔道了。当时，从辽、金的京城至西夏国都（中兴府，今银川市），一段横

穿伊盟中部，不再经昆都仑沟了。所以，尽管这一段历史将近五个世纪，但涉及昆都仑地区的史料偏缺，可资记载的历史事件很少。

直到明英宗正统末年（公元1449年），蒙古许多部落先后迁徙到河套驻牧，明朝撤销了设立在土默川的卫所和州县，这一带才由农业兼牧业区变为纯粹的畜牧业地区。蒙古各部落封建贵族之间争夺权利，相互火并。直到弘治年间（公元1500年前后），达延汗继位后，在东部科尔沁部的支持下，才逐步消灭了各部封建领主，统一蒙古。原来驻牧在土默川的是由首领脱罗干率领的满官嗔部。脱罗干子火筛继位后，一度势力强大，给明朝山西、陕西边界造成很大威胁。满官嗔部蒙古语称蒙郭勒津部。达延汗统一蒙古后，收蒙郭勒津部划归他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统辖。巴尔斯博罗特又封他的次子阿勒坦（明史称俺答）统属这个部。在这以后，蒙郭勒津部名逐步被土默特部名所取代，蒙郭勒津部成为土默特部落集团下的一个属部。阿勒坦汗势力壮大后，又收蒙郭勒津部划归其孙把汉那去统治。把汉那去驻牧在哈朗兀，在阿勒坦汗衙帐大板升城之西，大约在今土右旗水润沟门一带。其辖境可能至昆都仑沟，因为乌拉山及其以北地区，当时属哆啰土蛮部统辖。

阿勒坦汗骁勇善战，武功卓绝。他曾六次征讨兀良哈（住今贝加尔湖东西的蒙古种部落，明史称黄毛达子），四次进军青海，征服卫郭勒和撒拉卫郭尔，还多次征讨瓦剌四部（新疆）。这许多次的北征和西征，多数都要经哆啰土蛮。所以在阿勒坦汗时期，昆都仑沟是他行军的主要通道。阿勒坦汗孙扯力克袭封顺义王后，土默特部落集团中，许多部都派兵至青海，甚至扯力克也被部下怂恿着移师青海。他们的西行，也都经昆都仑沟，移壁哆啰土蛮后才出行的。

明朝末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兴起，征服了土默特部，强

役属之，土默特部人四散逃亡。清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五月，皇太极征林丹汗到达归化城。土默特部首领俄木布，托博克、古禄格、杭高归附清朝。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土默特部被编为二旗。

为了防止喀尔喀蒙古的入侵，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乌拉特部移驻今乌拉特三旗境内，奉命镇守昆都仑沟、哈达门沟、木纳忽少（今乌拉特前旗所在地西山咀）等三处险要隘口。

乌拉特部本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五世孙布尔海的后裔。布尔海游牧于呼伦贝尔，号所部曰乌喇特。布尔海后分所部为三：长子赖噶之孙鄂木布、幼子巴尔赛之孙图巴，曾孙色楞领其众。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归顺清朝，顺治五年，叙从征功，以图巴掌后旗，封镇国公，鄂木布子溥班掌前旗，封镇国公，色楞子巴克巴海掌中旗，封辅国公，各授扎萨克，世袭罔替。三扎萨克同驻哈达玛尔（今哈达门沟内），隶乌兰察布盟。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夏五月，内大臣索额图率一万大军，马二万多匹，出使俄罗斯，就是从昆都仑沟北上。五月二十一日经过这里，二十三日从后口子出发，进入喀尔喀后，恰逢新疆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的大军击败喀尔喀土谢图汗、东臣汗的军队，其部众溃散沿途奔跑。使臣无法前进，才折回张家口。这是清朝初年最早见载的有关昆都仑的一则史料。

从范昭远《从西记略》载：“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六月十九日……已刻抵箔头，……二十日抵坤都伦……。七月“十三日……回至坤都伦下营，十四日午刻至萨尔沁（即今沙尔沁村）。“八月”初五日，晴和，未刻抵坤都伦安营……初六日，晴，未刻抵坤都伦北口……”。“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雪霁，颇冷，行五十里，至第六台坤都伦下营……坤都伦在西南五十里为黄河经渡处……”。

从上述记载可知，昆都仑沟南口当时就有人家和村落了。因

为在这里建立“第六台”，若没有相当数量的人家，则无法支应台站的人马差役和开销。那时第七台明即安安量的台梁，台梁是清朝囤集军事物资的重要仓库所在地。

范昭遂建立台站，是为征讨厄鲁特蒙古莱旺阿拉布坦而设置的。其实早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朝就自杀虎口至乌拉特设置了九处台站。到乾隆三十四年，又从乌拉特大路外起，设置了七处台站。因为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同治时期，均因新疆发生叛乱，而多次从喀尔喀出兵。虽然主要行军道路是阿尔泰军台路（从张家口经四子王旗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但昆都仑沟这条台站道路，也是重要交通道路之一，是有事实根据的。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噶尔丹袭喀尔喀，乌拉特旗曾选兵驻防归化城。三十五年，乌拉特军队随大将军伯费扬古出征，在昭莫多（今乌兰巴托东南）大败噶尔丹。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清军剿噶尔丹策零，又选兵备边。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清军剿新疆达瓦齐，又购买骆驼马匹支援军队。五十四年，所部歉收，以呼坦和朔（今托克托县境）储粟赈之。同治七年，甘肃回民起义，义军进至明安川一带。清朝派大同镇总兵马升督兵防驻昆都仑沟和台梁一带，镇压回民起义队伍，直至同治十年，才把这一起义镇压下去。

乌拉特部的放垦最早。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就已将黄河沿岸的牧地放给汉民耕种，麻池一带是垦荒最早的村落之一。到了清朝后期，这里已是有名的产粮区了。同治年间，清军金顺、张曜、尧湘、卓胜等进剿回民起义军各营，都是靠在这里购买军粮，供应军需。同治皇帝於九年六月特谕绥远收军定安，劝乌拉特居民赶兴耕作，以裕足食之源。清朝末年，贻谷主持绥远垦务后，又大量放垦昆都仑台膳台地等多处地段。乌拉特旗的土地便大量开辟为农田了。

一九八七年三月五日脱稿

〔参考书目〕

-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班 固 〔汉书〕
司马迁 〔史记〕
郦道元 〔水经注〕
 光绪《山西通志》 〔中国历史地理图集〕
乐 史 〔太平寰宇记〕
魏 焕 〔皇明九边考〕
葛伯赞 〔内蒙古访古〕
 〔战国策〕
史念海 〔闻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交通史资料》
内蒙古文物队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文物资料续辑〕
邱树森 〔两汉匈奴单于庭、尤城今地考〕
 〔社会科学战线〕84.2,
范 陆 〔后汉书〕
魏 水 〔魏 书〕
李延寿 〔北 史〕
王仲犛 〔魏晋南北朝史〕
吕思勉 〔胡 考〕
马长寿 〔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
司马光 〔资治通鉴〕
李万荣 〔北齐书〕
令狐德 〔周 书〕
薛居正 〔旧唐书〕
欧阳修 〔新唐书〕
李吉甫 〔元和郡县志〕
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

张廷玉 〔明史〕
瞿九思 〔万历武功录〕
朱 健 〔古今治平略〕
王士琦 〔三云筹祖考〕
 明实录〕 〔明经世文编〕
萨囊彻辰 〔蒙古源流罗卜藏丹津 〔黄金史〕 〔黄金史纲〕
珠荣嘎译〔阿拉坦汗传(蒙文) 贡布扎布〔恒河之流〕
 〔蒙古史论文选集〕
 〔土默特史料〕
赵尔巽等 〔清史稿〕
祁韵士 〔皇朝藩部要略〕
魏 源 〔圣武记〕
包头文管所 〔包头文物资料〕第一辑

本文作者李绍钦，原包头市地方志史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

昆都仑建区三十年

李敬三

昆都仑区，是建国后随着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区。

1956年8月22日，包头市正式设立昆都仑行政区；同年11月，经首届第一、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昆都仑区人民政府。迄今为止，昆都仑区已有三十年的光辉历程。这三十年，是团结、建设、向上的三十年；是全区各族人民不断开拓前进，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艰苦奋斗的三十年；是道路曲折、成果显著的三十年；也是取得正反两方面之丰富经验教训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在昔日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塞外阴山下，建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文明整洁的现代化城区，这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区各族人民血汗之结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十年来，昆都仑区翻天覆地之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在昔日的荒滩上，已建成了比较完善的以钢铁和稀土为主体的新型工业体系，结束了内蒙古历史上手无寸铁的局面，为祖国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我区地方工业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具有45个比较大型的工业企业。区属工业也已初具规模，同时，全区实现了有中央、内蒙、市属、区属四级工业企业的城区，地区职工发

展到163700多人。

二、全区建筑业基本形成一个以二冶为主体，地方市属、包钢属、区属集体建筑业为骨干的多功能、多层次、成龙配套的建筑业体系。全部职工达30,0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3000多人。

三、交通、邮电、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邮电业达到国内同类地区先进水平，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商业网点已达2,900多个；从事第三产业的职工人数有13100人，年成交额达1.67亿元，占地区总产值11%。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国营、集体商业、服务业为主导，以大中型批发零售业为骨干，以个体商业、服务业为补充，具有较强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第三产业网络。

四、全区已拥有一支包括钢铁、稀土、化工、建筑、矿山机械、医学专业在内的科技队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14198人（其中自然科技人员10036人，社会科学人员4162人）占全区职工总数的8.7%；全区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所，已发展到114所。在校生人数71,486人，占全区人口的24.65%，教职工8228人，占地区职工人数的5%；初等教育已经得到普及，职业技术教育有很大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医疗卫生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得以保障。

五、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取得了很大成绩，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狠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好转。

七、党的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出现了各族各界团结协作、和睦相处、共同奋斗的新局面。

八、坚持改革，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昆区的历史上，前无古人，这是全区各族人民引以为自豪的。这些成绩，无不证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无不证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一九八六年，我们继续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经济的大好形势。我们在坚持改革、发扬愚公精神的思想指导下，在全区范围内普遍推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由于全区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特别是由于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在改革和建设中不断表现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我们各项工作又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主要表现是：

（一）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建设的稳定发展。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2688.3万元，比上年增长9.3%，比一九八〇年翻了一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6479万元，比年计划增长了8%；财政收入创造了历史新水平，突破了两千万大关，完成了2066.6万元，比上年增长了29.4%，比一九八〇年翻了两番半；集市贸易成交额完成19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46%。个体经济已发展到年营业额1198万元，个体工商户已达2016户，比上年增长了24.8%。

（二）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卓有成效。今年内，为改变广大群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区委、区政府又为群众扎扎实实地办了21件实事，包括新建、购买职工宿舍；新建、翻建职工学校、蒙小教学楼；新建、改建居民区下水管网、厕所以及商业街、阿尔丁大街游园等大中项目；为绿化、美化城区，今年植树84万余株，种花草21万多平方米，荣获了市政府设立的“市花、市树”杯奖。城市管理走上了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内蒙“阿吉奈”赛检查团来我区检查工作后，肯定了我区在城市建设工作上有八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卫生“两赛”评比中，我区继续保持了“阿吉奈”赛甲级组水平；在包头市“银鹿赛”中，获

得第一名；在防疫天鼠方面，我区“一役达标”，受到中央爱卫会专家的好评，达到国家级先进水平。

（三）全区党风又有明显好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全区99%的共产党员能够遵纪守法办好事；区属单位2894名党员中，没有发生一起大的违法乱纪事件，广大共产党员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93%的党支部成为团结战斗的堡垒。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都达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改革的浪潮中，广大党员、干部走在了前列，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特别是经过整党、整顿纪律工作，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党性观念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我们坚持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紧紧依靠驻区、区属各单位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力量，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教育和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区文明单位今年达到246个，占全区580个单位的43.2%。内蒙精神文明建设检查团来我区检查验收时，给予了较高评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了新成效，全年全区发生各类刑事案件415起，比去年又少发56起，下降了11.9%，比一九七五年全年发案数1348起，下降了二倍还多；破案率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一般案件破案率达到78.3%，重大刑事案破案率达到90.9%；帮教覆盖率、列管率、控制率、熟知率均达到98%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完成了市里下达的各项承包协议任务，取得了稳定好转的成绩。

此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民兵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幼儿入园率达到65%；小学“四率”达到了厅颁一类标准；初中巩固率达96%，入学率达95%，合格率达90%；高中入学率达61%，合格率达80%，升学率为3%。职工

教育实行了岗位培训，职业技术教育按计划进行岗位培训。为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了每本20万字的《鹿原》文学选两部，编印出版了《鹿原》文学报4期，丰富了我区文化生活。成立了医学协会等科技组织，制定了科技进步奖励条例和科技成果管理条例。开发引进了新产品；大力开展了各种群体活动，参加者占职工总数的30%以上；设立了老年活动室2个，活动场所一处等，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三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全国一样，我区无论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形势都是很好的。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我们体会到：要想取得工作上的进步和事业上的成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市管理和服 务为重点；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有一个与驻区各单位、各方面，特别是与包钢、二冶等大单位关系协调、融洽的环境；必须坚持做好各方面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的团结、领导班子的团结；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本文作者李敬三，系中共昆都仑区区委书记

昆都仑地区发展概述

张 清

昆都仑区地处土默川平原之西、河套平原之东的阴山南麓昆都仑河下游冲击扇地带，南濒黄河，东连青山区，西部、西北、西南均与郊区毗邻。城区东至青山区民族东路，西至包钢厂区以西的张家营子，北至昆都仑召庙和西水泉，南至包头第二化工厂，城区面积39.95平方公里。昆都仑区所辖包钢黄河水源地、沼潭、阿吉拉、张家营子等地区均分别深入于郊区哈林格尔、麻池、哈业脑包等乡，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原昆都仑河沿岸、郊区所辖的南牌（“牌”后来讹书为“排”）村、西河墁、孟家梁、龙银所、曹家营子等稀疏村落，均为城区（厂区）囊括，部分已按城市建设规划要求搬迁拆除重建。因昆都仑区最初新建于南牌村附近，故建区初期，人们习惯地称昆都仑区为南牌。

据考古发现鉴定，包头地区系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4,000多年以前包头已有人类生息活动。自有文字记载起，这里曾有鬲方、鬼方、土方、荤粥等少数民族活动，战国时属赵，为九原县，隶云中郡。秦改九原县为九原郡治。汉初匈奴南侵为游牧地，武帝时改九原郡为五原郡。东汉时，南匈奴附汉，这一带为游牧地。汉末及三国时，乌桓、鲜卑崛起，鲜卑族建立北魏，沿阴山置北边六镇，该地区为怀朔镇辖。后改朔州，为广宁郡辖地。隋唐之际，为突厥族游牧地。唐中宗景龙二年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昆都仑区西，这里为安北都护府及天德

节度治所。五代属辽，置云内州，隶西京路，金因之。元代降为下州，隶大同路。明初为云内州，后改云内县，属丰州，后又为阿拉坦汗属下之游牧地，清初为绥远将军辖境，乾隆初隶萨拉齐厅，后形成村落，为包头村，嘉庆十四年，包头村改为包头镇，直至民国，多有变迁。1938年改为包头市。解放后，旧包头于1953年为自治区直辖市，南牌为郊区所辖。1956年昆都仑区建立行政区，1958年包头市人民委员会迁入。

如今包头已成为全国十三个较大城市之一，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和稀土生产基地。作为包头市一个新兴工业区昆都仑区，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发展，规模宏大，市容整洁，街道纵横，商贾繁华，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已成为包头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中心，为中外时人所仰慕。置身于八十年代的草原城区，不禁催人回顾起这个北疆新兴工业城区的建设历程。

昆都仑区的兴建是与包钢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的。自从1927年7月，我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以后，就予言“此地要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并设想修筑白云鄂博至包头的铁路线，在包头附近建设一个钢铁企业。此后，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前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曾进行过多次踏勘、采集标本与研究。解放后，1950年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白云鄂博地质调查队一直在进行着详细的调查研究。

包钢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从1953年到1957年，包钢实现了“三年勘测，两年设计”的目标。1953年初开始筹建，同年3月，包头市成立了城市建设委员会，4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包头筹备组成立，与石景山钢铁厂设计处合署办公，4—5月，筹备组开始了选择厂址。同时石景山钢铁厂设计处副处长郝晋诗等11人受包头筹备组派遣到包头组成包头办事处，当时办公地点设在包头市（现东

河区)和平路155号。6月15日,包头筹备组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同时在京的7名工作人员也在西直门外太平庄处一栋宿舍楼办公,8月增到51人,11月增到117人(1954年初迁至大茶叶胡同19号办公),同时在包头的工作人员增到372人。12月初,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共有职工581人,其中北京147人,包头434人。经过反复勘测选择,1954年6月,包钢厂址确定在昆都仑河西宋家壕一带。1954年5月1日,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改名为包头钢铁公司。6月,包头钢铁公司在今东河区南门外开始兴建临时办公大楼和单身职工宿舍,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这是包钢成立后开工的第一项工程,到11月竣工,各处室分别由财神庙街72号、牛桥街18号、和平路115号等处迁往办公大楼,单身职工也分别从吕祖庙、新巷子21号等处迁往新住宅。6—7月,包钢公司各部门由北京迁来包头。1955年,勘察大队在西河拐附近沙滩上架起几座帐篷居住办公。2月,支援包钢建设的第一批来自鞍山的人员,包括领导干部、工程师、技术人员及各工种的工人到达包头。3月中旬开始进行全面施工准备和福利区建设。

当时包钢第一个工地在昆都仑河东今66号街坊西侧架起工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盖起了一栋平房。不久因建筑位置不符合未来城市规划要求,又搬到今青年路19号街坊(原大红门)西侧新建了最早的几栋青砖平房住宅(工人宿舍)和材料仓库、临时邮电所等。这是荒原上建起的第一批房屋,为大批建筑工人进入包钢工地创造了条件。翌年,鞍建公司在这一带住宅区正式开始办公,包钢附属企业现场设计工作组就设在“大红门”东侧的平房。勘察大队也从西河拐帐篷搬到这里。为了解决来自全国各地建设包钢的职工与家人的联系,互通信息以及职工阅读报刊的需要,于本年4月在包钢工地建立了第一个邮电机构“包头市邮电局南牌地营业处”。11月,营业处搬到了他们最早自建的白彦道邮电所(今恰特汽车终点站北),1956年9月改为昆都仑

区邮电局。1955年7月下旬，鞍钢建设公司在包头南牌地（今昆都仑区）成立包钢建设筹备处，负责施工基地的筹备工作。同年秋季，建在中苏大街19号街坊的鞍建职工子弟小学开学。这是荒原上最早建起的一所小学。经过长时间反复探讨与争论，同年8月，最后确定包钢住宅区建在昆都仑河东。当月，包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和部分鞍建队伍合并，成立鞍山冶金建设总公司包头分公司。11月党中央批准了包头市城市规划方案。12月，鞍建包头分公司和鞍建本溪分公司合并，成立包头冶金建筑总公司。1956年初，由包头旧城（今东河区）至包钢职工住宅区的混凝土公路建成通车。同年3月，民用建筑开工兴建。5月间，国家公路总局开始兴建昆都仑河中桥。6月，包头至白云鄂博的铁路开始铺轨，年底完成。11月，包头至石拐的铁路正式通车。本年7月份，包钢已完成在昆都仑河西张家营子兴建27,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8月下旬开工增建的40,000平方米的平房住宅工程于10月底完工，同时昆都仑区住宅区供水管道工程于10月开工。到年底，生活区兴建生活福利设施140,000平方米。至此，生活福利建筑已达250,000平方米，其中住宅230,000平方米。1956年12月，包钢工程技术处、设计处、财务处、设备处由东河区包钢临时办公大楼迁至昆都仑区28号街坊家属住宅办公，到1957年4月，公司机关全部迁至昆都仑区。当时在乌兰道北28号街坊新建的过度性的昆都仑区邮电局也于本年4月建成，到年底市内电话实装门数达到350户。1957年3月，包钢已有职工1,972人，鞍建有职工11,579人。同年7月，昆都仑区81号街坊竣工，92号街坊开始施工，同时包钢开始建设厂区。到11月底，包钢民用建筑累计已有147,687平方米交付使用，其中住宅建筑为145,510平方米。到年末，全年民用建筑共达391,500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349,041平方米。这是住宅建筑速度最快的两年。1958年包钢开始了大规模建设，年末职工达29,146人，同年完成了67、68、101、102、

103、104、56、57等街坊的民用建筑。这是包钢初建时期的概况。

根据包头市城市建设规划方案的要求，在兴建包钢的同时，开始了市政建设。1955年初，建筑与支援昆都仑区建设的单位陆续来到南牌，当时职工总数不到三百人，加上东牌（赵家营子）、新华两乡农民约三千人左右。同年成立了南牌派出所（后来的第四派出所）和四个居民委员会，即劳动路一、二居委会，昆都仑路（现址不详）一、二居委会。6月成立新区办事处，8月22日新区办事处撤销，分别成立了昆都仑区办事处和青山区办事处。郝志恒任昆都仑区办事处党委书记兼主任，开始筹建区人民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同年8月，昆都仑区公安分局成立。11月19日，昆都仑区召开首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总结了昆都仑区建设以来的工作情况，选举产生了昆都仑区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郝志恒当选为区长。当时昆都仑区办事处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乌兰道北28号街坊（今市交通大队占）一座平房院内。到年底，增建了七个居民委员会，加强对居民的组织管理。

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中，职工人数日增。在当时那风沙弥漫的荒原上，在那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及时安排好职工的生活，是一件头等大事。为了解决建设包钢的职工的子女入学问题，1956年秋季竣工的A23小学（中苏二小）、A46小学（钢铁一小）、A39小学（青年路小学）和包头六中于10月3日招生开学，一部分教师是由东河区支援新区调来的，一部分是从呼市一师毕业生中新分配来的。

这年深秋我来到兴建中的昆都仑区任教，支援新区建设。当时昆都仑区28号街坊以西的地面仍在施工，傍昆都仑河东岸的一部分街坊虽已竣工，住上了鞍建职工家属，但街坊尚不成形，到处是砖石杂物，到处是安装管道深挖下去的土壤和堆积如山的土丘，根本没有道路。中苏大街19号街坊以北、钢铁大街28号街坊

以东、钢铁大街以南还是漠漠无际的沙滩，沙蓬遍地，蒿草丛生，几乎没有树木。远眺旷野，整个荒原上还到处竖着标杆、标桩、架着钻塔。

当时服务于包钢工地建设的商业服务网点，都是市属商业企业从东河区派出支援新区建设的单位设立的。这些服务队当时集中在今团结大街17号街坊国营一食堂周围和青年路20号街坊的两个综合市场，都是工作在帐篷，生活在帐篷，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供应工作。当时有百货供应点5个，蔬菜食品杂货点5个，粮食供应站4个，煤炭门市部4个，食品商店6个，服务供应点9处（包括钟表、照相、修理、洗染等），国营食堂1个（即现在的国营一食堂），公私合营总店7个，手工业供应点有6种行业，木材门市2个，市场3个（其中以青年路20号街坊和大红门西北角两个综合市场最为繁华），小摊商86个（其中固定长期小摊商40户，临时小摊商46户），共计工作人员654人，担负着全区（主要是包钢、鞍建）40,460多口人的服务和物资供应任务。1956年底，青年路百货商场落成开业。当年冬季，昆都仑区的公共汽车站（东河至昆区的五路终点站）就设在青年路20号街坊市场南前进道的土路上。汽车站旁有一家“张好人”饭馆，饭菜经济实惠，以卖莜面著称。我们那些单身教师是这家饭馆的常客。当时学校没有通电，整个冬天点着蜡烛备课、批改作业，直到深夜一两点钟不知疲倦，饿了就去张好人饭馆吃莜面，或去小市场买沙鸡吃，挺便宜，一角五分钱一只。

1957年，钢铁大街修了水泥路面，但路南基本上还是沙滩、土丘，野草遍地，只有零星错落的几处稀疏的房屋，路上行人寥寥，空旷冷落。

1957年5月17日，中共包头市委任命郝志恒为昆都仑区区委书记。从56年下半年至57年底，昆都仑区委下设的工作部门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财贸部、监察委员会、团委、妇联筹

委会等。58年以后相继设立了工业部、农牧部、统战部、工会、档案室、党校。区人民委员会下设的机构有：办公室、民政科、工商劳动科、税务所（后为税务分局）、商业局、绿化队办公室（58年为城建科）、建设科、文教卫生科、计划统计科、交通运输科、市场管理委员会、粮食管理处（后为粮食局）、工业科、邮电局、检察院、法院等。58年以后到61年，先后又设立了人事科、总务科、财政局、银行办事处、供销社、手工业联社（后改为手工业管理局）、编制委员会、体委、计划生育委员会、副食品办公室、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农牧科、工商联办事处等。到1962年6月达到30个科、局、委、室，6月以后机构调整合并为21个。

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不断增加，截止57年8月底，全区居民由56年底的7,643户上升到12,576户，人口达到65,900多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居民委员会发展到25个。同年10月，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昆都仑区成立三个街道办事处：中苏大街街道办事处（管辖青年路以北、白云鄂博路以西和河西、昆都仑召等），青年路街道办事处（管辖钢铁大街以北、青年路以南），少先路街道办事处（管辖钢铁大街以南所有居民）。到1959年共成立了七个街道办事处。在文化设施方面，除1956年包钢俱乐部（今二冶俱乐部）建成投入使用外，1957年底相继建成现包钢职工俱乐部和昆都仑怡特。到1958年，昆都仑区已有俱乐部、影剧院五座。在商业和服务业工作方面，机构设施日趋完备，布局逐渐合理，行业界限更加分明，网点逐步增加。1958年建成白云鄂博路商场，1959年落成昆都仑百货大楼，12月正式营业。

1958年初全区人口为75,000，3月底增至16,920户，81,591人。同年，包头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由东河区迁来昆区。1959年初，昆区人口猛增到190,000人。

1960年，昆都仑区成立了包括七个分社、十二个管理区的以

包钢为主体的昆都仑人民公社，各街道办事处改为城市人民公社分社。当时尤以60年7月成立的跃进人民公社分社规模最大。同年郊区建制撤销，哈林格尔、哈业胡同、哈业脑包、全巴兔、麻池五个农村人民公社划归昆都仑区管辖，直到1963年郊区建制恢复后，又从昆区划出，这是建区后较大的一次区域变动。当年2月，全区人口已达到255,278人，年末曾达到354,000人（其中城区人口312,000人）。另一次是1960年9月至1962年的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人员变动。经过精简压缩，到1963年全区人口下降为233,000人，纯减78,800人。到1964年6月30日，全区总人口为172,138人（其中17个少数民族，人口为5,748人）。

在1961年至1963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建设项目“下马”，这个时期城市基本建设没有进展。经过调整，1963年以后，各项事业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局面。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中的十年，总的说来，是历史倒退的十年，它给国民经济建设，给科研、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带来了灭顶之灾，包括人的精神思想，一切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神州大地包括古老的黄河岸边这个新兴工业区重见了光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一切都在恢复，各项事业都在顺利发展，尤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国民收入逐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1985年，昆都仑区的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一亿元。

如今，中共包头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包头军分区和市公、检、法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设在昆都仑区，昆都仑区已成为包头的政治中心。

昆都仑区是以钢铁和稀土生产为主的工业区，目前包钢的钢和铁的年产量已分别达到155万吨和167万吨，并可生产几十个品

种的钢材，年产量可达110万吨。白云鄂博的稀土储藏量占全国总储量的97%，占世界总储量的81%。建区三十年来，包头地方工业发展迅速，除了中央、内蒙驻包企业包头钢铁公司和第二冶金建设公司设在昆都仑区外，驻区市属工业企业有包头第一热电厂、包头第一、二化工厂、包头东风钢铁厂、包头水泥厂、包头水泥制品厂、包头啤酒厂、包头阀门总厂、包头标准件厂、包头石油化工厂等121家。近年来，区属小工业以服务于生活为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区属小厂社主要集中于区经计委、劳动服务公司及各街道办事处，主要有机械加工、建材、化工、冶金、铝制品、木器、服装缝纫、文化用品、食品等，目前已有金属制品厂、第三化工厂、制线厂、文化用品厂、民族铝制品厂、环保设备厂、内燃机修理厂、第二、六木器厂等企业46个，职工4,378人。198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2,700万元，商业销售额为3,500万元，财政收入1,726万元。

昆都仑区的商业和服务业随着城区范围的逐年扩大，人口的增加，“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而日趋兴隆，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区第三产业迅速兴起和发展，大大改变了国营企业单一经营的形式，形成了国营、集体和个体同步发展的竞争局面。昆都仑区有1984年拆除重建的包头市百货大楼，1980年建成的“八一”综合市场以及市属五金交电、土产、蔬菜等商店门市和饮食、旅馆、浴池、理发、钟表、眼镜、照相等多种行业。较大的旅馆有1959年建成的包头宾馆、包钢招待所和1971年建成的钢城饭店，1983年建成的包头市劳动服务中心等。区商业局所属百货、糖业、饮食服务网点有159个，全区有固定农贸市场6个，还有多处季节性零散农商摊点，遍布城区各条街衢。1985年建成松梅道商业街，加速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昆都仑区已成为包头市的经济中心。

昆都仑区有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包头冶金研究所、包头市机械科研所、二十二冶建研所、包头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包头市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包头市园林科研所等科研单位。全区有大中小学71所，其中有包头医学院、包头钢铁学院、包钢职工工业余大学、二冶职工大学、包钢技校、二冶技校、内蒙古煤炭工业学校等8所大中专院校。有中学23所（其中蒙古族中学1所）、小学40所（其中蒙古族小学1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达6万余人。本区有聋哑学校1所。近年来成人教育发展迅速，现有职工中专5所。各级部门逐步重视幼儿教育，全区有幼儿园15所（其中民族幼儿园1所），已形成了从幼儿到大学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1981年建成的包钢少年宫，是目前包头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其中包括立体电影设备）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全区有少年之家1个，内蒙古自治区话剧团、包头市歌舞剧团以及包头市文联，都设在昆都仑区。昆都仑区现有文化馆1个，图书馆(室)、阅览室4个，在开展文学创作研究活动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设在昆都仑区。包钢展览馆是目前包头市最大的展览馆。如今，昆都仑区已成为包头市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发展，昆都仑区的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包括驻区企业，现在全区有中、西医院7个，卫生所多处，卫生防疫站2个，妇幼保健站2个。为了把计划生育工作持久地搞好，昆区从1972年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改为计划生育局。昆都仑区的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体育设施和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上，取得了较好成绩。目前，昆都仑区有体育场和灯光球场、体育馆各1个，曾举办过多次区域性的体育比赛。包钢在昆都仑河西建成了职工游泳池一座，满足了广大职工和学生的游泳活动。

昆都仑区又是包头的新闻、出版印刷等部门的集中地区，建

区后，包头日报社、包头人民广播电台相继由东河区迁至昆都仑区。昆都仑区现有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包头日报印刷厂、包钢印刷厂、中共包头市委印刷厂和包头第四印刷厂等多家。昆都仑区新华书店是建区初期设立最早的图书发行部门，1977年，在钢铁大街北侧鞍山道东建成的包头市新华书店是本市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书店，年最高图书发行量达96万册，销售额144万元，连同区书店，年最高发行总量达318万册，销售额为313万元。

昆都仑区交通便利，邮政事业正向现代化发展。包头火车站建在昆都仑区南端沼潭，是内蒙西部地区的铁路运输枢纽，京包、包兰线相接于此，又是包白、包太铁路的起点。包头西站和北站亦在昆都仑区境内。正在修建中的包神铁路亦将成为包头地区沟通伊盟和陕西的重要铁路运输干线。昆都仑区有通往东河、青山、包头站、张家营子以及郊区哈业胡同、包钢黄河水源地等7条市内市郊公共交通路线，并有通往固阳等地的长途客车。全区拥有机动车辆7,000多台，自行车120,000余辆。昆区的邮电通讯事业，由建区初期的一个工地邮电所，逐步发展壮大。现在，包头市邮电局设在昆都仑区，全区有支局两处、邮电营业所11个，担负着全区30万多各族人民同全国各地以及侨居国外的亲友的通信联系、包裹转运、报刊订阅和收发电报、电话等多项业务。邮路里程已达6,418公里，市内电话有12,360门。明年将建设现代化通讯设施，加强信息传递。

昆都仑区城区建设的速度近几年来大大加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在城区治理上，不但重视了建筑物的合理布局、规划和装饰，拆除了违章建筑，而且加强了城区的绿化美化，治理了“脏、乱、差”，到1986年，昆都仑区在占50%以上的42个没有下水道的平房街坊居民区中的34个街坊安装了下水道，楼房区2万2千户居民用上了煤气，运走了煤泥堆。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加强了卫生管理，添置了清洁车、吸粪车、洒水车，垃圾转运做到日产夜清，自治区

第一座日处理一百五十吨垃圾的现代化处理厂已于1986年8月在昆区建成使用。目前，昆都仑区基本上消除了污水和粪尿等污物的污染。在几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不少楼房街坊经过改造，修建了街坊内道路，辟建了凉亭、花坛，盖了存车棚等。区内主要街道经过绿化，绿树成荫，层次分明。宽阔的钢铁大街，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马路之间的花栏内，夏秋之季，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目前区内绿化面积已达到29%，不少单位和居民庭院修建了亭台、水榭、喷水池，建了雕塑像等。现在昆都仑区有公园3个，主要街道都有街心花园。市区北郊阴山之中的昆都仑水库，山水秀丽，景色宜人，亦已辟建为旅游区，每年春、夏、秋季，游客络绎不绝。今年包头市将修建昆都仑区到阴山古刹五当召的公路，以发展旅游事业。

现在，昆都仑区各族人民正在按照一九八五年中共包头市委号召全市人民把包头市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科技先进、文教发达、环境优美、生活方便、民族和睦、民风高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城市进行不懈的努力。

本文作者张清，系昆区志史办公室副主任，
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林荫路街道办事处成立前后

〔蒙古族〕龙 泉

林荫街道办事处成立二十七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团结战斗，在城区和包钢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基本概况

林荫街道办事处于1958年11月18日成立，因管区主要干道林荫路而得名。1961年3月改名林荫人民公社，1980年6月复名。现有行政干部16名，社干（集体）10名。有冷水嘴厂等18个大小企业、服务点，有职工203人，年产值150万元（包括营业额）。有第六、第七、“八一”公园、市府路4个公安派出所驻办事处。

林荫街道办事处位于昆都仑区东南部，设在友谊21街坊内。管辖范围：东至阿尔丁大街，西至鞍山道，南至郊区和平村，北至钢铁大街。面积4,512,656m²，居住着汉、蒙、满、达斡尔、回、鲜、苗等七个兄弟民族。居民区18个，居委会42个，15,214户，68,878人，其中蒙族1,038人，有纯居民3,483人。主要有鞍山道、林荫路、民族路、阿尔丁大街、少先路、友谊大街等十一条纵横街道，四条商业街，两个农贸市场。驻有包头医学院、市邮电局、包钢党校、职工医院等九个县处级以上单位，248个大小服务行业。

有昆区体育场、包钢俱乐部、少年宫、“八一”公园等文化娱乐场所。有包钢五所中学，八所小学。

初建时期

1958年，全国“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全国全市支援包钢，建国十周年出钢铁，为国庆献礼。从全国各地输入包钢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队伍日益增加，市政建设也在突飞猛进。随着市政和包钢建设的迅速发展，昆区人口急剧增加，居民区不断扩大，服务行业相应增多。为支援包钢，加强管理城市，昆区政府决定成立林荫街道办事处。1958年10月，副区长安来德把筹建任务交给了阎宏勋，阎宏勋同志刚从部队转业，年仅32岁，他带领田桂梅同志于10月18日到白云办事处办公。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友谊21街坊内建起70平方米的办公室。区人委配备了一辆公用自行车，一个挂钟，两张三屉桌，两把硬木椅，安了一部电话机。筹建一切就绪，于1958年11月18日，成立昆区林荫西路街道办事处。任命阎宏勋同志为办事处副主任，配备了田桂梅等三名办事员。

办事处是区委、区政府机关派设机构。任务是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一切事宜，上请下达，组织领导居委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决议和指示，搞好街政建设。实际是“千条线穿一根针”，上级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办事处落实到群众中去。居委会则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组织成员是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在办事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办事处的一切经费由区人委下拨。

林荫办事处建立初期的管辖范围，东至林荫路，西至白云路，南至郊区和平村，北至少先路。有：82*、83*、92*、93*、102*、103*等6个居民区，7个居委会，2,489户，13,012人，有21名党员。同年12月，根据区委指示，与公安六所建立临时党

总支，所长姚焕云担任书记，委员有阎宏勋、钟宝林，下设4个党支部。1959年2月18日，办事处正式建立党总支，由五人组成，书记是李贵贤同志。同年4月，根据安来德副区长在昆区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上作的《动员全区人民，全力支援包钢》报告的精神，动员居委会在本街坊建立了7个代销店，8个民办托儿所。办事处建立饭馆、理发等6个服务部。既方便了群众，又解决了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因此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市委书记高锦明亲自到办事处视察，并给予鼓励。

1959年下半年，全国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区提出“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桥梁去天堂”的口号。全区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办事处的中心工作转为大办城市公社，挂出“昆区林荫路街道办事处”和“昆区林荫路街道人民公社”两个牌子，实际是一个机构。由包钢、二冶抽调50余名职工到林荫路办事处筹办城市公社。

1961年3月27日，建立了林荫公社党委，由九人组成。徐风山任党委书记兼主任（二冶筑路公司工会主席），副书记有刘进文、齐古拉图（蒙族），监委书记是凌炳春。下设党委办、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妇联。行政机构由阎宏勋等3名副主任负责，下设街政办、治安保卫部（派出所兼）、生产部、后勤部。有6个管理区和一个直属队，即包钢耐火厂、动力厂、试验管理区、二冶金结公司、筑炉公司、四公司管理区和马车运输队。从此，办事处改为公社。原则上厂矿来的领导分管各自的管理区，阎宏勋、崔志来分管街政。行政经费由区财政下拨。“公社”与管理区经济上单独核算，行政上统一领导。虽为一套机构，实际是各有主张。

1961年4月，按照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区进行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纠正“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到1962年元月，城市公社完成

了历史使命。从包钢、二冶来的同志逐步撤走，撤销了管理区，把生产服务点全部交给林荫公社，中心工作又恢复到街政建设。但“公社”的名称没变，机构由原“两办五部二委”改为“两办两组一委”，即党委办、行政办、街政组、生产组、妇联。同年12月任刘培中为公社党委书记，阎宏勋任第一付主任。

1962年11月，王起润任公社党委书记，几个月后，王云龙接替了他的工作。同年8月，全区精简机构，区人委决定，撤销沼潭（阿吉拉）公社，划归林荫公社。管辖范围扩大到东至阿尔丁大街，西至白云路，南至沼潭、阿吉拉，北至钢铁大街，中间穿插郊区农村，方圆20平方公里。

1964年6月20日至7月20日，全区进行人口普查。同年7月17日，陈巨田任公社党委书记，李世昌任公社主任。

“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是动乱的十年，是受“左”倾路线严重干扰、破坏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前，1964年2月，开始“社教”、“五反”运动，区委书记成家留到林荫公社担任四清工作团团长，搞四清运动。四清没结束，1966年“5·16”通知下达，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8月2日，成立林荫公社“文革”小组。以李世昌为首的公社领导干部被加上一个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无情打击，残酷的迫害，所做出的成绩都成了挨批斗的种种罪名。公社领导权被夺，一时期工作没人管，各方面受到严重损失和破坏。

1968年6月25日，成立公社革委会，主任委员是陈巨田。各项工作刚要走上正规，又来了“清理阶级队伍”、“挖新内人党”，又造成了冤假错案，有一部分同志受到了迫害。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逼迫致死6人，致残17名。

1974年元月，区革委会决定，把鞍山道以西的四个街坊划给白云公社。沼潭（阿吉拉）公社从林荫公社划出。同年2月14日恢复公社党委，崔秀英（女）担任书记兼主任，孙铁石任副书记。九月份，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动员400余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

1976年元月，大办向阳院。同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垮台，受迫害的同志得到了平反昭雪，使各项工作走上了正确轨道。

建设时期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文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各项工作有了新成绩。

1979年7月，成立公社劳动服务处。同年8月，根据市、区关于“社办企业归国家所有”文件的精神，把公社办的缝纫、理发等七个门市部移交区工交局，价值116,478元。

1980年6月，撤销公社革委会，恢复办事处的名称。同年10月，王明友任办事处党委书记，孙铁石任主任。12月25日，选举王明友等32名代表出席了昆区第七届人代会。

1981年10月，全区地名普查，到1982年2月结束。1982年7月，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历时三个月。普查结果，林荫办事处有11,211户，55,320人，32个居委会。年底，办事处被评为昆区“文明礼貌月活动”和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1983年秋，根据市委指示，全区机构改革，调整各级领导班子。84年1月27日任命龙泉同志为林荫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副主任，11月晋升主任。新领导班子由三人组成，平均年龄36.6岁。原来的“两办两组一委”改为“三股一联”，即政工股、街政

股、生产股、妇联。1984年7月3日，林荫选区选举牟传广、邹海涛、龙泉等35名代表出席了昆区第八届人代会。

1985年4月至9月，在区委的领导下，林荫办事处分两批进行了整党，有281名党员参加整党。通过整党，由原来16个党支部增加到23个党支部。同年9月27日，召开中共昆区林荫街道办事处首届党代会，出席代表36名。会议任务有：龙泉同志作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林荫办事处委员会；选举邹海涛、龙泉等19名同志为中共昆区第五届党代会代表。同年10月10日，昆区区委批准林荫办事处成立党委，党委书记由龙泉同志担任，副书记有郝恩恩，委员是刘新中、乔巧维、张计忠、刘玉铭、高文玉等。创建了两个文明居委会。出现了全市张海迪式的好青年、身残志坚的王桂芝。在“民族团结活动月”、“党委端正党风”、“马列主义正规化理论教育”等项工作中，办事处被评为昆区先进单位。1985年5月，筹建聋哑人制钉厂，1986年6月建成包头昆区社会福利厂，正式投产。

1986年元月，办事处整顿了居委会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了治保、妇女、卫生、调解等组织机构。同年3月至5月，搞房屋普查。接着搞全市性灭鼠工作。同年4月，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目标管理，取得了优异成绩。当前，林荫办事处正在沿着改革的步伐，振作精神，开拓前进！

本文作者龙泉，系林荫路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兼主任。

昆都仑区分管农业的三年

黄安民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刮“共产风”，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很大浪费。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人民生活相当困难，粮食供应紧张，副食品贫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渡过难关，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都纷纷开荒种地，搞副食品生产，以弥补食品的不足。同时以粗代细、以副（食）代主（食）以及“增量法”之类的办法也都跑了出来。当时我市也兴起了副食品生产的热潮。昆都仑区是新市区，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与本地农村牧区缺少联系。所以惧怕断粮的心理更严重。包钢、包建以及区属、市属各单位都积极行动起来办农场、牧场。区政府设立了副食品办公室，在沼潭西北方划拨了荒地，由机关干部义务劳动种菜。包钢等大企业搞得规模更大些，至今包钢农牧处的编制，就是从那时沿袭过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业的管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变动：一九六〇年，包头市撤销了郊区建制，将市区周围的农村划归各市区管辖；包头市的管辖范围也扩大了，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前旗、乌兰察布盟的固阳县划归了包头市；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还抽调得力干部充实农业第一线的领导力量。

农业建制调整前，巴盟的辖区，东边一直达到昆都仑召。调整后，原来乌拉特前旗管辖的哈业胡同公社划归了昆区。这个公社面积过大，以后又划分出一部分归全巴兔公社和哈业脑包公社，

加上哈林格尔公社和麻池公社，昆区共管五个人民公社。哈业胡同公社的西界，最远时到达现在乌拉特前旗黑柳子乡的傅家圪堵、赵小人圪坦、兰浒圪堵一带。以后这些村子在乌拉特前旗重归巴盟时又划回了前旗。记得一九六二年我们下乡到这些村庄时，老乡们还提出继续归包头管辖的要求。

近郊农村划归区管辖后，昆区政府设立了农牧科。一九六〇年区农牧科与副食品办公室合并，成立了区农牧局。内设秘书、农业、林牧、经营管理等科股，下属单位还有农技推广站、经营管理站等。区委曾设农牧部。副食品生产先后由财贸部及农牧部分管。当时区商业局也抓副食品生产，一九六〇年在哈业胡同车站三顶账房村，利用水泉湾的自然条件，建立了昆区饲养场。

农业划归市区后，区委和区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区委副书记胡立珍、副区长秦永泉分管农业，副区长安米德分管商业，也兼管副食品生产。区农牧局的负责人曾有胡天祥、丁世财等人。哈业胡同公社书记是包钢下去的干部戴玉忱，哈业脑包公社社长是包钢下去的干部王凤喜，全巴兔公社书记是郭德玉，哈林格尔公社负责人有陈治国等。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包头市决定恢复郊区，将各区分散管理的近郊农村统一归郊区管辖。一九六三年五月，昆区农牧局撤销，农牧局的干部大部合并到郊区工作，副区长秦永泉也同时调到郊区。

昆都仑区的农业是在非常时期兴起的，对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密切了城市居民、职工与农民的联系，促进了城乡经济恢复和发展，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重温这段历史，是大有教益的。

本文作者黄安民，曾任昆区政府秘书、副科长，
现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包头钢铁公司三十年概况

王耕樵 新播龄

包头钢铁公司（以下简称包钢），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起来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是全国重要的稀土生产基地。它座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河畔，北倚阴山，南濒黄河，东接土默川，西连河套平原，是镶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在一片荒滩上平地起家的包钢，从无到有，逐步配套，至今已形成年产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截至一九八五年末，包钢直属的生产厂矿、职能处室和设计、科研部门已发展到92个。总占地面积2727万平方米。总投资30亿多元。已建成投产的主要设备有：65孔焦炉4座，选矿系列7个，75平方米烧结机4台，162平方米带式球团焙烧机1台，1513立方米高炉2座，1800立方米高炉1座，500吨固定式平炉4座，50吨氧气顶吹转炉2座，50吨顶底复吹转炉1座，每小时10,000立方米制氧机2台，以及1150毫米初轧机、950/800

克、俄罗斯和汉族等18个民族组成。其中蒙古族职工为1,635人。特别可喜的是，在历史上以游牧著称的蒙古等少数民族中，也造就出一大批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和科学技术的钢铁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与各级领导干部。早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炼出包钢第一炉钢的就有额尔敦布和、宝力照、阿拉坦巴根等第一代蒙古族炼钢工。包钢钢铁研究所所长、蒙古族高级工程师阿日棍曾与其他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借鉴国外资料，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高炉铁口无水炮泥，攻克了高炉铁口使用寿命短的技术难关。在包钢，继第一代蒙古族钢铁工人之后，第二代蒙古族钢铁工人正在茁壮成长。

现在，包钢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工业企业。包钢的诞生，结束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促进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机械、煤炭、电力、交通、建筑和建材等行业的发展，对于开发边远地区资源、发挥边远地区优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包钢的建成，更使我国北部边陲重镇——包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包头由一个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皮毛集散地，变成了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并以“草原钢城”闻名于国内外。

包钢筹建前的历史，发端于白云鄂博（蒙古语意为富饶神圣之山）矿产资源的发现。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在随中瑞（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途中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即今主矿）。一九三四年，地质工作者何作霖在研究白云鄂博岩矿标本时，发现其中含有两种稀土矿物。一九四四年，台湾籍地质工作者黄春江发现了白云鄂博东方矿体和西方矿体群（即今东矿和西矿）。尽管如此，由于旧中国贫困落后，政治腐败，旧政府从未考虑过对这一资源的开发，以致多少年来，这座富饶神圣之山始终沉睡在乌兰察布大草原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五〇年初，我中央人民政府就

把白云鄂博列为国家地质普查的重点项目之一。随后派地质调查队进行普查。经三年艰苦勘探证实：白云鄂博确是我国一个巨大的新铁矿。据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一九五三年初决定，在绥远省建设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一九五三年四月，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成立了包头筹备组；同年六月，改名为“五四钢铁公司筹备处”。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包头钢铁公司。当时，建设包钢的开拓者在黄沙蔽日、人烟稀少的一片荒原沙丘上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建设包钢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七年七月，包钢开始了以白云鄂博铁矿和机械修理总厂工程为中心的原料基地与附属、辅助生产设施的建设。一九五八年四月，四号焦炉和一号高炉先后破土动工，建设者们忘我劳动、日夜鏖战，终于使一号高炉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首次出铁。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给包钢建设者们以极大的鼓舞。一九六〇年，包钢又建成了一号平炉，并于五月一日炼出了第一炉钢。

在包钢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关键时刻，由于党和国家的关怀、重视，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个单位积极支援了包钢，形成了一个全国支援包钢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包钢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按期投产。特别是作为老企业的鞍钢，不仅为包钢代培大批人员，而且还向包钢直接输送了大批技术业务干部和生产骨干。

一九六一年初，包钢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绝大多数在建的工程项目都先后停建，不少生产设备也相继停产。直到一九六三年初才逐步恢复生产，并续建了原料系统的部分工程。

一九六四年，包钢出现了转机，开始显露出调整的成效。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连续三年盈利，一些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也跨入了国内同行业比较先进的行列。

正当包钢的干部、职工满怀豪情，乘胜前进的时候，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动乱中，尽管包钢的广大干部和职工顶着林彪、江青两个反革革集团的破坏，先后建成了一座高炉、两座转炉、两个轧钢厂和矿山原料系统的部分工程，但“文革”给包钢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使原来已经连续盈利三年的包钢，从一九六七年以后，急转直下，连续亏损达十一年之久，亏损最多的一九七六年，年亏损额高达一亿一千多万元，使包钢成为全国冶金系统有名的“老大难”单位。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钢重新踏上了前程似锦的康庄大道，开始了充满生机的历史新时期。七年来，包钢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狠抓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坚持改革，强化管理，推动技术进步，使企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九七八年，包钢重新扭亏为盈，当年盈利1690万元。此后又连年盈利。到包钢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九八四年，全年共盈利一亿二千五百多万元，提前一年完成了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产值利润指标，使包钢由一个年亏损亿元以上的大户，跨进了年盈利亿元以上的行列。一九八五年又盈利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增长40%以上。整个“六五”计划期间，包钢共实现利税七亿二千多万元，上缴利税四亿一千四百多万元。特别是“六五”计划的后三年，利税增长的幅度更大，每年平均递增46.7%，三年实现利税五亿多元，相当于前三年的2.4倍。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使包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六五”计划期间，包钢经过调整，基本上理顺了生产环节，使联合企业内部，从原料、冶炼、轧钢等主体生产线到机修、动力、运输等附属、辅助部门，都逐步走上了持续、稳定、

协调发展的轨道。首先，包钢对矿山原料系统进行了调查，基本上扭转了这个系统的被动局面。其间，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后建成了黑脑包和公益明两个铁矿。白云鄂博铁矿各采场经过调整，新的生产能力也在持续增长。五年来，铁精矿的品位由56%提高到58%，金属回收率由64%提高到68%，含氟量由2.5%降低到1.5%左右。特别是一向被称为“卡脖子”单位的烧结厂，一举甩掉了落后帽子，成为包钢第一个企业整顿验收合格单位和第一个实现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的单位，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先进工厂。包钢在调整中还自筹资金，先后建成了线材厂（现小型轧钢厂）和带钢厂，增添了适销对路的小型钢材，改善了钢材产品结构，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五年来，包钢新建职工住宅4580套，共23万平方米；同时建成了民用煤气工程和科教大楼、少年宫、游泳池、溜冰场、旱冰场及河西公园游艺场等一大批职工文化福利设施，改善了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

“六五”计划期间，包钢完成了对企业的全面整顿，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被批准为企业整顿验收合格单位。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以来，包钢先后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初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在调整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包钢又整顿了劳动组织，加强了劳动纪律，进一步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加强了全员培训。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包钢共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517个，培训干部25,211人次。经过文化补课考试合格的青年职工有16,405人，占应补课对象的96.22%。在企业整顿中，包钢还大力植树、种花、铺草坪、营建厂内园景，绿化、美化了厂区，使厂容厂貌焕然一新。

“六五”计划期间，包钢大胆推行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初步走上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道路。由于国家对包钢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的经济政策，五年中包钢的利润留成计达两亿六千多万元，其中生产发展基金达一亿多元，加上企业基本

折旧留用，国家返回资金、银行贷款和地方财政拨款等，使包钢得以在“六五”计划期间完成了24个基建配套和技术改造项目，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经济实力。在企业内部改革方面，继一九八三年推行保产量、保品种、保利润，实行承包的“三保一包”超利润分成的经济责任制之后，一九八四年，又在全面整党的推动下，继续解放思想，简政放权，制定了劳动组织、工资奖励等十二项改革措施。特别是从分配入手，全面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把公司的经济效益同所属厂矿和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挂起钩来，大大调动了厂矿和职工的积极性。在实行经营承包的当月，线材厂的月盈利就由原来的35万元上升到60万元；建厂以来一直亏损的炼钢厂，在承包后的次月也转亏为盈。一九八五年，包钢抓住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继续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同时进行了领导体制改革的试点和工资制度、用工制度的改革。在对内搞活经济的同时，包钢还加强了对外开放和横向联系，先后同鞍钢初轧厂签订了连轧技术合作协议，同杨圪塔煤矿签订了投资供货协作协议，为进一步与公司外部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积累了经验。

“六五”计划期间，包钢的技术改造初见成效，推动了技术进步，使产品质量、品种结构、能源消耗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都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改善。一九八〇年以来，包钢通过对四台烧结机密封系统逐个地进行改造，保证了“厚料层低碳”先进工艺的推行，使烧结机台时能力由一九八〇年的70.9吨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96.4吨，全年烧结矿产量超过设计能力11.73%，工序能耗也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进入国内同类企业的先进行列。一九八三年以来，继高碱度烧结矿成功地用于生产之后，又完成了高氧化镁烧结矿的试验，并应用于生产，使烧结软化温度提高50%左右，大大改善了高炉的冶炼条件。在炼钢浇铸中推广绝热板、保护渣和发热剂三位一体的新技术以后，镇静钢的成坯率提高了

3%。在环境净化方面，由于重点主攻了污染源，使包钢生产中排出的氟气、酚水和烟尘三大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烧结厂四座净化塔全部投入使用后，保证了大气含氟浓度低于国家标准。在焦炉上使用氨水消烟装置后，基本上消灭了炉顶冒烟，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六五”计划期间，包钢共取得科技成果199项；其中31项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85项已应用于工业生产。

“六五”计划期间，包钢在稀土的生产、科研和推广应用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三个稀土厂冶炼产品的产量折合稀土氧化物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了1.45倍；总产值和利润也分别比一九八〇年增长了2.07倍和6.43倍。氟碳铈镧精矿和含稀土氧化物68~70%的稀土精矿获冶金部优质产品称号；稀土硅铁合金和混合稀土金属获内蒙古自治区优质产品称号。有五种稀土合金被国家批准为一九八二年以来用于工业生产的有效新产品，并参加了全国新产品展览会。稀土精矿造球脱铁直接冶炼稀土合金简化了工艺流程，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能源，在稀土火法冶炼工艺流程改革方面闯出了新路。萃取单一稀土氧化物工程已建成投产，可同时生产99~99.95%的七种稀土产品和一种重稀土富集物，解决了稀土的初步深加工问题。现在，包钢生产的稀土产品除畅销于国内市场外，还行销于美、英、日、意、法、联邦德国、比利时、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包钢犹如草原上的一匹骏马，正在迎着冉冉旭日奋力奔驰。

（题图：包钢厂景。崔晓华摄影）

本文作者王耕樵，系包钢厂史办公室主任、昆区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靳楷龄为包钢厂史办负责人。

稀土之乡的一颗“明珠”

冯建平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包头便有了“稀土之乡”的称号，而包头稀土研究院可算是“稀土之乡”的一颗“明珠”了。其前身是冶金工业部包头冶金研究所。它是为开发我国著名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矿、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包头白云鄂博矿而专门建立的科研机构。它是以白云鄂博综合利用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稀土选矿、提取、分离和应用为研究重点，以开发和应用研究为主的多专业综合性研究院，是我国最大的稀土专业科研单位。

(一)

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国家科委根据聂荣臻元帅的建议于1963年4月1日正式成立的，院址在包头市昆都仑区团结大街东端北侧。

到1984年底，全院职工近千人，工程技术人员410余人，其中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250余人。院内设有选矿(包括岩相和物相)、稀土湿法冶金、稀土火法冶金、铈冶金、稀土应用、稀土新材料、物理检测、化学分析、自动化、同位素、冶炼技术、设备设计和科技情报等13个专业研究室和一个机修加工车间。科研建筑总面积三万多平方米。

基于白云鄂博矿床类型特殊，构成异常复杂，对其进行综合

利用，在国内外均无现成经验可供直接借鉴。二十多年来，包头稀土研究院在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冶金工业部和地方上级党委领导下，同全国有关单位密切协作，紧紧围绕着白云鄂博资源综合利用这一复杂艰巨任务，开展了大量研究，共取得科研成果420项。其中重大科研成果113项，获成果奖73项。并把这些成果推广应用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为合理开发白云鄂博资源提供了许多新工艺、新流程和新技术，为发展我国新兴的稀土工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

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发展建设，经历了建院、十年动乱和蓬勃发展新时期等三个主要阶段。

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前身是包钢冶金科学试验所。1963年2月，包钢冶金科学试验所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了包钢冶金研究所（稀土和稀有金属为主）和包钢中央试验室（钢铁为主）。同年4月1日，冶金工业部正式下文，将包钢冶金研究所并704试验厂和8861试验厂（即现在的包钢稀土一厂和包钢稀土三厂的前身）从包钢分出，隶属冶金部直接领导，正式定名为包头冶金研究所。原包钢副经理李光担任党委书记兼主任。1963年年末全院总人数为1204人。1961年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北京钢铁研究院调来包钢的300多人，有相当一部分留在该院，成为建院初期的骨干技术力量。

1962年5月冶金部正式批准的“包头冶金研究所设计任务书”中明确规定：“包头白云鄂博矿除有大量铁矿外，还含有大量的稀土稀有资源，本研究所的任务即为研究这些资源的综合利用，研究从包头矿中提取稀土稀有金属”。

建所工作从1962年5月正式开始，1963年起交付施工设计并

在现址动工，至1965年末，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基建总投资达1,073万元。当时刚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在紧缩开支中投入如此巨大的人财物力建造此院，足见对开发白云鄂博资源和发展我国稀土工业多么重视。

1963年和1965年，在聂荣臻副总理直接关怀和组织下，由国家科委、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主持，先后两次召开了“包头矿综合利用和稀土应用工作会议”，极大地推动了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建设和早期科研工作。1963年到1966年期间，一边建院，一边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稀土合金冶炼、综合选矿、稀土分离提取、包头矿提铈、稀土在钢中应用等多方面的试验研究，就48个专题提出了78篇科研报告和总结，取得了白云鄂博资源综合利用的第一批科研成果。

1966年夏，各研究院刚刚迁入新建的科研大楼，“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刚刚起步的科研工作受到严重挫折。1967年和1970年704试验厂和8861试验厂先后划归包钢改为生产厂。从1970年起，本院也一度体制下放归包钢领导，改名为包钢冶金研究所（直至1979年）。十年动乱中，包头稀土研究院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科技人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学试验，为开发白云鄂博资源和发展稀土工业，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曾有11项成果得到嘉奖。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头稀土研究院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但由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够和领导更换频繁等多种原因，直到1982年包头稀土研究院的工作仍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1983年元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反映这一状况的“我们想飞，没人按电钮”的专题报道。为此，冶金部和自治区党委立刻派出联合调查组来院调查，并于4月宣布成立以葛洪文为党委书记和安治礼为所长（现院长）的新领导班子。

新领导班子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狠抓了否定“文革”、否定两派的教育，积极、认真地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开展了以科研责任制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使全院面貌焕然一新，科研生产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1978年至1982年的五年当中，总共取得部省级鉴定成果30项，而在1983年7月至1984年7月的一年当中，鉴定成果就有20多项。这期间完成了7项工业试验和两项扩大试验，研制出两种新型材料和4种新仪器设备，建立了四种稀土分析方法，是建院以来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年。全院小生产产值也从1976年的3万元增长到1983年的79.6万元，净利润近40万元。科研和生产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三)

二十多年来，包头稀土研究院为开发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和发
展我国稀土工业，在众多的专业领域中，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应
用性研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



包头稀土研究院对稀土永磁合金进行电子探针分析。 崔晓华摄

在综合选矿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探索，终于在选别稀土精矿方面不断有重大突破。1977年与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单位协作，完成了羧肪酸浮选包头稀土精矿半工业试验，使稀土精矿品位突破60% (REO)。1980年，又首次实现了从包头矿中选别品位为68%以上的稀土精矿。同年完成的“浮选——选择性絮凝脱泥选别白云鄂博主东矿中贫氧化矿半工业试验”（与北京矿冶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当年通过冶金部技术鉴定并获得科技成果一等奖，1984年已在包钢进行工业试验。1980年至1983年，采用本院研制的802浮选药剂，首次完成了从包头矿中分选单一氟碳铈矿精矿的小型和连选扩大试验，并于1984年在包钢选矿厂成功地进行了工业试验，若生产稳定，年盈利可达300万元。这一成果改变了包头只能生产氟碳铈矿与独居石混合型稀土精矿而不能产单一型稀土精矿的局面，为稀土精矿外销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冶炼稀土中间合金和稀土金属工艺研究方面，早在1965年至1966年的建院初期，就在 $0.04M^3$ 和 $15.8M^3$ 的小高炉和电炉上，成功地进行了中贫矿脱铁——电炉冶炼稀土硅铁合金的流程试验，大大改进了用包钢高炉渣生产稀土中间合金的旧工艺。1967年包头东风钢铁厂采用此流程在 $81M^3$ 高炉上投产，使稀土硅铁合金成本降低了80%。与此同时还研制成功稀土镁、稀土钙等多种合金新品种。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稀土在钢和铸铁中的广泛应用，使合金用量在1960年至1970年的十年中增长了约40倍。该工艺流程在生产上延用至今，使稀土合金用量仍占全国稀土总用量的一半以上。1978年同兄弟单位协作完成了用稀土粗精矿冶炼稀土中间合金工业试验，进而又研制成功低钛稀土合金新工艺，使合金生产成本降低。质量的提高，大大增强了包头稀土合金的出口能力。1984年完成了“氧化钹电解法制备金属钹和钹铁合金工艺”的扩大试验。此工艺填补了我国氧化钹电解的空白，将为

今后大量生产钕铁硼永磁体提供优质价廉的原料，成为本院一项主要的技术转让成果。

稀土分离提取方面，“文革”期间进行的溶剂萃取法分离镧铈等六种高纯单一稀土研究，工艺和技术指标就已接近国际水平。当时为满足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急需，还完成了40多项高纯稀土产品的试制任务。1979年至1983年研究成功的P507盐酸体系轻中稀土全萃取连续分离工艺，在国内首次创造了采用一种萃取剂、一种介质，经全萃取连续分离同时得到六种高纯单一稀土和大于90%氧化铈的先进工艺。1984年采用该工艺在包钢稀土三厂建成年处理300吨氯化稀土的分离车间。预计年利润能达100万元。该工艺还被用于湖南和江西稀土的分离。1983年本院研究成功“液碱快速分解法分解包头稀土精矿”并在包钢稀土三厂进行工业试验，使精矿分解时间由原工艺的6小时降为30~40分钟，每吨氯化稀土成本降至3,000元左右。1983年完成的“萃取法制备荧光级氧化铈”研究，填补了我国用全萃取法制取荧光级氧化铈的空白，与P507全萃取工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七种单一稀土分离体系。为发展我国稀土深度加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综合利用白云鄂博铈资源方面，在铈选矿、铁水提铈、各种铈原料制备铈铁和氧化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研究。1983年与包头东风钢铁厂等单位协作完成“中贫矿铁水底吹氧气转炉提铈工业试验。”通过冶金部鉴定时被认为是综合利用包头铈资源现实可行的先进工艺。

稀土用于钢铁和有色合金的研究，本院参加研制的稀土轴承钢、弹簧钢、药筒钢等均已在使用中。耐高温中等浓度硫酸腐蚀的不锈钢及焊条，荣获1983年国家科委颁发的三等发明奖。钢中稀土加入方法——包内压入法和模内吊棒法，获得冶金部重要科技成果奖并用于生产。连铸喂加稀土丝工艺和连铸喂丝机已在上钢、武钢等地投入使用。

稀土新型材料方面。“文革”期间与兄弟单位协作攻关，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稀土钴永磁合金，研制生产的六硼化钐阴极发射材料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84年初研制新型稀土永磁体钕铁硼合金，仅用半年时间，磁能积就达到42兆高奥，接近国际水平。研制成功的稀土钴永磁经向多对极整体环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成果。在稀土储氢和稀土发热体等新材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化学分析和物理检测方面。“文革”中为满足稀土工业发展需要，总结编印了“稀土矿石及其冶金化学分析方法”和“稀土元素的X射线荧光光谱与发射光谱”两书。近年来与武汉大学等协作研究的用稀土显色剂均三溴偶氮胂测定稀土总量于广泛应用于生产。七十年代中研制成功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稀土钴永磁体磁滞回线显示仪等为稀土永磁体的性能测试发挥了很大作用。

新型仪器和设备研制方面。本院研制的X荧光载流分析仪已用于选矿生产中铁的快速分析。每两分钟就可打印报出一个结果。逆流洗涤塔已成功应用于江西寻乌稀土生产。LCY型力矩充祛磁仪已用于多种磁钢和器件的充磁与祛磁。用稀土永磁体作探头的水泥测厚仪也已用于测量混凝土管道等水泥制品的厚度。

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冶金部和有色总公司稀土情报网的网长单位。负责编印的《稀土》杂志作为中国稀土学会会刊在国内公开发行，成为我国稀土生产、科研与应用方面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园地。负责编辑的《稀土信息》月刊是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稀土情报网联合主办的刊物，已成为国内稀土界的权威性信息快报。

二十多年来，包头稀土研究院共发表了六百多篇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多次派人出国参加国际稀土界的技术和学术交流以及进修。

除了《稀土》和《稀土信息》编辑部外，设在包头稀土研究

院的全国性稀土专业机构还有：中国稀土学会地质选矿专业委员会、全国稀土在钢中应用领导小组办公室、冶金部金属腐蚀中心包头分部等。

(四)

包头稀土研究院正在发展成为我国稀土工业的主要科研基地。

目前，本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精神，积极进行科研体制改革，在把主要力量投放白云鄂博综合利用研究的同时，还积极承担江西、湖南、广东等地稀土稀有金属资源的开发研究。1984年与江苏常熟市共同筹建了“江南稀土材料总厂”。同呼和浩特市阀门厂联合经营特种钢阀门；与包头市稀土应用研究所联合经营铬酸铜发热体；与集宁二轻局组成松散的联合体。在采用建立联合体，开展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和咨询等多种形式开拓国内稀土技术市场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的技术与设备，用于发展我国的稀土科学技术与生产。

为了尽快完成向科研生产经营开发型和企业化的科研单位转变与过渡，包头稀土研究院建成了混合稀土分离生产线，用科学技术成果和产品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作为全国最大的稀土专业研究院，包头稀土研究院在许多方面正发展成为专业中心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稀土工业的蓬勃发展，包头稀土研究院这颗“稀土之乡”上的“明珠”，必将在稀土科研、情报信息、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分析检测、稀土在金属材料中应用和稀土新材料研制与技术开发等方面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本文作者冯建平，系包头稀土研究院党委宣传部干事

包头第一热电厂发展概略

保玉堂

从钢铁大街西眺，包头第一热电厂（以下简称一电厂）的雄姿先入眼帘，高耸的烟囱，巨型双曲线冷水塔，清晰即现。近观，林立的电塔架着银线伸向天际，网络般的管道凌空敷架，厂房和其它建筑物的四周绿树相间，无数花圃斑斑缀点，座落在包钢工厂群中的一电厂宛如一座别致的花园。

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无不依赖于电力，电力是工业发展的“先行官”。

一电厂是伴随着包钢的建设而诞生的，经过三期工程建设，总装发电设备容量为31.2万千瓦，占自治区西部电网总发电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是自治区西部地区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一电厂从一九五九年九月正式投产，截止一九八六年底，累计总发电量212.4亿度，总供热量3809万百万千卡，总产值16.88亿元，为包钢和自治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电厂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壮大，曾是大跃进早产的娇子，其先天不足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到充实和健全。“文革”十年，又受到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中又迈出了前进的步伐。展望未来，前景灿烂。

荒原建厂，创业艰辛

一电厂是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之一，一九五四年国家计委批准建厂，毗邻包钢。引进了五十年代苏联较先进的发电设备，是

国内新建的一座大型火力电厂，当时曾列为水电部直辖电厂之一。

一九五七年，建厂筹备处成立。水电部选派原石家庄电业局副局长沈其朋任筹备处主任，原水电部生产司技术处副处长许懋淳（英国留学生）任总工程师，原北京电业管理局基建处工程师郭协万任副总工程师。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唐山、下花园等地调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有富有管理经验的干部和熟悉生产的技术工人。还从全国一些高等院校、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分来一批学生，还有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留学生。这些优秀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边陲经济建设，是一代拓荒者。

塞外高原气候条件恶劣，春天常有狂风大作，黄沙弥漫；夏天烈日炎炎，炙烤炽面；冬季漫长，朔风凛冽。居住条件简陋，有的住在帐篷或临建房屋里，睡着大通铺。粮食不足，蛋菜奇缺。没有交通工具，职工上下班多是步行。任务重、时间紧迫，大家昼夜苦战，电厂建设和投产初期，凝聚着一代开拓者的艰辛。



包头第一热电厂汽机车间 穆中艺摄

在“大跃进”中诞生

一九五八年，包头工业基地和包钢的建设全面展开，电力供应紧张，一电厂的早日建成投产，直接关系到包钢和全市的建设速度。三月二十二日，虽是春风乍暖季节，可“寒流俨然似冷冬”，人们冒着蔽日的黄风，参加了破土庆典。包头市市长李质，市委秘书长王西，包钢副经理刘力子，包头电业局局长程林彬，包头一电厂筹备处主任沈其朋，苏联专家组长米洛维道夫等参加了隆重的庆典。接着，无数台铲运机、载重汽车开赴现场，紧张地投入土石挖运，夜间灯光通明。到五月底，就完成了数十万立方米的土石挖运任务。六月初，转入砼土浇灌。年底，已完成了80米高的烟囱、55米高的冷水塔、35米高的主厂房的建设任务，35万平方米的各种建筑拔地而起，一个崭新火力发电厂的雏廓展现在昆都仑河西岸。

一九五九年三月，发电设备开始安装，一台锅炉设备总重近千吨，从大件起吊到点火试运行只用了70天，一台汽轮发电机组的安装也仅用了66天。

九月一日，第一台汽轮发电机组正式投产。包头市委书记高锦明为一电厂投产剪彩。包头日报、内蒙古日报都在头版用通栏篇幅报道了一电厂投产的消息，水电部党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包头市委等上级机关分别发来贺电或贺信。

一电厂的建设速度比同类电厂提前了半年建成，起到了缓解呼包电网电力紧张的作用，向包钢提供了充足的电力和热能，为包钢提前建成投产创造了先决条件。年底，又有两台发电机组相继投产，使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6.2万千瓦。当时成为自治区第一大发电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包头一电厂建成的巨幅照片和投产发电的消息。

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处于最艰难时期，全国许多工业项目

停建或缓建，但仍然保证了一电厂的重点建设，一台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如期开工，到一九六一年八月投入生产，使全厂总装发电设备容量达到11.2万千瓦，占当时呼包电网发电容量的百分之七十。

“大跃进”的年代里，急于求成和片面求快的“左”倾思潮占主导，存在着严重忽视工程质量，不尊重科学的倾向，一电厂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害非浅。工程没有成龙配套，就急于发电，当时的口号是“先简后全”，发电设备增长过快，操作人员一时不能适应等因素，使安全生产的能力十分薄弱，加上设计不尽合理，与包钢合用的工程设施调度不灵等弊端统统暴露。投产初期，新厂、新人、新设备，管理跟不上，设备有问题，致使事故屡有发生。实际是“大跃进”不良后果的综合反应，最终暴露在生产上。当时，生产非常被动，事故牵着人们的鼻子走，真是积重难返。

完善生产环节

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转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在贯彻“八字”方针中，一电厂得到恢复、健全与发展。同年，水电部决定对全国部分电厂进行工程的填平补齐。这是对“大跃进”建设时期泛减投资滥砍项目的补救措施。北京电力设计院来厂进行了全面调查，确定了136个应补齐的项目，其中包括生产充实、技术改造、基本建设和生活福利几个方面的项目。补齐工程竣工后，一电厂的生产环节臻于完备。

一九六一年，担任厂党委书记的史一和厂长刘志华，十分重视建立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调管理制度化，提倡月有计划、周有安排、日有打算的管理方法。同时，在生产上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攻克生产关键。他们极为重视基础管理工作，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和老工人的作用。在厂区大搞

文明生产，植树种花，主控制室还摆上花盆。还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措施非常有利，为调动职工积极性、扭转生产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六四年，厂党委书记李毅、厂长闻奇，借鉴兄弟单位的经验，提出了创建“五好”设备。凡检修设备，先拟订检修工艺验收标准，达不到标准的设备不予验收。通过对逐台发电设备的检修，用严格评定等级的办法，使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增强，同时消除了很多“老大难”的设备缺陷。到一九六六年，实现了创造全厂安全发电400天无事故的记录，各项经济和技术指标都跨入全国同类型电厂的先进行列。

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得到改善，全厂职工共同度过了困难关，迎来了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信心百倍地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到来。

在动乱中坚持生产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一电厂也被卷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旋涡中。旷达十年之久的内乱给电厂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当时党政主要领导都被罢了官。一些中层干部也被揪斗，致使生产指挥系统瘫痪。几年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各项规章制度，被当成“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遭到批判。但是在“停产闹革命”期间，全厂绝大多数职工坚守生产岗位，坚持生产，没有一天一时停止发电。为了供应动力和照明，电厂要维持生产，由于煤矿采掘不正常，造成电厂缺煤。为此，电厂派专人到煤矿把开矿时采出的表层煤夹杂着大量矸石运回应急，也曾动用毛驴车把煤炭商店的民用煤运来维持发电。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应受到称赞。

一九六九年以后，发电设备的健康程度经过惯性的延续之后急转直下。由于烧用煤质量不佳，含杂大量石头，灰分含量高达

百分之四十以上，加剧了锅炉管道的外部磨损。滥用蒸汽得不到回收，增加了锅炉补水，补给水合格率低，加剧了锅炉内部金属腐蚀，导致生产被动。

一九七〇年，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搞超名牌发电，“一厂变一厂半”，“单机出力翻一番”，又加速了发电设备的损坏。到一九七一年，致使锅炉设备承压部件千疮百孔，设备泄漏爆管事故频繁发生，出现过四台锅炉瘫痪，只有一台锅炉运行的危难时刻。一九七二年全厂共发生了事故73次，是一电厂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年。

电力生产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锅炉设备需要进行彻底检修，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厂党委书记崔润田、革委会主任王玉田等领导，带领全厂职工投入锅炉设备的“恢复性”大修。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锅炉设备体态庞杂，总高度30多米，内部管束如织，排列有序，不同直径的管子总长有十多公里，管子弯头上千个。更换一次受热面管道要比安装一台新锅炉还困难，先把原来的管道割除运出来，再把新的钢管煨制成原来的形体，运往炉体内重新安装，工作量大，条件十分艰苦。锅炉车间的职工，几乎是轮番昼夜工作，这边搞恢复性大修，那边运行的设备出了事故还要抢修，干部和职工都投入了这场战斗。总工程师郭协万经常吃住在厂里，为恢复生产呕心沥血。当时，人们不顾唯生产力论的政治大帽子压顶，奋力抢修、检修设备，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使锅炉设备趋于好转。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又对锅炉设备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检修，真是设备毁于一旦，修复步履艰难。

扩建发电设备

一九七五年开始，到一九八三年，一电厂生产规模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扩建了两台十万千瓦发电机组,使发电能力增长了近两倍。

扩建两台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是在一九七三年国务院六部(水电部、冶金部、一机部、煤炭部、铁道部、交通部)二委(国家计委、建委)在包头召开包钢生产建设问题座谈会上决定的。为使包钢尽快形成设计能力,包头一电厂扩建,以满足包钢和包头地区生产和建设的需要。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扩建工程开始,但进展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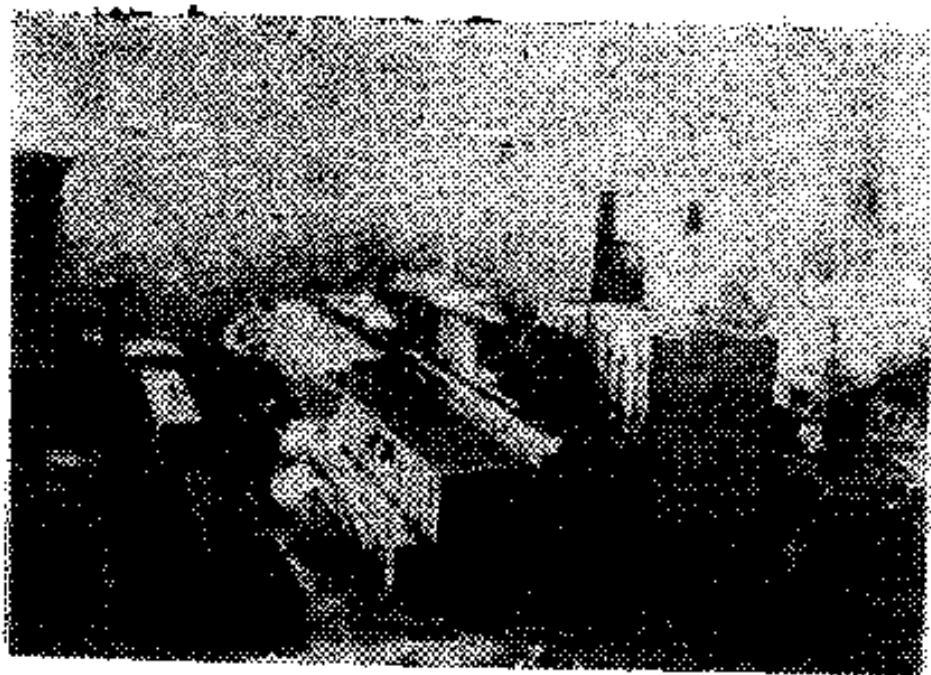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扩建工程速度加快,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台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十万千瓦发电机组是呼包电力网最大的发电机组,每年可为电网增加发电量6.5亿度。一九八三年,第二台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又建成投产,此后又陆续建成了相应的配套工程。双十万机组的投产,促进了包钢的发展,也促进了自治区西部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了城乡人民用电的日益增长。

扩建工程曾受了“文革”的害,发电设备多是“文革”期间制造的,重大缺陷甚多。在设备安装和投产以后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技术措施。水电部对工程质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工程建设中,虽然也遇到了建材价格调整,但工程总投资始终控制在概算定额内,在基建投资的掌握和运用上受到水电部表扬。

在整顿、改革中前进

一九八二年,厂党委书记达来和厂长周邦安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时经一年多的努力,企业面貌焕然一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经华北电管局企业验收团验收,达到一次合格,评为自治区电管局发电企业第一名。从此,一电厂迈出了前进的步伐。

一九八五年厂党委向内蒙电管局党组提出一电厂试行厂长负责制,政企有了明确分工,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第一热电厂部分厂居

崔晓华摄

厂长耿致庆先是改革了干部制度，对中层（科室）干部实行了聘用制，增强了干部任职期间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拟订了厂长任期目标管理和逐年实施目标考核办法。一九八

五年和一九八六年在住房、晋级、子女安置等方面，每年为职工办了十件好事。

在经营管理上，围绕多发电、减少厂用电消耗、降低发电成本、提高企业综合经济效益等环节，进一步完善了岗位经济责任制，扩大了费用承包范围。对总发电成本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燃煤实行承包，效果显著。成立了燃煤专管办公室，拟定实施“燃煤管理”、“小窑煤掺配”、“不同煤质配掺配”等制度，改进计量监测手段，微机应用于管理，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核子计量装置。充分发挥包头地区煤源丰富的优势，减少外调煤（运输环节多、费用大），既扶持了地方小煤矿又降低了发电成本。一九八六年水电部在燃煤管理考核评选中，把一电厂列为燃煤管理优秀厂。

在生产管理上突出抓发电设备的维护与检修，使可靠运行小时大为提高。一九八五年比一九八四年多发电二亿度，一九八六年比一九八五年多发电二亿多度。近两年来，始终保持了产量、产值、利税三个同步增长。

应用新技术改造现有设备，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提高职工的积

极性。以输煤车间技术改进为例，通过加装除尘装置，使车间空气得到净化，煤尘含量由原来的每立方米空间含煤尘112毫克下降到11毫克，治理成效显著。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华北电管局在一电厂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

几年来，坚持以绿化为主美化为辅的方针。厂区变成了绿树成荫、花草遍地的庭园，全厂已绿化面积占可绿化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厂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被包头市誉为城市绿化美化甲级单位，城市绿化标兵。

一九八五年，在整党过程中厂领导率先垂范，制定了厂级领导“不以权谋私、不收贿赂、甘当公仆”的《约法三章》，全厂出现了党风正、职工顺气鼓劲的景象。建立厂长信箱，体察民意。加强了职代会民主管理与监督，促进了企业民主管理进程。

精神文明建设遍及全厂，共建立了十三个职工之家，六百多户职工家庭安装了闭路电视，文协、体协等群众组织活跃，进而激发了职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一九八五年，全厂创安全运行228天无事故记录。一九八六年又创安全运行360天无事故记录。一九八五年被华北电管局评为文明单位。两年共获地、市级奖牌锦旗18项。

目前，全厂职工正信心百倍，在团结起来、振兴一电的口号下，努力工作，争取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保玉堂，系包头一电厂厂史办公室干部

“小包钢”今昔

高志勤

今日的“小包钢”，是一个年产稀土合金6千吨、硅铁5千吨、生铁5万吨、钢材3万吨（设计能力）的小型冶金企业；是一个年工业总产值3,100多万元、年上交利税总额700多万元的地方工业企业；是一个在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颇有名气的厂家之一。

“小包钢”是包头市东风钢铁厂的俗称，座落在昆都仑河西岸、包头钢铁公司厂区北侧、包头市水泥厂南侧。全厂占地1,815,600M²。主要设备有100M³高炉两座，3吨电弧炉两座，0.5吨电弧炉、中频炉各一座，1,800KVA矿热炉四座，400×1/300×3/250×5轧机一架组，固定资产原值近2,000万元，全厂职工2,800多人。

“小包钢”的发展，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我们展示今日“小包钢”全貌的同时，回顾“小包钢”建厂前后的经历，对我们了解小包钢的历史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小包钢”是1957年由原包头市重工业局主持筹建的。当时是为了解决包头机械厂（现包头矿山机械厂）铸造所需生铁，由机械厂负责具体工作的。原计划建78M³高炉一座，投资220万元。最初造址方案是在磴口，后因地质条件不适宜，便改在现址（当时叫昆都仑召西茅庵村）建设的。

1957年4月，由原包头机械厂副厂长牛步峰同志带队，筹建小组进驻厂区开始工作，成员有张耀安、范斌、孟生小、张三

娃、冯恒前、王璉、黄中海、谭元让、文明新等十多名同志。筹备小组在荒地上搭起了第一顶帐篷，“小包钢”的建设开始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工作人员每天在现场工作，吃的得到一里以外的昆都仑召食堂。一直到57年冬，才开始在新建成的河东宿舍（现团结大街18*街坊）办公休息。

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小包钢”的建设进入高潮。经内蒙古、包头市两级政府批准，投资额增至1,700万元，建设规模扩大。计划建设项目分为铁东、铁西两部分：铁东有 13M^3 土高炉四座， 80M^3 高炉两座；铁西有 255M^3 高炉四座，20万吨转炉车间一个， 300×500 轧钢车间一个以及占地 $2,592\text{M}^2$ 、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机修车间一个，厂名也改为包头市钢铁厂。

为了适应建设和生产的发展，包头市机械厂的筹备小组人员留下了，市重工业局又调来许多人，特别是从太钢陆续调来的于乾（炼铁工程师）、王烈臣（炼铁技师）、张满堂（热风技师）、党远亭（技术员）、李伦、赵明庆、王行义、柴发祥、刘富皇、刘魁名等同志和包头钢校周捷同志带队的32名学生、教师，构成了初期“小包钢”的基本骨干力量。随着厂子的发展，专业学校分配来的章世恭、周自立、于长胜、赵福祥等同志补充壮大了工程技术人员队伍。

上级委派的牛步峰、侯华邦、岳山、肖波、王春、刘经伦、阿斯根、翟秉臣、周捷、于乾等同志先后担任厂党政领导。

1958年7月1日， 13M^3 土高炉建成投产，流出了内蒙古地区第一炉铁水。9月， 80M^3 高炉建成投产，到58年底，铁东部分基本建成。

59年至60年，为了配套，又建成了有红旗2号、红旗3号焦炉各6座的两个焦化车间。“小包钢”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当时全厂职工达4,800多人，从河东宿舍到厂区的小路上昼夜人流不断，一派繁盛景象，尤其是吃饭时候，买饭的职工排成长龙，甚

为热闹。现在的老同志谈起当时的情况，还饶有眷恋之情。

1962年在国民经济调整时，内蒙决定“小包钢”全线停产下马，“小包钢”人员大部分精简下放，部分调离。至下马时，铁东255M³高炉底座、转炉车间厂房、机修车间厂房已基本建成。下马期间，由于乾、于长胜同志负责护厂工作。

据统计，1958年至1965年间，“小包钢”共计亏损1,457.3万元。

1966年4月，内蒙工交政治工作会议在包头召开，会议决定“小包钢”上马生产。经过紧张的恢复生产准备工作，同年8月1日高炉投产，厂名改为包头市炼铁厂。全厂职工近600人，厂党政领导是郑长寿、史钧、孙兰泉、连耀安、于长胜。

1967年3月，冶金部主持召开的包头白云矿综合利用会议决定，“小包钢”改炼白云矿生产稀土富渣，供包钢704厂（现包钢稀土一厂）生产稀土合金用。

1970年5月，“小包钢”自制的0.5吨电弧炉试炼稀土合金成功，揭开了发展稀土生产的帷幕。同年7月，包头市决定投资新建炼钢车间，建成3吨电弧炉一座，并于1971年开炉生产稀土合金。至此，“小包钢”钢铁生产和稀土生产并举发展的方向才初步确立，厂名改为包头市东风钢铁厂。

从1977年开始，“小包钢”开始盈利。特别是从1981年起，随着企业“转轨”、“变型”的深入，盈利水平逐年大幅度提高。从1981年盈利2.6万元，上升到1985年的289.3万元，成为包头市盈利百万元以上的企业之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东风钢铁厂更加焕发了生机，厂长周自立同志，锐意开拓，引进国外资金进行了技术改选扩建工程，现工程即将竣工投产。在完成冶金部下发的“二流程”试验的基础上，经国家批准的中日合作连续提铈、连续炼钢、连续铸锭试验在包头市东风钢铁厂建设试验厂科研项目（简称中日合作“三连

工程”，英文缩写CNSM）也即将实施。这些都将给小包钢描绘出更令人振奋的发展前景。

看到东风钢铁厂贯穿厂区东西长达3公里的沥青路面，拔地而起的新办公楼、招待所、礼堂、职工浴池等建筑，壮观的厂门，多姿多彩的厂区花园、花圃，绿叶和鲜花映衬的文明卫生的厂容厂貌，炉火通红的高炉、电炉、矿热炉，热气腾腾、紧张而又秩序井然的生产场面，无不令人感慨、振奋，这是前进中的“小包钢”蓬勃发展的写照。

东风钢铁厂，这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企业，必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中，迈出新步伐，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补 正

《昆都仑文史》第二辑稿件《蒙民小学在前进》一文中，提到“建校以来担任学校领导的蒙古民族干部”的名单中，将曾在该校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现任昆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雅兰同志遗漏。特此补正。

原文作者

记包钢的第一批开拓者

易 磐

一九五三年五月的一天，京包线上飞驰的列车，载着来自东北、上海、武汉、山西、河北等地的一支一百五十多人的队伍，这就是包钢的第一批开拓者。

这支队伍分测量队和地质队。由鄯晋诗处长和郭泽成队长带领，还有部分行政人员以及赵国栋、杨芝学、何焕之等工程师。他们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将第一个奔赴塞外包头，为包钢勘测厂址。

六月的塞外，骄阳似火。测量队与地质队的同志们便分赴万水泉、宋家壕与乌梁素海三个勘测基地进行艰苦的厂址勘察工作。

当时的包头条件很差，队员们住的是帐棚和部分民房，一个炕上睡十几个人，拥挤不堪。天气闷热，卫生条件也很差。吃的虽是白面大米，但农村不种菜，到城里买交通又不便，任务又紧迫，因此尽管蔬菜缺乏，大家仍没有一个叫苦的。

为了早日建成包钢，队员们头顶烈日，脚踏黄沙，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又被烈日晒干，如此反复，晚上归来，背心汗衫结上了厚厚的一层硬碱。

有时烈焰灼灼，万里无云。勘测地点不停的转换，使队员们口渴难当。秃秃荒滩，连一棵树木也难找到；这样，有的队员嘴上起了泡，有的裂了口，但是，大家仍然很乐观。一个队员指着自已嘴上的泡诙谐地说：“大家要是熬不住了，我这点甘露无私奉献。”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小憩的时候，同志们便用测量仪器寻找送水工人张巨仓，一旦望见，便欢声雷动。

送水工人张巨仓同志，挑着两桶水到处寻找人影，往往要走三四个小时。为了节约水，他尽管汗流浹背，仍舍不得喝上半口。

紧张的工作，使同志们几乎没有休息日。偶尔因天气太坏停工，大家便利用这天赐良机洗衣、洗澡、写家信，女同志帮助补衣服。全体队员团结互助，十分愉快。当繁星满天之际，帐棚内灯火辉煌，不时传出阵阵悠扬的琴声、歌声，一派欢乐的气氛。

条件如此艰苦，工作这样艰辛，队员们的情绪仍然如此之高，如此乐观，是与领导的共同战斗分不开的。郗处长、赵国栋、杨芝学、何焕之工程师都亲赴第一线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同吃、同住、同劳动。

地质队的郭泽成队长，始终带领队员们战斗在第一线。他们在干沙窝里用人工打钻，一天钻十多米，经常遇到岩石层卡住钻头，每取一个岩心和原状土，都要付出极大代价。但他和队员们群策群力，出色完成了任务。

杨芝学工程师，虽年过半百，但他人老不服老，同样战斗在工地上。

当时的五四钢铁公司总经理杨维同志也到工地上看望大家，给了同志们很大鼓励。

领导的关怀与榜样，增强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与技术修养，大家坚持每周两次的文化学习，他们在帐棚里点起马灯，挂上黑板，几十个人静悄悄地学数学，讲技术，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同时在工作中一边工作，一边练技术。测量队员吕明浩，经过苦练，测量速度创全国纪录，一九五七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从一九五三年六月到一九五四年二月，几经酷暑严冬，全体队员走遍了千滩万丘，不停地测量、打井，收集了地质地貌的宝贵资料。在当地蒙汉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胜利地完成了厂址勘测任务，为包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十年过去了，包钢已作为祖国强大的钢铁支柱，屹立在东方。昔日开拓者的汗水，溶进了奔腾的钢水。他们的功绩，将与草原钢城共存，永为人民赞颂！

本文作者易磐，原系包钢勘测队员，后任
包头第七中学教师，为昆区政协委员

《包头日报》的变迁

〔蒙古族〕巴奎勋

《包头日报》从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改刊，成为中共包头市委机关报以来，已度过三十四个春秋。中共包头市委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作出《关于加强包头日报的决定》中指出：“报纸的根本方针是加强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为包头市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而服务……”，并指出“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教育和组织干部与群众去完成国家建设任务的重要工具。”决定还指出了地方特点、开展批评、全党办报等办好《包头日报》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包头日报》改刊三十周年之际，市委又一次作出了“关于加强包头日报的决定”。在万期纪念之际，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联合发出贺信，并提出了新的要求。

追溯《包头日报》的发展史，还得从旧《包头日报》谈起。旧《包头日报》创办于一九三一年，时办时停。解放前夕曾是国民党包头县党部的机关报，经费由商会和县党部补助。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旧《包头日报》虽没有改版，实际已接受包头市委和人民政府的管理，指定原社长王绥之继续负责，每年给予一定财政补助。当时的社址在东河区和平路南端路西的一个院子里，只有矮矮的三栋平房，工厂、编辑部及单身宿舍都挤在这里，机器设备非常落后，印报机都是手摇式的。改版后的《包头日报》，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市委的关怀和领导，使报社稳步发展

《包头日报》改版成为中共包头市委机关报，揭开了《包头日报》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改版的第一期报纸上，刊登了包头市委作出的《关于加强包头日报》的决定。同时，着手充实和加强编采力量。除先期派出几名青年到当时的《绥远日报》学习外，还从《绥远日报》首批调来王纯宇等四名同志，加强报纸的领导和编采力量，使《包头日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随着包头工业基地进入建设阶段，于一九五四年又从《内蒙古日报》和《绥远日报》调入梁士弟等十三名同志，从华北局调入于文等九名同志，从学生中选调九名同志，从转业军人中调入八名同志，加上改版前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当时编采人员约有四十多人。

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发展，编采队伍也不断充实和调整，一批同志陆续调出，为其它单位输送了骨干力量；一批同志不断调入，为报社补充了新的力量。特别是根据党中央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后，从一九八四年开始，调入一批大专毕业生，开始改变了编采人员年龄老化和文化素质低的状况。现在，编辑部共有七十一人，直接从事编采工作的六十人。

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办报条件和印刷设备不断有所改善。一九五四年，增添了照相制版设备，报纸增加了图片新闻。在新华社电讯的接收方面，有了摩尔斯收报机，改变了靠收音机接收记录新闻的落后状况。一九六〇年，购进了海尔模写机，结束了落后的手抄新华社电稿的时代。一九五四年，曾在东河区新建了印刷厂，更新了印报设备，增加了三十二页平台机。一九六〇年，报社由东河区迁到昆区包头医学院。一九六三年，又在报社印刷厂现址盖了新厂房。一九六五年，购置和安装了轮转机，结束了多年来平台机慢速印报的历史。

在报社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报社领导班子曾作过几次调整。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改版后的第一任总编辑王纯宇，是从原《绥远日报》调入的，一九五五年调包头市委；一九五六年，领导班子作第一次调整，第三任总编辑由市委宣传部部长沈湘汉兼任，于文同志为副总编辑（一九五四年由华北局新闻处调报社）；一九五八年初，辛景月同志由《内蒙古日报》社调包头，任第三任总编辑，一九六二年调新华社宁夏分社，克非同志任副总编辑，一九六二年调市委；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领导班子作第三次调整，任命冯霖同志为第四任总编辑，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调市委，“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又调报社主持工作；一九六八年，市革命委员会调王友众、任锦森到报社，同原报社部分人员组成报社革命委员会，在军管会的领导下主持工作；一九七九年，市委任命赵子平同志为第五任总编辑，王友众、王凤岐、白沉为副总编辑；一九八三年，市委任命刘学谦同志为第六任总编辑，王建业、樊琦秀为副总编辑，以后又任命丁朝卿、王俊晔为副总编辑。

坎坷、曲折的发展历程

《包头日报》不平凡的三十四个头，经历了困难—发展—曲折—发展—劫难—发展的过程。她的坎坷经历同全国、全市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报纸的宣传也曾有过错误。

改版初期，困难重重。后来，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关怀下，人员不断得到充实，设备初步更新，报纸面貌开始改观。正当报纸迈开新的前进步伐时，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反胡风、反右运动在报社内部展开，一批同志被错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报纸的宣传陷入裹足不前的状态。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随着包头工业基地建设进入基建和生产并进的阶段，报社领导班子也作了调整，报纸工作又有了新的跃进。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报

纸由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六版，一九六〇年初，报社由东河区搬到昆区，并在一九六〇年元月七日，改成对开四版大报，以适应包头工业基地建设的宣传报道。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包头日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包头日报的宣传报道也同样犯了浮夸风和“左”的错误。三年困难时期，出报和生产用纸奇缺，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改为对开两版，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四开四版的周三刊小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恢复为周六刊四开四版，又开始了报纸宣传工作的兴旺发达时期。

正当全社职工奋发勇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降临到包头日报社，报纸被戴上“三家村分店”、“乌兰夫的御用工具”等莫须有的罪名，报社领导被夺权，一批编采人员被揪斗。在两派的“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期间，包头日报曾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至二月十日、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两度被迫停刊，改为没有《包头日报》报头的《红电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至三月三日，又改出新字编号的《包头日报》。一九七〇年六月，绝大部分编采人员又被集中到麻池劳动，包头日报的出版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包头日报》也在劫后开始迈出了新的步伐。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恢复了原《包头日报》的编号（包括《红电讯》和新字号的出版期数）。从改刊到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已出刊报纸一万零五百二十五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包头日报》又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纪念《包头日报》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包头市委又一次作出了《关于加强包头日报的决定》，使报纸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举行了出版发行一万期庆祝活动，使新老同志受到鼓舞，增强了进一步办好《包头日报》的信心。

群策群力 不断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出现了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局面。面临报纸宣传工作的黄金时代，报社借纪念报纸改版三十周年和庆祝出版发行万期的机会，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报纸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新时期办好《包头日报》的措施，使报纸宣传工作在振兴包头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报纸改版后，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一九五二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首先扩大了本市新闻的报道领域，除新华社稿件和广告外，本市新闻已占到两个版以上，并新辟了《读者来信》专栏（页）、《职工生活》专栏（页）、《通俗读物》专页、《读报组》专栏、《郊区工作》专栏及画刊专页，使报纸的群众性、服务性有所加强。一九五五年八月—一九五六年四月，先后开辟了《文化生活》、《大青山》、《火花》等专页副刊，以及《青年园地》、《党的生活》、《科学知识》、《妇女与儿童》等专栏。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改出四开六版，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改为对开四版，这标志着《包头日报》不论在报道内容、版面安排等方面，都进入了兴旺发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头日报社全体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医治了“文革”的创伤，恢复了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一方面加强同区内外兄弟报纸的协作，汲取别人的新经验，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为重要报道任务。一九八三年，报社党组提出了“跟市委紧些更紧些，离群众近些更近些”的口号，不断进行新闻改革和创新，报纸的可读性、知识性、服务性、趣味性明显加强。《花雨》副刊改为每天一个专页，并调整和新辟了《读者来信》、《经济信息》、《经济天地》、《德与法》、《党的生活》、《包头市场》、《教育

《园地》、《园丁赞》、《信息波》、《内蒙古各地》等定期或不定期专栏(页),以及文字短小的《一句话新闻》、《每日电讯》、《简明新闻》等专栏。许多不同栏目的专页和专栏,都有不同的栏目;使报纸版面更加活跃,形式生动活泼,报道面更加拓宽,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为包头市的四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全党办报,是办好党报的根本。从《包头日报》改刊以来,编辑部设有专门机构做通讯联络工作,通讯员遍及全市各个角落。专职做通联工作的同志及记者,经常深入基层与通讯员取得联系,或不定期按系统召开会议,进行业务辅导,或与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一起,召开全市通讯员会议,定期或不定期奖励优秀通讯员。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编辑出版《包头日报通讯》,作为转达报社报道意图,进行业务辅导的刊物。这一定期或不定期刊物,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一九八〇年开始,为适应新时期宣传报道的需要,改为每月定期出刊,一直延续到现在。一九八六年,这个刊物改名为《通讯员之友》。通讯员队伍的建设,也是随着包头生产建设的发展不断壮大的。目前,分布在全市各个单位的通讯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三名,通讯员来稿每日平均达一百三十篇,为改革报纸的宣传报道作出了贡献。

报纸的发行工作,也是随着报纸的兴衰而增减。一九五二年改版时,发行量只有八百份。一九五七年,与市邮局配合,深入基层宣传和收订,报纸发行量增加到四千多份,但很不稳定。近年来,经过报纸宣传的改革和创新,报纸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迅猛增加。现在,发行量已达五万一千份(1986年6月),是一九五二年的六十二倍。

印刷厂的起伏

《包头日报》印刷厂,主要任务是为出版报纸服务。所以,印刷厂的起落和报纸的兴衰维系在一起。报纸改版以后,于一九

五四年在东河区建起了新厂房，一九五九年，又在昆区建起了新厂房，这一时期，工厂人数由改版时的十八人猛增到四百三十多人，第一次实现了以厂养报还有结余的好势头。一九六〇年报社迁来昆区，印报系统设在医学院。一九六一年由于纸张缺乏，报纸版面缩小，工厂被迫下马，大部分人员外调，仅留报纸出版所需人员。一九六四年，工厂又建起新厂房，增添了机器设备，人员又增加到二百多人，到“文化大革命”前，第二次实现了自给。一九七二年，市革委会决定，将工厂一分为二，大部分人员和设备交市里，改为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只留下报纸出版设备和三十多名工人。近年来，人员、设备都有增加，除印刷出版每日报纸外，承揽部分厂矿企业小报和小批量零活任务。

× × ×

近年来，《包头日报》在新闻改革方面迈出可喜的步伐，版面安排新颖活泼，内容广泛、稿件短小，办出了地区报纸的特色，为包头市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要求办报人员认真学习区内外兄弟报纸之长，为我所用，提高自己的宣传报道水平，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进入华北地区城市小报的先进行列。另外，《包头日报》现在只发行五万二千多份，与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很不相称。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提高新闻队伍素质，提高报纸宣传报道质量，并且尽早更新已经落后了的印刷设备，更好地适应各方面读者的要求，使发行量有一个大的突破。

作者巴奎勋，系《包头日报》社离休老干部

内蒙古话剧团简史

郑玲 有忠（回族）

正当全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党中央提出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文艺团体逐步实行专业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归绥市（现呼和浩特）由绥远省文工团和山西省总工会文工团为主组建了绥远省话剧团。一九五四年撤销绥远省建制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遂将绥远省话剧团更名为内蒙古话剧团。为支援包钢建设，于一九六二年迁往包头，驻地昆都仑区怡特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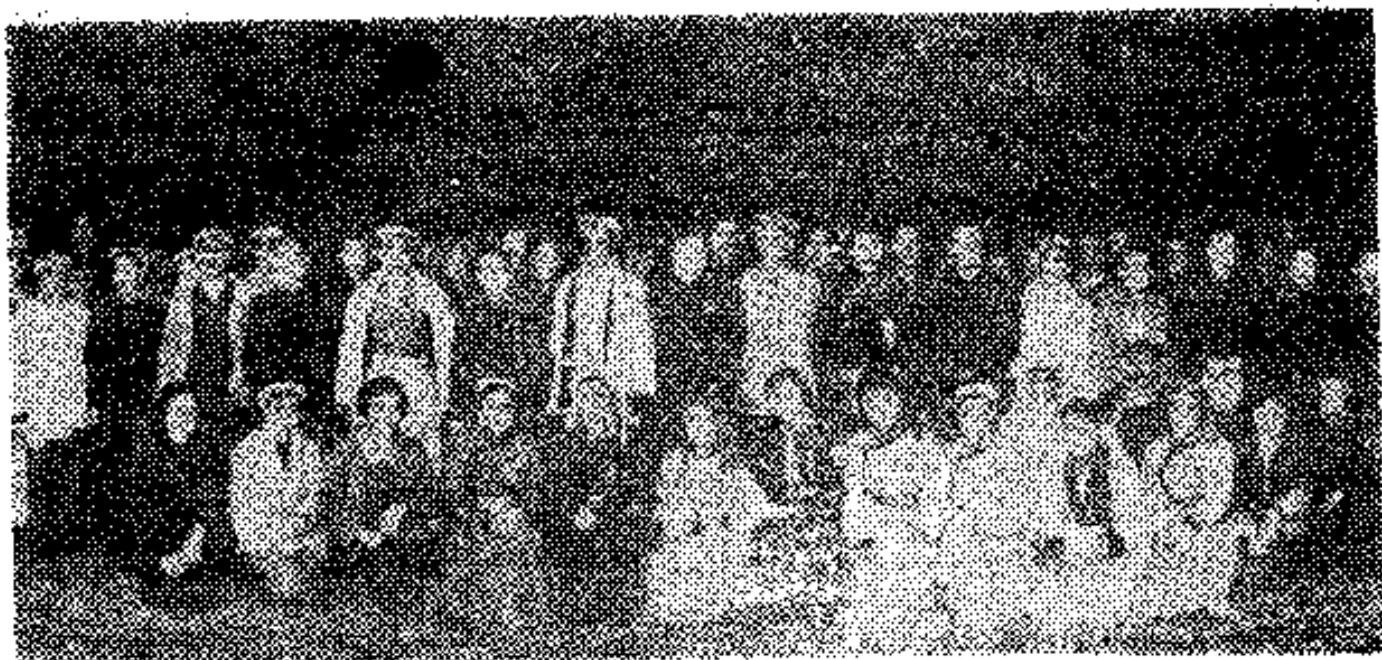
内蒙古话剧团自一九五三年建团至今经历过了三十三个春秋。三十年来，内蒙古话剧团本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排演了古、今、中、外小型话剧剧目一百八十多个。其中如《尤利乌斯·伏契克》、《万水千山》、《阿Q正传》、《八一风暴》、《雷雨》、《日出》、《把一切献给党》、《蔡文姬》、《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年青的一代》、《赤道战鼓》、《槐树庄》、《杜娟山》、《枫叶红了的时候》、《救救她》、《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高山下的花环》、《两个转学生》等剧，受到各界观众的好评和喜爱。超百场的剧目很多，如《八一风暴》是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为题材的。这个戏于一九五八年演出时轰动一时，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一天要演出四、五场。其它如《年青的一代》、《救救她》等也是如此，这在话剧舞台演出史上也是罕见的。

除上述剧目以外，内蒙古话剧团还排演了一批反映内蒙古自治区的革命历史及工农牧业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话剧。这些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戏剧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些自创剧目共有三十多个，在全国及自治区内分别获了奖。如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我团排演的薛焰编创的剧目《在激流中》和超克图纳仁编创的《我们都是哨兵》参加了这次会演。这是内蒙古话剧团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会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在激流中》荣获演出一等奖、舞台制作管理奖、导演奖和演员表演奖，由中央文化部颁发了奖状奖金。

在会演演出时，敬爱的周总理、邓颖超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周总理亲切询问演职员工作学习等情况，并指示要培养蒙古族艺术领导干部。我们还聆听了周总理在怀仁堂为参加会演的全体同志作的报告，全体同志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北京电影制片厂为内蒙古话剧团全体演员拍照留为资料。与此同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吸收第一批会员的时候，内蒙古话剧团乌日娜、朝鲁、刘风歌三位同志被吸收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一九五九年，内蒙专业文艺团体戏剧会演，内蒙话剧团排演了高彬编创的以歌颂蒙汉团结及工业建设中的革新家为题材的《草原赞歌》，该剧由王国栋和敖登其木格主演，荣获演出奖、创作奖。《草原赞歌》赴京汇报演出时，自治区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习仲勋曾专程到招待所看望演职员，中央文化部的领导也专程看了演出并给以好评。

一九六五年，华北区话剧会演，内蒙古话剧团排演了高彬、吴新秦、林凤山编创的以反映我们党培养第一代蒙古族炼钢工人为题材的剧目《包钢人》，该剧是由欧阳洁导演、谷子主演的。在北京首都剧场演出后，被选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演出后受到李先念等中央首长的接见。



话剧《包钢人》在京演出后，中央领导同志上台接见演员。
(李有忠藏图)

会演期间，内蒙古话剧团和与会的演职员荣幸地受到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一九七八年，内蒙古自治区举办专业文艺团体调演，内蒙古话剧团排演了刘汉一编创的《昨天的故事》，该剧由欧阳洁、冯枚、李凤河、张维良导演，由王国栋、李有忠、李瑛、金桂芝、李西林担任主要角色。荣获了创作奖、导演奖、表演奖、效果奖。

一九七九年，内蒙古话剧团排演了蒙古族剧作者阿拉坦奥勒(梁永富)编创的歌颂内蒙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席尼喇嘛》，获得了观众及内蒙文艺界的好评。该剧经作者再度修改后，被一九八二届的内蒙古艺术学校话剧班排演为毕业汇报演出剧目，更名《独贵龙》，再次与观众见面，又一次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独贵龙》获剧本创作奖。

一九八四年，内蒙古自治区举办一盟一团一戏调演。内蒙古话剧团排演了鲁子荣根据内蒙民间传说编创的《森吉德玛》，该剧参加调演后受到自治区领导的重视，自治区主席布赫同志于百忙中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来包审查节目，并召集会议听取意见。在会议上，布赫同志就剧本修改及剧团改革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全团同志很受鼓舞。

《森吉德玛》演出后，获优秀演出奖、创作奖，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颁发了奖金。

近几年来，内蒙话剧团就培养中年作者上也见到了一些成效，刘汉一同志继《昨天的故事》后，于一九八五年又编创排演了反映当前改革题材的剧目《生活四重唱》，并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叶·娜布琪同志从内蒙师大文研班毕业回团后，在一九八五年编写了电视剧《盗墓人》（上、下集），由内蒙话剧团广播电视部与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录制，得到内蒙文化厅领导的肯定，并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播出，得到了各界的好评。一九八六年她又与李有忠一起编创了无场次话剧《天、地、人》，该剧被内蒙话剧团定为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节目。

内蒙古话剧团不仅排演了很多舞台剧，多年来有话剧团演员参加排摄的电影计有十几部，如《草原晨曲》、《金光大道》、《平原游击队》、《祖国啊母亲！》、《母亲湖》、《保密局的枪声》、《马可·波罗》、《远乡风流》等，有的演员曾在影片中担任了主演，如：潘莹、谷子、陈达、李玉泽、李有忠、康洪雷等，在银幕上都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

另外还有更多的演职员参加了自治区内、外的电视剧的摄制工作。如《乔厂长上任记》、《离婚》、《钱放哪儿好？》、《火》、《飞翔的百灵》、《八百米深处》、《笑容满面》、《酒》、《江河的主人》、《姊妹情》等二十几部。其中《八百米深处》里李仰圣创造的形象获得了成功。《八百米深处》、《笑容满面》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内蒙电台和包头电台录制的广播剧，几乎都是由内蒙古话剧团编、导和演播的，如由叶·娜布琪编剧、李有忠导演、话剧团演员演播的《森吉德玛》、《古墓警魂》（上下集），特别是《古墓警魂》，获一九八五年全国市级广播电台优秀节目奖；由汤捷导演并演播的《特殊司机》，获一九八四年全国市级广播电

台优秀节目奖；《民族乐坛》获一九八六年优秀节目奖；其它如《马头琴的故事》、《天山深处的大兵》、《张海迪》、《巴拉根仓的故事》、《葡萄园的故事》、《三号病号》及六集广播连续剧《锅碗瓢盆交响曲》等均受到听众的喜爱。话剧团演员李有忠在内蒙古电台播讲了长篇小说《第二方案》，在包头电台播讲了《金光大道》、《飞雪迎春》。汤捷播讲的《王若飞在狱中》，李瑛播讲的《柳眉儿落了》、李西林播讲的《林海雪源》、《斯巴达克斯》等受到观众的好评。内蒙话剧团还为电影电视剧《水珠》、《艰难的起飞》、《雄狮》等剧配了音。

除上所述，内蒙古话剧团还派出编导人员支援兄弟团体，在帮助厂矿业余文艺演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李凤河同志为包头歌舞团执导了《货郎与小姐》，张维良同志为土左旗乌兰牧骑执导了《多松年》，余自强同志为二冶宣传队执导了《南征北战》，张金相同志为聋哑人基金会执导了《豆腐世家》，汤捷同志为达拉特旗乌兰牧骑执导了《柳情》，武崇仁同志为巴盟歌舞团执导了《三换新郎》，李有忠同志为固阳乌兰牧骑执导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和为包头铁路分局业余话剧队执导了《深夜静悄悄》等，另外还有化妆师刘玉琴同志为呼盟话剧团的《溼巴锡汗》人物做了化妆设计，舞美设计浩特同志为《多松年》作舞台设计，灯光设计崔国瑛同志为包头市实验歌剧团排演的《丰洲滩传奇》做了灯光设计等，都得到了当地领导和观众的好评。

内蒙话剧团的刘汉一同志发表过的剧本计有《乌拉特风情》、《爱与恨》等七个，小说计有《毛茸茸的胡须》、《迷人的夜晚》等短篇小说三篇，其中《毛茸茸的胡须》，被《小说选刊》选登；叶·娜布琪同志发表过的电视剧有《弥合》、《林间悄语》，独幕话剧《意切情深》，小说有《网》、《爱的收获》、《爱的呼唤》等；阿拉坦奥勒发表的剧本《席尼喇嘛》；张金相发表过的电视剧《晴天暗影》；王宗良同志发表过的小话剧《约会》等共约二十几



话剧《高山下的花环》，导演：高杉；梁三喜由李有忠饰；
赵蒙生由魏大鸣饰。（李有忠藏图）

部。其它如快板、鼓书、唱词、相声等群众演唱材料更不计其数。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内蒙古话剧团很重视培养蒙古族演职员和艺术领导干部。如敖登其木格，一九五八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到话剧团后，曾先后扮演过《草原赞歌》中的厂长、《雷雨》中的鲁侍萍、《邢燕子》中的邢燕子、《一双绣花鞋》中的七姨太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不仅如此，还于一九八五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有一位蒙古族青年演员巴图，于一九八一年被选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再如蒙古族编剧人员叶·娜布琪也于一九八二年被选送到内蒙师范学院文研班学习。

另外还有很多蒙古族演员，经话剧团培养成熟后调到更重要的艺术领导岗位上，如曾在《金鹰》中扮演阿拉坦·布尔固德、

在《杜泉山》中扮演雷刚、在《曙光》中扮演贺龙的陈达同志现已调内蒙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室主任；另一位蒙古族演员德力格尔被调到内蒙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其它如调往电台电视台及报刊杂志等单位任领导的同志也很多。

内蒙古话剧团在三十年的舞台实践中培养了一批老演员。这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是在“扭着秧歌进城”的文工团员的基础上步入话剧专业的。随着话剧事业的发展，一九五五年文化事业的领导部门为话剧团输送了我国话剧表演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的毕业生三名；后于一九五八年又由中央戏剧学院分配来二名大学生，充实了导演、表演、舞美工作的力量。此后一九六〇年，内蒙艺校电影戏剧演员班分配来一批中专毕业生二十五人；一九六一年，内蒙古艺术学校话剧班又分配来一批中专毕业生十三人；一九六二年，内蒙古话剧团和包头文工团、话剧团合并。至此内蒙古话剧团经过补充、整顿、提高以后，奠定了比较雄厚的基础。

正当内蒙古话剧团演出日趋成熟兴旺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话剧团是重灾区，一大批老同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有的被打身残，有的迫害致死，有的演职员被下放到工厂当工人，留下的演职员被放到煤矿到井下去采煤。致使一大批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使话剧团的元气大伤。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内蒙古话剧团纠正了冤假错案。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把被下放到工矿企业的演职员都请回来，使得剧团又恢复了青春活力。仅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就排演了大型多幕戏剧二十七台，仅一九七九年一年内就连排三个多幕剧并暴满百场以上。话剧艺术在内蒙古水草肥美的草原上茁壮成长起来了。

在改革的总方针下，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话剧事业必须开拓、创新，为此内蒙古话剧团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在中青

年在职人员中抽调一些如编剧、设计、灯光、化妆、舞台管理等同志选送到北京、上海、内蒙等戏剧院校进修；另一方面由话剧团出师资和内蒙古艺术学校合办了《内蒙艺术学校表演班》，为培养新生力量，提高演出质量，振兴话剧事业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内蒙古话剧团现有的演职员中加入全国戏剧家协会的计有十几名，加入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有二人。加入内蒙戏剧家协会的有四十几名。老演员中如五十年代戏剧学院毕业生高彬同志已担任导演，执导过很多自创剧目如《独贵龙》、《拳王》、《森吉德玛》、《生活四重唱》等。其他如在《胆剑篇》中扮演越王勾践、在《八一风暴》中扮演方代表的王国栋同志，在《雷雨》中扮演鲁贵、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扮演雷军长的李玉泽同志，在《第二次握手》中扮演周总理、在电影《金光大道》中扮演刘祥的谷子同志，在《雷雨》中扮演繁漪的张佩茹同志，在《八一风暴》中扮演夏梦的李风河同志，在《森吉德玛》中扮演斯琴的敖登其木格同志，在《杜娟山》中扮演柯相的刘雁等同志，在内蒙文艺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在观众的心目中留有极深的印象。他们虽然大部分年过半百（李玉泽已年过花甲），然而仍然参加排练，并用他们对艺术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影响激励着年青一代。他们所创造的各种人物形象至今使观众记忆犹新，这说明他们有较强的艺术造诣和艺术魅力。

随着舞台实践及拍摄电影电视剧，一批中年演员逐步成熟起来。如李有忠同志，他不仅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电影《母亲湖》里塑造的国民党少将司令黄亚丁和在电视剧《江河主人》里塑造的鲁副指挥，都给广大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李瑛是观众较熟悉的演员，他不仅在舞台剧中创造了许多人物形象，还在电视剧《笑容满面》、《钱放哪儿好》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他还演播了很多广播剧、小说等，在观众中博得了好评。汤捷在舞台上也塑造了许多不同形象的人物，在电视剧《离婚》

中创造的角色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他在广播剧上更有独到之处，单只他一个人就编导演过十六个广播剧。以上这些同志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话剧团的骨干力量，青年演员也成长起来了，他们通过舞台实践正日趋成熟，如在《救救她》中扮演李小霞的袁丽丽，在《生活四重唱》中扮演塔拉的程雅娴，在《三换新郎》中扮演主角白爱仙并在电视剧《离婚》、《飞翔的百灵》中扮演女主角的王建英，在《年青一代》中扮演小李子的李勇生，在《森吉德玛》中扮演巴特尔的魏大鸣，在《独贵龙》中扮演男主角的丁勇岱，在《蒙德斯威尔庄园谋杀案》中扮演教员莫莉并在电视剧《姊妹情》中扮演姐姐的张伟等，在舞台上脱颖而出。为了适应话剧事业的发展，话剧团今后还将在培养人材上继续努力。

内蒙古话剧团配合包头市各项工作的宣传活动也做了不少工作。如计划生育、五讲四美三热爱、人口普查、储蓄宣传等，曾编演多种形式的小节目，以小分队的演出形式先后到市三区的街头、广场及郊区的麻池、哈业脑包、哈业胡同、固阳、沙尔沁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受到群众欢迎。

话剧团多年来总是把排演的新戏送到本市各厂矿企业，如在包钢、二冶、糖厂、轻机厂、二〇二厂、三〇三厂、一机厂、二机厂、石拐矿区、白云矿区等地演出，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内蒙古话剧团在立足于为本市、全区各盟市演出以外还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作巡回演出，行程达数万里，共演出六千五百多场，观众达六百万人次，使话剧团的演出水平和演职员的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

目前内蒙古话剧团为了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正在紧张地排练以包头市第九中学陆家羲为原型，反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无场次话剧《天、地、人》，该剧以新颖的形式，熔戏剧、舞蹈、音乐于一炉。将于一九八七年与观众见面。

昆都仑河畔的一块绿色园圃

秦新民

座落在昆都仑河畔的包头市第九中学，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之一，是同包钢一起成长起来的一所完全中学。如果说它在1957年建校之初，不过是荒原上新开拓的一块处女地的话，那么，在党的雨露滋润下，经过园丁们的辛勤耕耘，如今，它已是一块百卉斗艳、硕果挂枝的绿色园圃了。近三十年来，它为国家输送了各种建设人才近五万名，其中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约两万五千名。从林海雪原的兴安岭，到椰子飘香的海南岛，从最高学府的庄严讲坛，到老山前线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有活跃于四化建设中的包九中校友。他们之中，有的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如包家骏；有的已成为共和国年轻的博士，如顾炳林；有的已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优秀领导者，如孟苏明。桃李满天下，才俊遍中华，就是对这个学校的毫不夸张的写照。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国新兴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的包钢开始创建，内地成批的建设者纷纷涌来，作为包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昆都仑区拔地而起。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包头市委和政府决定拨出专款76万元，创建包头市第九中学，并委派金熙弘、鲁亮等同志负责筹建。一场紧锣密鼓的战斗打响了。

1957年9月1日，包头市第九中学正式宣布成立。1958年2月，韩强同志被任命为校长。她是蒙族，1938年参加革命，来校

前任包头市计委副秘书长。为了党的教育事业，她不计较名位，不畏惧困难，自愿来到基层创业，并在此后谢绝了多次调迁的拟议，决心终身从事教育工作，这种精神至今仍为师生所称道。应该公正地说，“文革”前九年九中的黄金时代与韩强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

韩强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抓教学上。她知道，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人要靠教学，教学要靠教师，因此，她在延揽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每年暑期，她都要四处奔走，在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中挑选优秀的教师，千方百计争取派来九中。上级分来的教师，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谈话、试教，不能胜任的绝不苟且。她还注意在社会上物色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敢于冒险延聘有“问题”的人，如李道和、秦新民、张膺白等都是“右派”，她都请来学校，给以信任。

对教师的培养和爱护，是韩强的突出优点。她亲自给教师上党课，讲我党的革命传统，讲她自己参加革命的体会。她经常深入教师中间，同他们促膝谈心，全校的教师没有没谈过的，大家都乐于跟她接近。她很理解教师，对他们的困难，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女教师的子女入托难，学校便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办起托儿所；教师有了病，学校领导亲自找熟悉的大夫治疗；哪位教师经济上有困难，学校主动给以经济补助；年轻教师到了婚恋年龄，韩强同志又忙着为他们牵引红线，“文革”前九中青年教师有几十人结婚，其中多数是韩强所玉成的。

党的关怀，领导的民主作风极大地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了九中良好教风的形成，教师对教学工作都能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班主任跟学生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学生的“知心人”。课外的各种活动搞得十分活跃，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生动活泼的结合学科的活动。教师钻研教学的风气很浓，教研组活动富有学术气息，互相观摩蔚成风气，晚上在办公室备课几乎成为常

规，常常要领导催促才肯休息。

在抓教学的同时，韩强同志也极为重视学校的基本建设。当时学校的教学楼虽已建成，但整个校园还是一片乱石杂草滩。韩强同志适时地提出“劳动建校”的号召，把教育同劳动生产结合起来，以身作则，同全校师生一起开辟了平整的四百米跑道和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从数里之外运回石头，砌成了迄今为止市内中小学所仅见的游泳池；开垦了基本能供应老师吃菜的菜园；建立了小型的动植物园、气象台。在校园内遍植花木，形成了优美的学习环境。与此同时，勤工俭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当时的学校乐队就是用勤工俭学的收入购置乐器而建立起来的。

艰苦奋斗换来了累累硕果，1959年包九中的首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国家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即获得了内蒙全区第四名的出色成绩，此后的历届高考也都名列前茅。学校的运动队、文艺队也在多次比赛和汇演中获得荣誉。九中，终于成为全自治区闻名的学校了。

然而，令人痛心的十年内乱开始了，九中被推入令人触目惊心的混战之中。

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九中的历史又掀开新的一页。以于宗隆为书记、鲁亮为校长的领导班子，着手在医治“文革”创伤的基础上开创九中的新局面。

“文革”造成的最大破坏，莫过于教学的正常秩序被严重地打乱，教学设施被严重地毁坏。学校领导与全体教职员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遗余力地下了很大功夫。投资12万元添置了实验仪器和药品，重建了生物园和气象台，图书馆藏书从原来的几千册扩充到了3万余册。为了使學生得到全面发展，还重开了游泳池，整修了篮球场，设置了电化教育室等。为了使教学复入正常轨道，学校适时地调整了教研组、年级组的组长，使具有多

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和中年教师，发挥了他们的力量。许多被弃置的有关教学的规章制度，又重新加以强调，予以修订，使教学有所遵循。对于课堂教学这一教学的基本形式，学校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组织了多种形式的观摩、交流、检查，对那些教学有方、确有建树的教师，及时进行了表彰。就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1979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中，力夺了全区第一名。从79年到83年，均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82年被评为内蒙先进单位。

1983年，在包九中的历史上出现了极不寻常的闪耀着夺目异彩的一页。物理教师陆家羲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总题目为《论不相交的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七篇论文，从而解决了世界组合数学界一百三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并为中外同行所公认。但是，正当盛年的这位科学家却因积劳成疾，竟在参加中国数学会一九八三年年会后返包的当日（十月三十一日），因急性心脏猝死而逝世。包九中师生痛失良师益友，中国和世界数学界痛失英才，然而，他的为科学事业而拼搏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着包九中的师生奋发前进。

1984年以来，学校又组成了以刘雪为党总支书记、肖立广为校长的领导班子，在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新领导到校时，适逢整党开始，他们加强了整党工作的领导，认真按照中央关于整党工作的精神行事，从党内的思想建设入手，进一步进行了组织建设，发展了14名教师入党。与此同时，对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采取有力措施，使政教处、工会、团委、学生会、年级组、班主任、学生干部及家长委员会拧成一线，把工作的触角伸到每个环节，形成一个细密的网络。政教处是原教导处一分为二后出现的，这一改革对加强思想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政教处定期召开思想工作研讨会，注意了抓计划、抓总结、抓学生干部的培养，对各班出现的新经验给以推

广，如“每日班长”、“值周班长”、“班委会自己组阁”等好作法，都得到热情肯定。

学校的教学改革工作也在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过去一年一度的教学总结会发展为较大规模的教学研讨会，为教师举办了教育学、心理学的讲座，同全国五十多所同类学校建立了教学信息网，及时引进各地先进经验，以推动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改革。学校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双基不减弱，能力要提高”的要求，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改革，在课堂教学中，提出“少、精、活”的三字原则，要求教师在“精”字上下功夫，在“活”字上做文章，在“能力”上找出路。在毕业班级中，学校总结出“成绩跟踪，分类推进，同步提高”的经验，在教学实践中也收到了显著效果。此外，还增设了选修课，如计算机、技术小制作、音乐欣赏、美术欣赏、书法等，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1985年开始，学校还大力改善了教学设施，使之进一步现代化，以适应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需要。图书馆和阅览室、资料室的藏书更丰富了，仅教工资料室就订有报刊514份。建立了电子计算机房、语音室，为外语组配备了录音机和英文打字机，天象厅也建成在望。学校实验室不仅继续引进新设备，而且加强了科学管理，建立了实验卡、演示卡、总复习实验卡片等，并以其出色的工作获得内蒙古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辛勤的工作和改革的实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从84年到86年，九中均被评为包头市先进单位，还获得“文明学校”、“工会工作先进集体”、“科技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受到团中央的锦旗嘉奖。1985年全国高考中，九中的学生以其优异成绩名列内蒙第一名。

今天的包九中共有教学班38个，学生1999名，教职工186人。教师中一至四级教师31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93%，不少教

师学有专长，在市内不少学术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样一支强有力的教学队伍教导下，学生的学风很好，文明礼貌蔚成风气。学校的教学设备、校容校貌均达到较高水平。如今，九中的师生，正在新班子的领导下，在全国改革的热潮中奋勇前进。展望未来，九中，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贡献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本文作者秦新民，系包九中一级教师

· 来函照登 ·

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读你们所编《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诗人郭小川在包头》（此文先刊于《包头日报》）我想说两句话。

一、作者在提《思想杂谈》的作者马铁丁时，误将作者之一的王铁夫说成为张铁夫了。

二、此文本是纪实性的文字，但对许多事情却没提及。玛拉沁夫调离包头后，因我在市文联主持工作，玛拉沁夫通过电话告知郭小川一行将来包头的消息首先是告诉我的。郭小川、陈笑雨、侯金镜来包是由作家玛拉沁夫、诗人纳·赛音超克图陪同前来的。在包期间，除玛、纳赛外，主要由我陪同活动。客人来包除该文所提到的几处之外，还参观了当时比较小的包钢稀土研究所，之后又途经固阳，去白云鄂博铁矿山，前后三天才返回包头。临行前市文联在市第二文化宫举办了文学报告会，会上请郭小川、侯金镜作了精彩讲话。以上活动都很重要，惜作者只字未提。此外，十二点之后参观出钢之说也不确。确切时间应当是下午九点。至于其它详细情节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

为严肃贵刊计，希有以披露！

包头市文联 汪 焰

86年10月8日

邓拓包头之行及其有关史料

胡 晓

一、收集邓拓在包头珍留的部分诗词题记

饮恨已逝十三春，否极泰来转乾坤。
荣辱何曾生前计，功过自有后世论。
文章似剑砭时弊，诗词如火砺征人。
重读倍觉真谛在，心香一瓣慰忠魂！

这是我在一九七九年五月，邓拓同志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十三周年时写下的一首悼诗。当时，一桩触目惊心的“三家村”文字狱已经被推倒，邓拓同志的冤案已经昭雪，因其冤狱被株连的事件和被迫害打击的同志也都得到彻底平反，此时此刻曾被冠以“邓拓的忠实走卒”的我，自然是万分激动的。这之后不久，《邓拓诗词选》、《燕山夜话》、《邓拓散文选》相继出版，我读过之后，掩卷思索，情不自己。想到了邓拓同志一九六四年来包头时曾珍留下许多诗词和墨迹，便想做些收集这些珍贵史料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来，还其庐山真面目以告慰作者于地下；二来，通过发表可以证其真伪，以满足关心这些诗词墨迹的广大读者的要求，使大家重新鉴赏这些一度被诬为“黑诗”，“毒草”的诗的真正社会价值。我想，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业余诗词爱好者，自然是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

为了详细了解当时邓拓来包头的难忘情景，我曾利用业余时间访问了许多当年受到邓拓同志接见过而后又被“三家村”冤案株连的一些老同志，并从当时的《包头日报》文艺副刊、《包头文艺》以及其它有关材料中，收集到部分发表手稿和未公开发表的一些诗词及个别真迹，自然，

在那个长达十年的空前浩劫中，大量的邓拓在包头所书的墨宝、留影已付之一炬了，欣慰之余，又怎能不余痛绞心而怆然泣下呢？至于那些遗漏的部分诗词及真迹仍须恳切申明，还有待于继续挖掘、抢救，以便做到使革命文史资料完整无缺，以补包头史页的空白，并藉此告革命前辈于地下而无愧于生者之眷念。这便是我撰著此文的心迹，也可算作纪念邓拓同志被“四人帮”惨害致死二十周年应该记取的千古难磨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吧！

二、邓拓同志的包头之行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天。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我国新闻界老前辈、著名诗人、书法家邓拓同志，冒着塞外严寒，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邓拓同志应内蒙文艺界之邀进行了座谈，并即兴书诗十余首以纪实（详见一九八〇年内蒙《鸿雁》杂志第一期邓拓组诗手稿及玛拉沁夫的文章）。会议结束后，邓拓同志应包头市委的热情邀请，于三月上旬来包头作了短期的参观访问。

邓拓同志出于对新兴的草原钢城的建设事业和包头建设者的亲切关怀，风尘仆仆地视察了包钢、白云铁矿等许多单位，并利用视察访问的空隙接见了包头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科技界的一些同志。在短短的两个下午的时间里，和被接见的同志们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热烈友好的座谈。

座谈会是在包头青山宾馆一号楼接待厅进行的。据参加座谈会的一些同志回忆说，当邓拓同志在市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进入接待厅时，他以亲切的目光、和蔼可亲的笑容向到会的同志们热情地招手致意，大家对邓拓同志的亲切关怀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看到，邓拓同志中等身材，身着朴素的藏蓝色制服，面庞清瘦，精神饱满，仪容大雅，亲切感人。邓拓同志曾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新闻界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报人”。一九三七年冬，他在晋察冀边区创办了我党的《抗敌报》，随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那时，报社的队伍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编辑、记者一手拿枪，一手拿笔。邓拓同志既是报纸的总编辑，又是战斗的指挥员。行军途中，他除了部署战斗任务，又要亲手写评论和重大新闻。

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晋察冀日报》是在残酷的反“围攻”、反“扫荡”战争中坚持出版的。据邓拓夫人丁一岚讲，当时报社就牺牲了二十多名同志。一九四八年六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晋察冀日报》和原晋冀鲁豫区的《人民日报》合并仍名《人民日报》，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就成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邓拓同志在主编《人民日报》时，积累了丰富的宣传工作的经验。座谈会上，他用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动听的声调，毫不保留地就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文艺、新闻、教育、人才等工作以及怎样办好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报刊、杂志、广播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毛主席提倡说话、写文章要开门见山，我们应当响应这个号召（笔者理解指实事求是的文风）。这次我到呼和浩特、包头觉得很好，特别是包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这么多，环境这么宽广、辽阔……象毛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多好啊！”接着，他生动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题材，风格多样化和怎样办好具有地方特色的报刊、广播节目等问题，并指出：“新闻、报纸、电台、文艺创作、演出、刊物，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对新闻、文艺工作者的成长倍加关怀，他强调要从党的事业出发，要求编辑、记者应当成为博学多识的人才，把报纸、刊物办得富有特色。他说：“报纸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的。因此，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邓拓的讲话态度恳切，语调动听，才思敏捷，举例生动，着重强调了党的宣传工作应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作用。这些宝贵的意见，时至今日，还有积极的意义。那天下午，由于时间较晚了，大家也有许多话要讲，市委领导同志征得了邓拓同志的同意，决定再抽时间座谈。参加会议的包头文联和包头日报党组的负责同志，还将复刊后的《包头文艺》和《包头日报》近期的合订本留赠给邓拓同志。散会时，市委领导同志还告诉文联的同志下次来时带上纸笔，请邓拓同志题诗留念。

第二天下午，座谈会仍在原地进行。问题谈得比前一次更具体，座谈的气氛也比前一次更亲切、随和，邓拓同志谈笑风生地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志们对邓拓同志渊博的学识由衷地敬佩。会议结束后，根据大家的请求，邓拓同志即兴题赠诗书。这时，只见服务员搬来了一张方桌，

临时作为书案。纸笔的质量也较差，但邓拓同志不象有的书法家对笔墨纸砚那样刻意讲究，他随便选了一支试了试笔锋就得心应手地写了起来。这时，大家都围拢书桌，摩肩观赏。邓拓同志首先为《包头文艺》题诗。他诗才横溢，书法劲秀，濡墨挥毫，自成格局。转瞬之间，一幅四尺长的宣纸上书满了洋洋洒洒的一首七律诗《祝《包头文艺》复刊》，观赏的同志相视点头，无不啧啧称赞。接着，邓拓同志又题写了歌颂包头建设的一首七律诗《包头旅次》和题赠白云鄂博党委的一首五律诗《畴昔敖包耸》，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包头和白云铁矿的飞速发展（详见所附诗的手稿）。之后，应包头日报编委会的请求，题写了一首《毛锥日夜写纵横》的七言绝句。紧接着又应广播电台、教育局、文化局、科委和青山宾馆的请求，题赠了诗书。邓拓同志的书法与他的诗词一样，既有燕赵挺劲之豪气，又有南国娟秀之风格，技艺精湛，摇曳多姿。诗书如其人，这与邓拓同志的高深修养、才学超人以及热情开朗的性格，潇洒俊逸的风度完全一致。

在深情的依依惜别之时，邓拓同志和大家合影留念。邓拓同志在包头的时时间虽很短暂，但却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那亲切感人的演讲，才思敏捷的诗词，精湛娴熟的书艺，清癯劲健的身姿，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令人永难忘怀。

三、邓拓在包头珍留的诗词鉴赏

从收集到的邓拓同志在包头珍留的部分诗词来看，和他的其它诗作一样，忠实地记录了党和人民进军的步伐，生动地讴歌了包头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社会主义边塞钢城的新生活，以炽热的笔触，满腔热忱地歌颂了蒙汉各民族的团结情谊和对党、对祖国的无比爱戴。

“无情未必真豪杰”。凡是读过邓拓同志诗词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鲜明感觉：邓拓同志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豪放派诗人，他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即兴诗书，一挥而就。曾和邓拓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诗人、散文家袁鹰同志在《不朽的诗魂》（原文见《邓拓诗词选》附录）一文中说：“作为诗人的邓拓同志，跟作为党报总编辑的他一样，以满腔热情宣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全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

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诗。他好似一位现代的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得是亲身所见所闻，唱的是人民喜怒哀乐。……在短暂的旅途上，却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崭新的画幅和出土的春苗。他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鼓手和歌手。他的诗里，还常常出现一些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放开歌喉了。”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邓拓同志在包头所写的诗词，就是这样的“急就章”。（据有关人士讲，邓拓同志在包头期间也有给个人的答题咏，可惜，由于条件限制，我未能收集到。）现仅将我收集到的诗词及部分手稿附上，并试作鉴赏，以辨真伪——

《赠铁山党委会留念》（附手稿）

畴昔救包岑，相传是宝山。
白云浮富气，金马奏刀环。
此地高楼起，安居大漠间。
十年新建设，无意话辛艰。

原诗无题，现题系笔者所加。诗后有小跋：“一九六四年春日过包钢铁山，书此以赠铁山党委会留念。”这首诗是邓拓同志在包头市委和包钢党委领导同志陪同下，参观访问白云鄂博铁矿之后题写的。这首五言律诗热情讴歌了蒙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建设白云鄂博铁矿的英雄

事迹。前四句用典，后四句写实。全诗音韵铿锵悦耳，余味无穷，把诗人奔腾流泻的感情，通过形象生动的诗句，注入了读者的心田。

白云鄂博，原名为“白音巴图敖包”，汉语音译为“富饶美丽的宝山”。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的一位将领经过这里，伫立于白云鄂博峰顶时，他的坐骑被铁山吸引住，变成了一匹金马驹，溶入了宝山。此后曾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民，看到过这匹金马驹在太阳未出山时跑到山下的白音布拉格去饮水，以后再也没见出来。又传，解放后那匹金马驹天天下山驮着宝石去为人民造福。

诗人对这个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极感兴趣，诗中写到：“白云浮富气，金马奏刀环。”这两句系律诗的颔联，从地名来看，是指白云鄂博宝山呈现出一派富饶景象。用一“浮”字，使白云一词语意双关；“金马”一词，最早见于《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意思是金神形状似马。这里是指传说中的金马驹；“刀环”，指刀头之环，以此借喻金马驹所系之铃。诗人用美妙的传说故事来衬托蒙汉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力，突出歌颂了神话般的建设奇迹。所以尾联两句说，人民都在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事业而辛勤战斗，哪里还顾得上去叙谈创业的艰难辛苦呢！全诗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工人阶级不畏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读来感人肺腑。

《包头旅次》（附手稿）

钢花铁水建新城，大漠醒时大厦成。
杨柳丛生添野趣，沧桑巨变畅心情。
人工更比天公巧，西市相沿东市名。
亘古流沙今可治，黄河指日看澄清。
一九六四年三月写于包头新市

此诗已收在《邓拓诗词选》，题为《包头旅次》。

这首诗刚健清新，气魄宏大。它象一幅线条粗犷扎实、质感强烈的油画，为我们勾勒出了建设中的草原钢城的崭新面貌，高度赞扬了包头建设者在“亘古流沙”的大漠上，用辛勤的劳动和巧夺天工的双手，建成了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距此四年前，经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手剪彩的包钢，已是“钢花铁水”争相映辉的钢铁基地了。

全诗运用白描手法以次勾勒，前两句用高度概括手法点题，中间两联对

钢铁洪流建新城
 大厦摩天
 杨柳丛生
 铁水奔流
 富于诗情画意
 现代化城市
 最后诗人欣然将笔锋一转
 唱出了“黄河指日看澄清”
 这句既有美好期待和理想
 又富有浪漫色彩的佳句
 全诗到此嘎然而止
 给人以言犹未尽、意无穷的感觉
 留下的丰富多彩的画面
 就让读者去想象、勾勒好了！

仗工巧，形象生动逼真，寓情于景，笔底如行云流水，奔放自然，这与诗人欢欣的情思是相吻合的。如果说“大厦”系指包头新兴工业基地的建筑，那么，“西市”即指包头昆区、青山（新城），与“东市”（东河区，即旧包头）的名字沿袭而来的。这三区就组成了包头市相约三十多公里的市区“新城”。当年，建于荒漠沙原的包头工业基地，而今，已是高楼鳞次栉比，杨柳丛生，钢花飞溅，铁水奔流的富于诗情画意的现代化城市了。最后，诗人欣然将笔锋一转，唱出了“黄河指日看澄清”这句既有美好期待和理想，又富有浪漫色彩的佳句。全诗到此嘎然而止，给人以言犹未尽、意无穷的感觉，留下的丰富多彩的画面，就让读者去想象、勾勒好了！

《包头新刊》

重开艺苑立文坛，小别三年相见欢。
 战马歌声催鼓角，白云诗句振衰残。
 已消鹿野千层雪，不见钢都一字难。
 创造热情天地阔，新人新事满新刊。

《祝《包头文艺》复刊》注：此诗已收在《邓拓诗词选》，与《包头旅次》均见该书147页，未注明写作年月。

这首诗是为祝贺《包头文艺》复刊所写的七言律诗。全诗高度颂扬了包头各族人民建设新兴的包头工业基地的创造热情和复刊后的《包头文艺》以及崭露才华的新人新作。

《包头文艺》是包头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即现在的《鹿鸣》杂志，原名《钢城火花》，创刊于一九五九年元月。它的主要任务正如《创刊词》中所说：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双百方针，培养各族文艺新军。”该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为双月刊，下半年改为月刊。一九六〇年由于贯彻党的调整方针而暂时停刊，共出二十期。一九六四年复刊后更名为《包头文艺》，复刊后共出刊二十六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被迫停刊。从《钢城火花》到《包头文艺》复刊，都受到了全国著名作家的关注。郭沫若曾两次为它题了刊头字。茅盾在弥留之际还为改刊后的《鹿鸣》题了刊名。

邓拓同志来包头视察工作时，正值《包头文艺》复刊不久。当他看到了复刊后的第一期刊物时非常高兴。正如包头市文联主席汪焰同志回忆邓拓同志题这首诗的情景时所说：“邓拓同志翻阅过带给他的那期刊物，心里已有了一个腹稿，所以他提笔后略加思索，就濡墨挥毫疾书，一挥而就。”我虽没赶上观看这振奋人心的即兴书诗的场面，但从那诗的工整、书法的浑然天成，我觉得，观赏如此才思超然的激动人心的表演，确实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精神享受。

“重开艺苑立文坛，小别三年相见欢。”表达了诗人见到复刊后的《包头文艺》时的喜悦心情。“战马”与“白云”一联是从刊物中登载的《战马歌》、《白云鄂博诗抄》引出的。颈联从冰消雪化，气爽风柔的春景写起，感情细腻真挚，意境优美舒阔，以景寓情，情景交融，饱含着诗人对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的赞美。紧接着自然地转入尾联：

“创造热情天地阔，新人新事满新刊。”前句承上歌颂了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改天换地的劳动热情，后句连用三个“新”字，表达了诗人对复刊后的《包头文艺》的鼓励和赞许。同时，又紧紧扣住主题的一个“新”字，使复刊后包头文坛的新面貌跃然纸上。这首诗虽系旧体，读起来却清新明快，琅琅上口，诗人运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抓住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细腻刻画，使全诗既有宏大气魄，又有鲜明形象，两者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敬赠包头日报编委会》

毛锥日夜写纵横，
无限英雄战斗情。
鹿野钢都新天地，

文旗浩荡树边城。

一九六四年过包头，小住数日。读《包头日报》，
偶作小诗一绝，以志此行。临别率尔奉题，敬赠
《包头日报》编辑委员会。

邓拓同志为《包头日报》编辑委员会的题诗附记，简要地记叙了这首七言绝句的背景和心情，饱含着对同行的勉励和革命情谊。

“毛锥日夜写纵横，无限英雄战斗情。”“毛锥”，指小楷毛笔，有“小毛锥”之名；“纵横”，一指横竖交错，如王安石《即事》诗：“纵横一川水，高下四五家。”一指奔放不羁，如杜甫《戏为六绝句》诗：“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两句诗对满怀革命豪情的编辑记者日夜奋笔战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彰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热情赞扬和鼓励。这简短的十四个字凝聚着一个新闻老前辈的多少心血和深刻感受啊。邓拓曾说：“不要做新闻官，做新闻工作，从总编辑到编辑，从记者到试习生，都应该不断地写文章，记者是一辈子的职业。记者工作永远离不开采访和写作。记者无论担任了什么行政职务，对报纸来说，他都是本报记者，都应该不断地写东西。”他认为：把新闻工作的岗位当作“官儿”来做，光坐在屋里开会，动动嘴而不写文章，这是要不得的。记者应该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活跃在采访前线，记者的笔是什么时候也不应该放下的。这话讲得非常深刻，它应该是我们“报人”的座右铭。

“鹿野钢都新天地，文旗浩荡树边城。”这两句诗以深切的感情充分肯定了党报在党的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它应该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起到“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象一面鲜艳旗帜，飘荡在边塞钢城人民的心中。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鼓励，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

《词三首》

(一)

阴山畔，
宾馆立新城。
万里云天招远客，

几多战友话深情，
诗思如潮生。

留赠青山宾馆

(二)

为革命，
继往又开来。
教育工农新一代，
边疆建设赖人才，
竞赛打擂台！

为包头教育局赠词，匆匆未及推敲

(三)

高潮起，
广播好宣扬。
团结盟旗千万众，
人民事业似朝阳，
莫负好春光。

为包头人民广播电台题词

这三首词是分别题赠给包头人民广播电台、包头教育局和包头青山宾馆的。原无题，应属《忆江南》词格，全无用典，正象邓拓同志说的，由于是即兴题写，“匆匆未及推敲”，似不及其诗精到。但读起来感到清新流畅，通俗易懂。

《留赠青山宾馆》一词，记述了当时诗人小住宾馆时的真切见闻和内心感受。你看，一抹苍翠的青山山麓，矗立起一座壮丽幽雅的宾馆。而这里，正是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陈毅元帅等中央首长来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住过的地方。四年之后，诗人笔下的塞外，远不是古代诗人所描绘的“羌管悠悠霜满地”、“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景象，而是钢花铁水、厂房耸立的新兴工业城市了。诗人的心情自然是异常兴奋激动的，他感到辽阔的塞外云天，也好象是亲切地招手，在欢迎远方的宾客；多少战友汇聚在这温暖如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畅叙美好理

想，展望建设宏图，倍感情深意长的诗的思绪，就象海潮一样，从内心迸发了出来。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犹为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祖国的边疆建设，需要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是革命事业的千秋大计，是迫于眉睫的当务之急。这首题教育战线的词，是对教育工作者的鼓舞和鞭策。“边疆建设赖人才，竞赛打擂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有赖于园丁的辛勤努力。诗人在热切地期待着。

题赠给包头人民广播电台的词，同上首风格相近，但鲜明生动，富于感召力。词中将伟大的人民事业比作东方初升的朝阳光辉灿烂，劝勉党的新闻广播工作者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搞好党的宣传工作，莫负时代的大好春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不朽诗魂永载史册

邓拓同志的包头之行，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那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他那对宣传工作者的关怀和鼓励，他那才华横溢、令人感奋的革命诗词，他那笔走龙蛇、劲秀隽永的书艺，他那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刻在包头人民的心上。

人们怀念邓拓同志，盼望他能重访包头，谁料想天降横祸，噩耗裂心，在他离开包头两年后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死于非命。在包头受其株连的文字狱何止万千，每每提及，肝肠寸断，真是一言难尽！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祸及全国的“三家村”冤案昭雪了！死者地下欣慰，生者正气伸张。邓拓同志没有死，精英诗魂永不灭！邓拓同志二十三年前的包头之行光明磊落，载入史册！他为我们留下的珍贵诗词和他所有的诗词一样，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的征途 中奋斗不息！

五、邓拓夫人的热情来信及亲切接见

“胡晓同志……王必胜同志转来了《百灵》杂志，看到邓拓同志在包头题赠的诗词和你的大作，十分高兴，谢谢你！”

我和邓拓分别在两个单位工作，他出差时，我们没有同行过，那次他去包头的情景，我一直没有听他说过，看到你的记述，确实是音容犹在。

我已经收集了老邓诗词手迹一百多幅，准备集在一起，出一本‘手迹选’，供爱好他的诗词与书法的人阅读。见到《百灵》杂志上的三幅字，很想收入‘选集’中，请帮我各加印6吋大的各两张，如还有别的字幅，也请代拍照，加工费由我付给。我想在二月底前将稿备齐，福建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收到这期《百灵》真是意外的发现，很感激你！

致

敬礼！

丁一岚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五日”

以上所节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台台长、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给我的来信。所附信件见手稿。

这封热情的来信是在邓拓夫人看到了我在《百灵》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登载的《诗词如火砺征人——收集、学习邓拓同志在包头题赠的部分诗词札记》一文后当即复信的。这份杂志是由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王必胜同志（著有《邓拓同志评传》，现已出版）看到我的文章后转呈邓拓夫人的。邓拓夫人的来信肯定了以下三点：一、邓拓同志的包头之行“一直没有听他说过”，此文弥补了邓拓同志革命史略的空白；二、此文所附邓拓诗词手迹对出版《邓拓同志诗词手迹选》起到了补充作用；三、邓拓夫人对此文的“意外发现”，表示感激和致谢。

邓拓夫人如此谦虚和平易近人，使我非常感动。她在百忙中热情的来函更使我由衷敬佩，这是远出于我的意料的。我这种感觉特别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半前去拜访并荣幸地得到她的亲切接见后进一步证实的。

那天，我因公出差到中央电视台，办完事后已上午十一时许，顺便到了国际台，组织部门的同志把我拜访邓拓夫人的愿望作了转达，然后告诉我，邓拓夫人刚访问美国回来在听台内的工作汇报，她答应下午二时半接见你，丁一岚同志如此之忙还能够很快接见我这个极普通的“小人物”，我感到格外高兴。

下午，按约定时间，我提前十分钟赶到了国际台，组织部门的同志已

经在等待了，他把我领到了邓拓夫人的办公室。炎炎的夏日，邓拓夫人中午并没有休息，她仍在伏案工作。经介绍后，邓拓夫人迎上前来向我握手并热情地说：“你就是胡晓同志，从内蒙来？《百灵》杂志是必胜同志转给我的，你的诗和文使我很感动。我看后当即复了信，你收集并寄来的老邓诗词手稿我也收到了，谢谢你，请坐。”

待我坐后，邓拓夫人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看上去她五十多岁，短短的头发朴素的衣着，就象农家妇女。不过鬓边已挂上了岁月的冰霜了，但两眼炯炯有神。她平易近人的态度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我丝毫没有紧张感，简直就象坐在了久别的长辈身边拉家常。

话题自然是从那场劫难中邓拓的不幸遭遇开始。邓拓夫人首先问道：“‘三家村’所涉及的在内蒙、包头的冤案和受害的同志们都彻底平反了吗？”我急切地回答：“都得到彻底平反了！”此刻，邓拓夫人点点头，内心有些激动：“因为‘三家村’和邓拓同志的株连使那么多的好同志无辜地遭到祸患，我心里非常难过，请你转告内蒙、包头受到株连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我非常感谢党中央对所谓祸及全国的‘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彻底平反，并向内蒙、包头因此而受到残酷迫害的同志和亲属表示由衷的安慰和致歉！”话音未落，我盈眶的泪水便不由的滴落下来。

一阵深沉的宁静之后，我不知从哪来的勇气，竟然问起了邓拓同志临终的事。此刻，邓拓夫人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还是作了冷静的回答，她说：“老邓在六六年五月临终前曾给彭真、刘仁同志和党组织写了诀别信，信中说：‘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当我问到邓拓同志给家人留下什么遗言时，邓拓夫人满怀深情地说：“当时，老邓忍受着铺天盖地的压力和痛苦，热切地盼望和勉励我和孩子们要‘永远做党的好女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这是多么坦荡的革命胸怀和感人肺腑的遗言啊，任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能够相信“四人帮”强加给死者的罪状吗？然而，就连这份遗书当时也被作为“罪证”抄去了，这真是一页痛裂心扉的记忆，揭开它，会使人能够了解其所铸成的千古磨难的历史教训是多么深刻惊人啊！

双方的心情都异常沉重。作为一个新闻战线的普通一兵，我很想听到老邓“笔走龙蛇”的办报生涯的动人事迹。邓拓夫人略加沉思后说：“老邓在纪念鲁迅先生的词中说，‘论文谈道，不知何时倦’。一九三七年他和同志们创办《抗敌报》时，环境十分险恶，晚上行军转移，白天隐蔽编报，许多评论和新闻老邓都是在马背上打腹稿的。每到转移一个地方安排就绪后，老邓便边写文章边发排，等到写完最后一页，文章的小样也就摆在了他面前；看完小样，整篇文章的清样就送来了。办报暇余，老邓还常常写诗寄兴。有首诗叫《忆日卜》便描绘了当时戎马倥偬的办报生涯：‘记得昨宵篝火红，战歌诗思倍匆匆。枕戈斜依当茅帐，假寐醒时月正中。’在八年抗战中，老邓和编辑记者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坚持办报，和同志们朝夕相处，亲如手足。当老邓听到记者司马军城战地采访阵亡时，含泪写下了《祭军城》。这首诗想你已读过，我曾含泪读过多遍，可是……”谈话至此哑然。是的，这是一首沉痛的悼诗，原诗见《邓拓诗词选》29页。作为老报人，邓拓的办报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后来，谈话很随便，谈到邓拓最早编选《毛泽东选集》，谈到《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书的再版。邓拓夫人说，她已编完了《邓拓诗词手迹选》，正在协助编《邓拓全集》。邓拓生前还曾计划编一本古代绘画史，以系统介绍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史。可惜，这个计划和老邓的许多写作研究计划都不能实现了，这的确令人心酸和遗憾，这个沉重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常为孺子牛。”这是老邓赠丁一岚同志诗帕中的词句。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丁一岚同志曾将两方诗帕缝在棉袄里珍藏。珍贵的诗帕曾被汗水和泪水浸湿，成了鼓舞她收集编选邓拓诗文全集的动力，也是激励我们一腔热血凭珍重，“文章常助百家鸣”，为讴歌四化大业的写作动力。“忠心耿耿千秋业，铁骨铮铮万古声，热血文章传海内，燕山劫后倍峥嵘。”邓拓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存！邓拓同志的诗文不朽！邓拓夫人对邓拓的包头之行及其所珍留的诗词及墨迹的关怀，应该说是包头人的骄傲！

本文作者胡晓，系《包头日报》理论文艺部副主任

田间，疾步走在沙原上

李 汀

1956年7月1日的改版后的第一张《人民日报》刊登了玄珠《关于田间的诗》的评论文章。当时我和田间都客居在内蒙古文联，田间看过报纸，委托我找到人民日报驻内蒙记者刘衡，寻问玄珠其人。刘衡立即和编辑部通过长途电话取得联系，并请田间写文章阐明自己的意见。田间态度非常坦然，平静地和我谈：

“我不与他人争辩，用自己的作品回答读者的关心。我的双脚踏在泥土里，草也芳香，花也芳香。”

五月，田间从山西绕道来到包头。当时，包头钢铁公司刚刚开始建设，方圆几十里的厂区没有一幢楼房。暴戾的风沙撒起野来，张牙舞爪，黄沙迷漫，打得人睁不开眼，脚踏在沙窝里拖出的脚印一尺多长。田间不顾风吹面，沙打脸，疾步走在沙原上，追随开拓者的脚踪，跟工人攀谈，和农民交心，昆都仑河两岸留下了他的足迹。包钢开始建设，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缺水。黄河水源地汲水工程还没开始，打井又需要一些时间，农民慷慨无私地将浇地的用水支援了工地。田间为了了解这件事情，曾经沿着水渠走了十几里路，又到南排村的农民家里，盘腿坐在土坑上，与水利委员高希旺老汉攀谈。这地方的水同金子一样贵重，过去为了争水，村与村的农民之间曾经发生械斗。两个村子的人，扛上铁锹，提着斧头，一起站在渠上，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1942年，日本警察也从麻池赶到南排地，用武力制止农民的械斗，鸣枪打死了农民。如今的农民却说：“尽管水是鲜血，也要装几车送给国家。”田间不仅到农民家里采访，也和建设者一

同分享苦乐。他为了弄清楚做屋面防水用的沥青中的“软化点”是什么意思，曾经站在沥青锅旁观察并和化验员谈话。沥青不光味道难闻，锅底下炽烈的火焰烤炙人的皮肤也特别难受；田间全然不顾，深入采访，仔细观察，白天辛苦劳累，晚上也得不到很好休息。临时招待所的门窗，被风砂撞击得发出咯咯的声音，黄沙从屋顶的空隙、窗缝里吹落到屋里，使得床上桌上蒙上一层黄沙。田间每天夜里三点起床，掸扫一下桌子上的灰尘，开始奋笔疾书，以满腔热情讴歌建设者，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与和谐的音响。田间写的包头通讯《火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原拟再写一篇关于白云鄂博的通讯，后因其他事情未能成愿。在编辑出版的《火花集》一书中收录了《白云鄂博通讯》两则，作为补救。田间在《火花》中向全国人民介绍了包头，介绍了包钢所在地昆都仑地区，热情洋溢地展示了建设者不畏艰苦的战斗风貌。

包头风沙季节一过，自然风光也是很美的。大青山与乌拉山两列山峰对峙着，象红脸膛的巨人，险峻、挺拔，袅袅婷婷，峭然而立。黄河，象一条金黄色巨龙横卧在祖国北部辽阔的大地上。它滋润着广袤肥沃的土地和草原。草原坦荡雄浑，青草随风起伏，星星点点的蒙古包点缀在绿的海洋里，远处的羊群象一朵朵白云轻飘慢移。在一蓬蓬野草里，竟藏着一眼汨汨的泉水，它象清凉的汽水，润着沙漠滚烫的嘴，润着高原跋涉者的心田。田间由我、刘衡、鹏飞和山西一位青年诗人（名字记不起了）陪同去看黄河水源地，在行进的途上，看见一眼泉水和牧羊姑娘，他就叫司机停车，疾步走到牧羊姑娘跟前，和牧羊女攀谈。塞外风光，蒙古族风情，激发了诗人的诗兴，犹如“喷泉”一般，喷礴而出：

牧羊女，他的背后，
起重机轰隆的交响；
牧羊女，她的前面，
黄河送来了波浪。

我们来到黄河古渡，先听地质勘探人员介绍黄河这一带扁玛石岩的形成，尔后乘船渡过黄河，徒步走上昭君坟。回来的时候，在渡口吃了一餐渔民做的别具风味的黄河鲤鱼。渔民乘小船，到河里钓上两尾红眼鲤鱼，先用一锅滚水烫一下，然后拨鳞开肚，取出肠肚，再用清水煮，味道鲜美。

田间在包头生活了四十多天，回北京后不久，出版了《马头琴歌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以诗呼唤，以诗激励，满怀激情放声高歌鹿的地方：

(一)

一座山崖的旁边，
有只牡鹿来喝水；
三股水往下倾泻，
亮晶晶银光四射。

古代有一位皇帝，
他射出两枝响箭；
这一枝穿过鹿角，
那一枝飞过草原。

皇帝站的这块地方，
就是一个沙丘；
他说：“将来这里的城，
要叫做包克图”。

包克图就是包头，
多少年已经过去；
我们广阔的草原，
依然是鹿走的地方。

(二)

群鹿已经离开草原，
看它逃得多么迅速；
现在在它的四面，
四面是火光雷声。

在它走过的路上，
建设者扎下野营；
他们把一块草原，
变成了一座钢城。

他们正在举起双手，
要迎接一颗巨星；
这一颗星就是钢，
钢要在这里诞生。

我们的兄弟会知道，
大青山下黄河岸上，
谁是真正的射手？
他的名字是：人民！

田间同志是知名度很高的诗人，被誉为时代的鼓手。在延安，他和柯仲平等同志发起了著名的街头诗运动。这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创举，对新诗走向民族化、大众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与人民息息相关，关怀人民，爱护人民，也受到人民的爱戴。当时包头市也分三区，田间住在昆都仑区，青山区文化馆的同志拿来二十几位“小字辈”的诗作请田间同志看，田间不但没有拒绝，一一看过之后，还写了意见，然后由我陪同乘车走二十

多里路，与每一位作者谈意见，大大激励了青年的写作热情。我也很喜欢文学，工作之余写点小说，田间同志离开包头时，拿走了九篇，与工人出版社联系出版，因为单薄未能成书。他在包头通讯《火花》一文中曾经写道：“李主任还很年轻，三十岁上下，是个知识分子，很会写小故事。小故事写了一大本。”我有愧于前辈的鼓励，人不才，又加上被错划为右派，搁笔二十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出钢的地方》。我将书寄给了田间，田间同志回了一封信，这竟是他最后写给我的信了。我珍藏着，再也不能叫红卫兵烧毁了。田间过去写给我的信失落了，但他对我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要勤奋，不要懈怠，勤奋使人志高。最后这封短信是这样写的：

书收到。谢谢。我爱人是写小说的，先交给她看看吧。我待有机会翻翻。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进步。此复，新春好！

田间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和不朽之作，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本文作者李汀，前二冶办公室副主任，现已离休，系包头市政协委员，昆区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聊斋志异》手稿轶事

——蒲松龄第十世孙蒲惠章在包头

石圭平 张树宽 刘凤荣



蒲松龄画像

被世人称之为“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的《聊斋志异》，以它独特的文学价值，在我国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伟大的文学家蒲松龄的原稿世人无缘识之，对于它二百多年来的流传经过，知者亦甚少。不久前，我们在包头访问了蒲松龄第十世孙——包钢设计处蒙古族工程师蒲惠章同志，请他谈了这部手稿的有关情况。

大约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辽宁省西丰县元宝屯的一位面目清秀的农民知识分子蒲文

珊，从深藏在箱底的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里，取出一个樟木匣子摆在他的儿女面前，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匣子，一部线装古书安然躺在里边，儿子惠章、女儿延章等都睁大了异常惊奇的眼睛，迷惑不解地问：

“爸爸，这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都是用毛笔写的，不是印的，你为啥要这么珍贵地保存着它啊？”

“这是你们的太爷爷写下的书，平时我给你们讲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本书上写的。”

“怪不得爸爸会讲这么多故事，原来你有一本好书啊。”

“它叫《聊斋志异》，这是你们先祖蒲松龄的亲笔手稿。”

好奇，本来是孩子们的天性，尤其是当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更是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了”直到他们自己满意为止。当他们得知父亲平时讲的故事都来源于木匣子里的这部古书时，一连串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蒲文珊一一作答。做为蒲文珊长子的蒲惠章对此事记忆尤深。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聊斋志异》手稿时的情景。”

在包头一家宾馆的会客室里，蒲惠章无限感慨地对我说：

“一部《聊斋志异》手稿浸透了我们蒲家几代人的辛酸与悲欢。”

蒲松龄在世时，将《聊斋志异》最后一稿誊清后，曾嘱其子孙善自珍藏，世代相传，不得遗失。一七一五年，蒲松龄去世后，全部手稿保藏在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蒲家庄的蒲氏家祠中。共四函八册，分藏在两只樟木匣子里，做为蒲家的传家之宝封藏于密室，从未示人。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山东连年闹灾荒，蒲惠章的曾祖父蒲介人携全家逃荒到沈阳，《聊斋志异》手稿也被带到沈阳。

蒲介人临终前将儿子蒲英灏叫到面前，亲自将手稿传给他，并一再叮嘱他妥善保藏，世代相传。蒲英灏为了长期保存，就拿出来请画家裱糊。画工手捧着蒲松龄的手迹，惊呆了，他读过《聊斋志异》，听过书中的故事，他从来没有见过作者的真迹，他知道这是稀世珍宝，就精心裱糊好交给原主。过后，他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新闻传扬出去了，遂为世人得知。

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耳朵里。当时蒲英灏在依克唐阿帐下供职。依克唐阿问及此事时，蒲英灏慑于他的权势不敢隐瞒，只得照实说了。依克唐阿将上部借去阅读，归还

时又借走了下部。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清政府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依克唐阿进京议事时带走了手稿的下部，随后他死于战乱，下部手稿的下落迄今不明。如果按一九四一年《盛京时报》上披露的消息上所说的“《聊斋志异》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现在柏林博物馆”，那么下部手稿应在国外，因不知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如何，故难下结论。

蒲英颢去世时，按照蒲氏家规，应将上部手稿传给长子保存，当时他的长子和次子都先他而亡，就将手稿上部传给了蒲惠章的父亲蒲文珊保存。三十年代，蒲文珊在辽宁省西丰县当图书馆的管理员，当时伪满洲国内务府大臣袁金铠从盛京将军的友人处得知此事，意欲重金购买，被蒲文珊严词拒绝。后来袁金铠曾委派其子袁振铎到西丰县任县长，袁振铎对蒲文珊说：“这部手稿放在你手里没有什么用处，你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只要把手稿交给我就行，你何必端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时蒲家已经家道中落，生活艰难，蒲文珊毅然回答：“我不能拿祖宗的血汗换饭吃！”

威逼利诱没有使蒲文珊屈服，袁氏父子并没死心，提出来要拍几张照片，大约拍了几十张。

袁金铠将拍得的照片制成影印件拍卖，赚了很多钱。解放前《聊斋志异》上部手稿流传在世上的就是这些影印件。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后记”中谈到的袁金铠影印本即指此。

一九四八年秋天，东北大部分农村已经解放，在土改运动中，《聊斋志异》上部的手稿也随之散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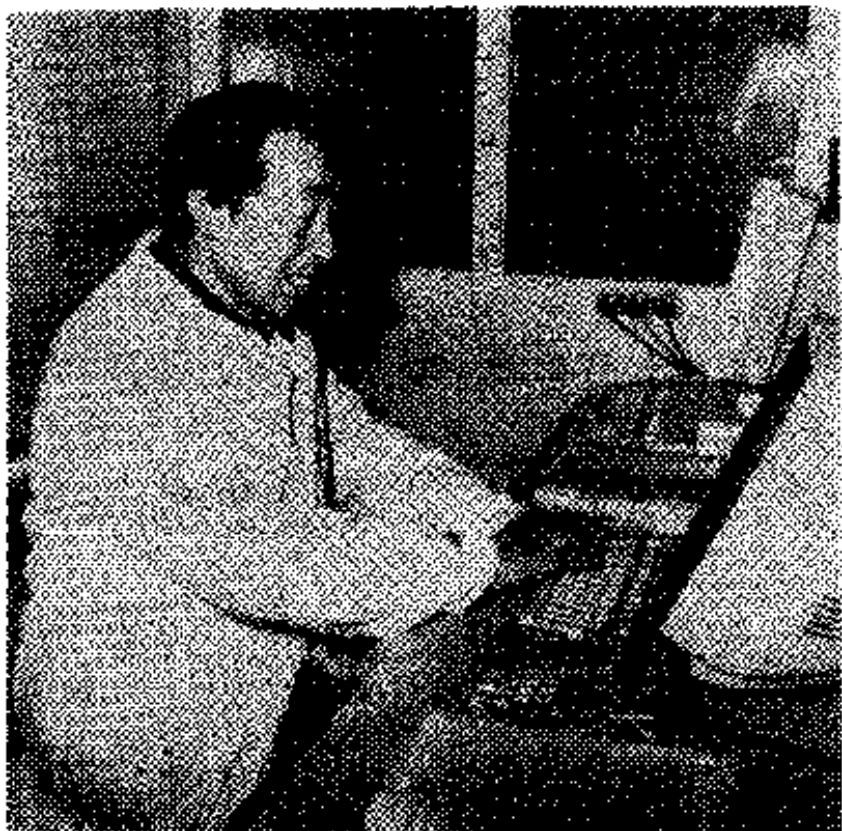
有一天，领导土改工作的刘伯涛同志，走进了元宝屯农会办公室，发现房子的一隅放着四个装满了东西的麻袋，就向农会干部问：“那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都是从地主富农家里抄来的破旧报纸，里边也有些古书。”农会干部漫不经心地说。

他的回答引起了刘伯涛的注意，他开始在破纸堆里寻找一些有用的古书，偶然发现了两函四册《聊斋志异》手稿残本，他惊喜异常，遂将书带回县政府。

刘伯涛详细阅读了手稿，认为是蒲松龄的亲笔手迹，因为书稿的章节词句中有些勾抹改动之处，若是后人抄本不可能有多处修改涂抹。他又认真检查了章节编排情况，发现他所拿到的并非全部手稿，还应有续篇。他立即再次赴元宝屯调查了解，一位农民告诉他说：“前些天，有位姓于的女干部住在我家，晚上经常看两本古书，书的样子和尺寸同你说的差不多，现在她调到哈尔滨工作去了。”

在这次调查中，刘伯涛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还亲自找蒲文珊谈话，向他宣传党保护文物的政策。蒲文珊详细谈了手稿的来龙去脉。



刘伯涛将所了解到的情况，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请求组织上帮助查询遗失的书稿。半年以后刘伯涛接到了哈尔滨市组织上转来的书稿，正是《聊斋志异》后两册手稿。

次年，刘伯涛将全部手稿的上卷本交给了在东北人民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林枫同志，林

蒲惠章同志在电子计算机前工作 孟亚力摄

枫对此十分重视，组织有关方面专家进行鉴定，确认是蒲松龄亲笔手迹，遂将手稿交辽宁省博物馆珍藏。

抑或读者要问：既然下部手稿下落不明，那么现行的《聊斋志异》上下卷本是怎么流传于世的？据蒲惠章说，蒲松龄逝世后，他的孙子蒲立德找人刻印过全部《聊斋志异》，自此以后《聊斋志异》的刻本在社会上流传。

蒲惠章说：“国家的文物政策，使手稿的上部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还保留在我家的话，恐怕早就没有了。”

我不禁惊奇地问：“为什么？”

“一九五一年西丰县闹水灾，我家房子都被冲塌了，一家人仓皇逃命，即使在我们家保存也来不及带走啊。”

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问了些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譬如蒲松龄的民族成份问题等等，蒲惠章笑了笑说：“蒲松龄的民族成份问题，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是蒙古族，有说是汉族，也有说是满族和回族的，前一段报纸上颇争论了一番，也无定论。我认为是回族的说法首先应该排除，因为我家传下来的生活习惯没有回族的风俗。我的祖父很有文采，字也写得很漂亮，在盛京将军的拉拢下曾当过清朝三品花翎监使，因为在清朝当了大官，人们推测他可能是满族。我父亲在世时，谈到我们的家世时，常讲一个不见经传文载的家族传说：蒲家的族先曾是元朝宫廷大臣，握有重权，有一次，皇帝做了个梦，梦见蒲草长得比金銮殿还高，就怀疑蒲家要谋位篡权，降旨抄杀蒲家，蒲氏家族四处逃散，从此隐名埋姓，直到明代，蒲氏后人才恢复蒲姓。如果按这个家族传说推测应是蒙古族”。

谈到他们的家谱时，蒲惠章说：“我们的名字都是按蒲松龄亲定家族名谱列下来的，即：竹、立、一、亭、尚、国、人、英、文、章、显、业、忠、厚、家、声。合起来正好是一首诗：竹立一亭，尚国人英。文章显业，忠厚家声。我有个弟弟叫蒲鸿

章，是包钢轨梁厂的工人。大妹延章在沈阳市工作，二妹沅章在丹东市工作。现在，我全家都在包头市昆区居住。爱人刘凤英，今年五十岁，多年来一直从事会计工作。儿子蒲显华，今年二十七岁，是包钢计量所修理仪表工人；女儿蒲显军二十岁，在包钢钢研所炼钢室工作。我四九年参军，五三年考入哈尔滨土木工程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多，包钢建设开始后，来到了包头。”

我们的谈话结束时，蒲惠章深情地说：“解放后国家对蒲松龄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出了多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使这一古典名著为广大读者所了解，还修缮了蒲松龄故居，安排我的叔父蒲文涛在‘蒲松龄故居纪念馆’工作，做为蒲松龄的后代，我们都无限感激党和国家。”

一部《聊斋志异》手稿，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从它的流传经过中可以看出，只有我们伟大的党才使它有了真正的归宿，由传家宝变成传世之宝。

本文根据内蒙古日报记者石圭平、包钢文协副主席张树宽、包钢报编辑刘凤荣来稿，以石文为主综合整理而成。

建国前后在内蒙古西部区的几次战斗

〔内蒙古〕 齐凤仪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刚满十八岁，从东北军政大学北安总校七队学习半年，以优异成绩结业，评为全校优秀学员，定连职。离校后在内蒙古青年团本部从事一段工作后，直接做了骑五师十三团的“学生官”，先任政治处干事，后任一连指导员，直到一九五三年调离该团。许多战斗生活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建国后的两次战斗。

绥北战役负伤

一九四九年元月，平、津、张战役刚结束，华北军区领导为孤立绥远之敌（现呼和浩特），集中了华北地区的四个野战骑兵师，即：绥蒙骑兵旅、察南骑兵师、内蒙骑兵四师、五师，在呼和浩特北武川县、四子王旗、达茂明安旗境内，组织发动了以骑兵为主的绥北战役。前后时间约半个月，历经几十次战斗。敌我双方均以骑兵为主，但国民党部队依靠后方近的便利条件，调运来了一个机械化重炮兵团。头一天，我团配合绥蒙骑兵旅，围歼了二盆子村之敌三百余人。战斗异常激烈，我团团长云一立，十四团团团长葛平，均在此战中负伤。绥蒙骑兵旅伤亡更大。第二天一早就赶赴召河庙参加这次战役的最后主力会战。

战斗开始之后，团队上马准备向召庙敌群冲锋，在队形半散开尚未完全散开之际，敌人重炮群连续不断的向我们开炮轰击。方圆几百平方米内，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黑红色烟柱一束接着一束平地升起，模糊了视野。在过去的战斗中我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密集猛烈的炮火，正在捉摸怎样参战之时，我突然感到一个非常有力气的一根大棍打在我的右臀部上，身不由己的当即掉下马来。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是炮弹炸飞了战友的枪横打

在我身上，我必抓须紧缰绳控制住狂奔的战马，以免人马分离。不知是命运之神保护了我还是害了我，落马后我的左脚套在镫中摘不出来。老骑兵一般情况下落马是不会套镫的，我之所以套镫是由于解放张家口时，从国民党仓库中缴获的日军军皮郎头鞋分给我的号码大些所致。落马后左脚套在镫中，左手死死抓住左边的缰绳不放。这样我的背肩着地，右手右脚悬空，马匹从左绕圈奔跑，我拼命抬手不使着地以避免碰伤。马跑了几圈之后，我的左脚脱镫了，随即控制住马，站起身来。首先用手摸下臀部被撞击部位看是怎么回事，抬手一看满手鲜血，知道是挂花了。抬眼再视周围倒下十几个人，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团参谋长杨玉山同志，弹片从他的右脚腕上部扫过，整个腿骨打断，连着一点皮脚与腿尚未脱离。他大声喊我去找卫生队，附近是他的警卫员大腿根部被扫断，血流如柱，还躺着不少别的同志，被炮烟熏得满脸乌黑。我顾不来细看，立即到杨参谋长跟前，取下他的枪绳绑在伤口上部止血，他说：“你快去找军医，你也挂了花，顾不上我，快去。”我随即又跨上了马，在弹片横飞，枪林弹雨中狂奔团指挥所，报告了情况后我也下不来马了。同志们扶我下马后，进行急救包扎，战前就准备好的担架队抬我下了战场。

晚间，老八路杨玉山同志终因流血过多牺牲了。这时接到华北军区电报：“停止绥北战役，绥远要争取和平解放。”

当日晚间，我团政治处主任裴正义同志来到我的身边跟我讲：“部队明天要返回商都一带休整，因为负伤地点离我师后方医院过远（现锡林浩特），无法把你送回自己部队后方。这次战役伤员数百名，轻伤能骑马的随团治疗，重伤不能骑马的都送往丰镇八军野战医院治疗。担架抬到旗下营子火车站上火车（当时是同国民党的分界线）。他问我还有什么事情后，接着对我说：“这个地区尚属敌战区，到处是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考虑到担架途中安全，批准你把手枪带着自卫。你还不知道，你的马也跟你同时同一部位负了轻伤。另调一匹马，你的通讯员牵着随担架同行，遇有万一情况，你的伤虽较重，但迫不得已也必须骑马脱离危险。”我考虑之后说：“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手枪我可以带着，人马相随就算了。伤员这么多，不是我一个人，何况还有护送队伍，我治好伤争取早日归队。”裴主任语重心长地嘱托：“望你特别注意途中安全，这几年我们打

了那么多仗，多少同志阵亡和负伤，全国眼看就要解放了，避免无谓的流血和牺牲。手枪必带不可，人马你不愿意相跟就算了，但你不要光靠护送部队警卫。这次战役有近千名伤员，是在半个月中前后陆续运走的，你是最后一批。只有绥蒙骑兵旅一个连护送。这里到旗下营子火车站，几百里都是山路，地形复杂，走那住那，一个连警卫不过来。大的敌军袭击不可能，小心个别敌情。望你早日恢复健康，祝你一路平安，再见！”担架抬我上路，临行时，我深情而又留恋的看着团的首长和战友们，心中好难受，我倒下了，离开战斗的团队了。

裴正义同志所以这样关照我，是因为我俩有着超过一般战友、上下级关系的特殊感情。他比我大两、三岁，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官”。我在政治处当干事时同他朝夕相处，同睡一个蒙古包，同盖一条被，情投意合，两人都有点文化，观点、立场一致，结下深厚友谊。

裴主任临别叮嘱，不得不使我提高警惕。事也真巧，就在担架上路后的第三天傍晚，我遇到了裴主任提醒的险恶情况。天刚黄昏，我的担架同前后的人不知怎么拉开了距离，孤单行进，没有护送战士相随。我也没有办法，别人抬我走，对群众不能强迫命令。伤后团部给每个伤员一两大烟土，一替药用止痛，二顶钱用。我不会烧烫吸烟，只能伤痛时咬嚼一点，量大小掌握不准。伤口化脓严重，整个右腿浸泡在浓血中，痛了就咬口大烟，一路昏昏沉沉，怎能警惕呢？

当时我猛然听到叫喝声：“站住！”睁眼时已有三个人站在担架旁边近在眼前。一个国民党兵端着中正式上了刺刀的步枪指向我，另俩人身着便服，一人持大刀，一人拿木棒。我很快清醒地意识到：“啊！是武装拦路抢劫的。”我平静的同三个匪徒对答了几句话，以消除拿枪匪徒准备随时开枪的紧张心理状态。

我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一个操本地口音回答：“干甚的？还用问，刁人的。”

“穷伤兵有啥可刁的。”

“给你们分的大烟土那去了？皮袄、棉衣、被褥都要，冻死你狗日的。”

“我不能动，要啥拿啥，留命可以吧！”对话之间，我的子弹早就上

膛的手枪在被窝中开了机头。看到拿枪的匪徒，枪已收起，手离扳机，准备动手抢劫了。可他们那里知道死神已经走近他们只剩一秒钟了。我在被中伸出手枪，打出整整八粒子弹分给三个敌人，近在几尺，弹弹命中要害。他们未来得及开一枪、说一句完整的话，便惨叫几声倒下不动了。四个抬担架的群众早就吓得爬在地下不动。我叫起他们几个，收起枪放在担架上，又叫他们任意扒取匪徒衣物做为奖励，然后把尸体扔进路边深沟赶路了。

归 队

担架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历经十数日缓慢行进，终于到了旗下营子镇。这里已是解放区，生活便利的多了。我首先做的事情是求医护人员找来护送部队连长、地方干部。告诉了路上遇匪情况，并将缴的枪交给他们。护送连长赞扬了我，他说：“伤员被劫受害已知道的有了数起，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因为伤员太多，隶属四个师，互不认识，幸亏你带了枪，保护了自己，为民除了害。”临上火车前，给伤员彻底清洗伤口，重新绑扎，导尿排便。政府组织群众慰问，很快送上火车运往丰镇八军野战医院。

住院后经检查，我的伤未伤骨和神经及大血管等，但化脓严重。本来应该治疗一个月左右，即可出院，而我却住了三个半月，到四月下旬才出院。主要是因为负伤时，弹片通过皮大衣、棉衣、皮裤斜穿过臀部时带进了羊毛，入口深而未透，但只要有一根羊毛就化脓不止。这期间动了三次扩口手术，清洗羊毛，最后停止化脓封了口才算好。住院期间不能正卧，侧卧还得垫东西，多数时间是腹卧，床上大小便，真受罪，把人急死了。

在伤员之中，我也堪称是幸运者。担架路上和到院之后，死于战伤传染病破伤风的同志比比皆是。当时没有破伤风疫苗，得了必死，我又闯过了一个死神关。

四九年四月二十几日，我该出院归队了。以感激之情，告别了医护人员和同室伤友，随同我团派来接我的通讯员苗荣山同志住到车站附近老乡家，等待前往参加大同战役的我师部队。住院期间团队派人看望两次，那时部队没有经费，也是带来大烟，连同我原来用剩下的，拿到银行兑换边

区纸币，分给伤员使用，生活还算可以，能经常吸到纸烟。到我出院时，我师的大多数伤员，均早我出院归队。留下的是重残伤员，就不能归队参战了，只我孤零一人候车。我的马早就养好伤，吃的膘肥体壮活蹦乱跳。我不时地摸摸他的脖子，亲亲它的嘴，心里默默的想：“我俩一块在枪林弹雨中才一年，在你之前不到半年内，我的两个坐骑一死一伤，这回我俩一块挂了花，你又该驮我战斗了。”

运载我团的火车到达车站时，我早就在站台等候着。团的首长、干部、战士们下车团团围住我拥抱亲热一番。熟悉的连干部们连捶带打的说笑着：“你小子命大还没死，看样子还能娶个老婆。”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就是用这样看起来粗俗而却是深深发自内心的感情来讲的。我一时心里难过极了，住几个月医院的滋味真不好受，长期积压的想团队的感情流露了，眼圈湿润可没流出泪，怕人笑话我是小孩子。实际上当时我也只有二十一岁呀。我说：“我要是真死了，你们要娶媳妇不是少了个闹洞房的吗？到了阎王爷那里还得找你们几个去作伴呢。”政委任广同志讲：“你们这些家伙胡扯乱谈什么呀？快上火车去解放大同吧，我们都是光棍一条，而我是过了三十的老光棍了，还不着急，你们小孩子家忙什么？轮班该我和团长也轮不到你们。”逗的大家哈哈大笑。有人喊：“政委想老婆了！”那时候上下级关系情同手足，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句句语语无不发自内心，我随身带的几盒美国咖啡烟、白象烟早被大家翻走分享了。

部队到了大同之后，正值“五一”，全团召开庆祝大会。政委喊我：“小拐子，（伤刚好腿有点不好使），领大家唱支歌吧！”有半年没领大家唱歌了，过去在政治处时，这是我的常事。我高兴地指挥全团战士唱歌，喊战斗口号，然后开大会，首长讲话。在大同与友军配合，积极准备攻城战斗。大同国民党守军只有一个师，未等战斗打响，经过争取就宣布起义了。我团应当地政府请求，在雁北数县分散，以排为单位，帮助地方政府，镇压肃清反动武装还乡团几十股千余人。六月底完成任务，奉命在集宁以东一带休整待命。

到集宁东六十里玫瑰营子驻防后，连队开展了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平时练兵运动，准备去宁、甘、青同马家骑兵作战。训练重点是射击、劈刺、

马术，射击是四种武器即：步、机、冲锋枪和六〇炮；劈刺主要训练马上马刀劈砍刺动作；马术是训练马匹听人指挥快速卧倒起立，熟悉枪炮声。这是难得的和平训练时间，过上正规军的生活。但是，压抑不住这支部队久经征战的战斗热情，他们渴望参加战斗。上级决定解放宁夏的战斗任务交给兄弟部队了，大家深感遗憾。

在此期间，作为政治指导员，我的任务够多的了。连队进行几年来的评功受奖工作；教育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情绪；给几年来牺牲同志的家属发阵亡通知书，因为建国了，国家拨款，邮发抚恤金；老区参军的同志，有的一家几口在部队服役，过去为保证战争胜利，是忍痛这样做的，现在可以留下一个，其余复员回家生产；战马也要部分换班，老弱病残换新马；排以上干部统一评级定职；班长普遍在师教导队轮训一次；四九年七月一日，全军统一部署，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实行公开，要进行党的领导、传统、知识等教育，学唱国际歌；十月一日是建国大典，全军上下，热闹非凡。

十月前后，绥远国民党部队九一九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喜讯一个接一个，我们满以为今后再无仗可打了。人们都在想：今后干什么呢？十一月份，接到内蒙古军区的命令：“骑五师进驻伊克昭盟。待黄河封冻，就行军西进。”

一九五〇年两渡黄河

一九四九年十一、十二月份，对部队西进伊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教育和组织准备工作。

首先讲述了伊盟的政治情况：当时伊盟七旗一县，几十年来各旗封建割据，盟是牌位，管不了旗县。各旗王爷均有二千左右反动武装，对境内黎民百姓握有生杀大权。国民党过去也曾多次企图建立统治，均被武装反抗所抵制。尤其是西南部的乌审旗，曾消灭过国民党设立的办事处百余人。那里地形复杂，遍地沙漠，车辆难行，解放前不通汽车。伊盟较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武器枪支多，其来源有三：一是苏联、蒙古在大革命时期支援乌审旗的锡尼喇嘛闹革命的；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密密勾结蒙古上层策划投日时所供应的；三是国民党反动派为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制造民族矛

盾、挑拨蒙汉两族仇杀支援给汉族的，其中也支持了投靠于国民党怀抱的蒙古上层，有了后台，有了枪炮，各类不同性质、形式的武装队伍应运而生。兵民不分，官匪不分，遍地皆是。当时四十万伊盟各族人民，多年来都生活在流血冲突之中，盼望亲人解放军去拯救他们。

伊盟的军事情况甚为复杂严重：全境约有十几个警备、保安等师级军事机构，人数万人左右；绥远九一九起义后，又有两股反动军队叛逃伊盟作乱，有两千余人。大股土匪以高怀雄为首，人数最多，他是我军长征结束，在延安建立根据地时，就率领自己的高氏家族追随国民党叛乱至今，血债累累，无法计算；另一小股匪首张廷芝，老家宁夏，企图窜回原籍作恶。他们同伊盟反动上层勾结，积极准备进行反抗我党我军的进驻。九一九起义的第三天，乌审旗护理扎萨克“王爷代理人”、伊盟第二警备区少将司令奇玉山率部五百人叛变，将我军人员和地方干部八十余人全部缴械关押，并杀害了其中数名领导。我军在伊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数量较少，不足以解决伊盟问题，为此，命令骑五师进驻伊盟。

骑五师全师指战员三千余人，久经征战，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党的领导坚强，干部素质高。战士都是翻身后参军参战的蒙汉农牧民，作战勇敢，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经过动员，部队又焕发了新的战斗热情，从种种和平打算转向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的最后解放去立新功了。

黄河封冻后，约在五〇年二月初，部队开始千里行军。我们骑在马上，高唱：“挺进，挺进，向西进，向南进，向一切的蒋管区大进军。那里的贫困老百姓，正等待着解放他们……”的军歌。横穿土默特川，西渡瓶河。正值旧历过大年，师部命令休息几天。我连住在达拉特旗树林召西石家营子村。过了个不行军、不打仗的大年。但是，新区地穷人贫，人烟稀少，宿营都成问题。我们只好在屋地下、羊棚马圈里“过年”。就是这样，也是愉快的。初一那天，全连指战员进行了一次大围猎活动，学习我们祖先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我们不用弓箭，有枪但不能用，留着子弹打敌人，全靠马匹追堵棒打，那里的野鸡兔子很多，半天功夫捉了足有千余只，凯旋而归，连队有了改善生活的条件。收兵回营后，我马上写一纸条，要通讯员送给我的知心好友裴正义（他在我负伤后到内蒙党校学习一年，这次西进过河后才赶回来，已任团副政委），请他来我连吃饭。肉炖好他也

来到了，一见面就问：“风仪老弟，请我吃啥好的？”我说：“一年不见，甚为想念兄长，现有鸡兔野味，以谢救命恩人。”他愣住了：“什么救命恩人？”我讲了挂花后担架途中之事，他才哈哈大笑说：“我是诸葛亮，能掐会算，你将来要是娶了媳妇，得第一个请我喝喜酒。”我们吃饭之间，他给我讲了他们到乌兰浩特学习时，我姐夫也去了（额尔敦仓，当时任一师三团团长）他们一起到了我家，看望我妈妈和弟弟，说当地政府照管得很好，并转告了我的情况，我姐夫还捎来一封信。离别几年头一次得知乡音家信我很欣慰。吃完饭后已是下午，裴副政委、连长姚维孝和我三人，一块去团部拜年，还带了一些猎获品，作为礼物。这时我们原团长云一立改任政委，新任团长是陕北老红军张生银同志，原政委任广同志任师政治部副主任，明格图同志新任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是老八路马丕锋同志。他们见了这么多兔子野鸡都感惊奇，问：“这是怎么搞来的？”我们说是围猎来的。张团长生气了，说：“行军半个多月，你俩真狠心，也不叫马休息，为人嘴费马腿象话吗？”我的脸红了，连长不敢吭气。裴正义同志接过来来说：“县官不打送礼的，你老汉别生气，他俩不会叫马子跑坏。再说人马一样，吃苦耐劳都是练出来的，我们临来前补充了未曾服过役的部份新马，他们练不出来，也不适应艰苦环境行军作战的需要。”老团长消气了，但还是故作严肃地说：“马子如有非战斗减员，找你俩算帐。”我和连长连声说：“是，团长同志。”这时张团长的年轻妻子李文珍在旁插了话：“别叫他团长，叫他老头子。大年初一训人。”一句话，逗的几位团领导满屋大笑，裴正义同志好逗乐，随着说：“对了，有管你的人了。”当时我们团只有团长、政委结婚，妻子随军，这也不过才是几个月前的事。云一立同志开口了：“咱们说点正经的事吧，老张，你把研究的决定传达给他们。”张团长说：“师部决定我团进驻伊盟西部区杰尔庙，你连较团主力先行一天，作为尖兵连侦察前进。行军路线、地图、口令、每日宿营地址参谋处给你们一份，团侦通排随去一个班同团部保持联络。”政委接着说：“伊盟问题，敌情主要在西部三旗（乌审、鄂托克、杭锦）。杰尔庙地处这三个旗的中心三角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行军途中遇有武装人员先礼后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伊盟到处是兵，没有暴露之前，分不清敌、我、友。多做政治宣传、提高警惕，防止

1948年二连在多伦因联络时疏乎大意、牺牲二人、云全魁同志（二连指导员）死里逃生的教训”裴正义同志高兴地说：“十三团是全师的一只拳头，哪里最需要就打到哪里。碰见武装反抗阻止通行的，坚决迅猛的打过去，叫他们知道骑五师是怎样打仗的。”政委讲：“我们团即使是这样的话，更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别传染给下边。”裴副政委说：“全团战士早就是老大第一思想，不用传染，这也不是一年半年的事了，加强教育吧。但别伤害全团指战员争强好胜的作风。我们不争功、不讳过，但艰巨战斗任务必争。”云政委说：“有什么官出什么兵，你裴正义就是争强好胜的头。”老团长发言了：“对了，我们就是要带虎兵，不带熊兵；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我在四野骑兵团时，口号就是：‘活在马上，死在马上。’，再加上你们的口号：‘马刀见血，砍出新中国。’，我调来这个团太满意了。”热烈的谈话结束了。明参谋长、马主任又嘱托了一些注意事项，如此“拜年”就算完毕。回连以前，我又单独请示团长、政委：

“路上情况复杂、政策问题多，叫裴副政委跟连同行，坐阵指挥行不行？”云政委看我一眼笑了，他知道我和裴正义的关系：“两个冒失鬼离别一年想谈心了，可你别搞私人感情，请裴正义吃饭为啥不请团长我俩？”“你俩有了夫人我怕请不动碰钉子。”“别胡扯了，老张，你看行吗？”张团长连连说行。他俩答应了，我高高兴兴回连。准备一天，大年初三上路继续西进。

裴正义同志率领我连行军前进。路上，我俩山南海北无话不谈。忆过去，讲现在，论将来，大事小事私事想起什么说什么。他伤感的说：“我八九年没有回唐山老家看看了，这回从乌兰浩特回来路过探家一次。村里没有青壮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参军走了，至今也不知道谁死谁活。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死了就断根。你还有个弟弟。你看，杨参谋长死了，连家在何处都不知道，光知道山西省，阵亡通知书都无法发。”我说：“西进路上，途经土默特旗，我也不知哭了多少回，真没有勇气支持了。这个旗是我团骨干的家乡，牺牲了的都到家慰问，未牺牲的也去看望。团里积存的一些财产，都分给他们了。烈士的亲人们见了就痛苦，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啦。那么多英雄的母亲、妻子把亲人交给解放军去流血去牺牲，中国女性真伟大。”“战争教育了人，考验了人，母爱、爱情在战争中得到最

大考验。而战争太残酷了，中国、全世界何时才能结束战争？”“后事如何谁也无法预料，大概我们在伊盟打个一年半载的，戎马生涯该结束了吧。中国内战的历史将最后结束于我们这一代手中，永远过和平生活了。”“谁知道呢？你不是说了吗，后事难以预料。”

越往西走越感到伊盟荒凉贫瘠，同富饶的锡、察草原农牧业相比简直象步入了另一个世界。遍地光秃秃的沙丘，一道道深沟，牛、马、羊比东部的都小得多。日行夜宿几百里到了目的地杰尔庙。路上未遇大的敌情，零星散匪一扫而过。这个庙真大，住一个团七、八百人还富富有余。眼前没有战斗任务，过军营生活。

这时伊盟各旗都在旁观乌审旗，视其动静。乌审旗的反动上层早已下定反革命的决心，同外来叛匪勾结，积极策划全旗性叛乱。经过多次争取均告失败，迫不得已于三月中旬兵戎相见，展开了乌审战役。

五〇年三月中旬到同年八月中旬五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大小战斗，前后经过乌审旗王府、早稻、成川、陶力等几次主要战斗，敌人基本肃清，叛乱平息。敌方逃走贺永禄、巴特夫妇、张廷芝等匪首及少数骨干，形影皆无，下落不明。敌兵力一部就歼，一部被俘、大部逃散回家，至此战役全部结束。

乌审战役并不十分激烈。所以用了近半年时间是因为敌人遇到了他过去没有碰到过的硬对手，经第一次王府战斗后尝到了厉害，他们经不住我师猛烈炮火和大刀的冲杀，再也不敢应战了，依靠地形之便天天东躲西藏。乌审旗牧区住地分散，无法包围全歼，没有战机，只能在其行军途中消灭之。其后的几次主要战斗，都是在追击途中进行的。这样的战机半月廿天也不容易碰到一次，以致拖了数月之久。作战中人吃马喂十分困难，几年来我们还头一次用马肉充饥。战役开始时穿棉军衣，到了夏季换不上装，没有办法把棉衣裤棉花扯出来穿。半年来几乎是经常人、马饿着肚子行军追敌，人困马乏、人马体力消耗极大。

连队回到杰尔庙休整不到半个月，团首长叫去了我和连长姚维孝，布置了新任务：“在我师进入伊盟同时，内蒙骑兵四师开进巴盟。那里的剿匪刚开始，为防止巴盟敌人在全歼时逃入伊盟境内，命令我连再从伊盟境内西北部鄂托克旗北渡黄河，进驻巴盟境内渡口塘，镇守黄河渡口防敌窜

入。云一立同志讲：“这是全师、全团的重托和信任，希望一连远离主力单独执行好这一光荣任务。象过去一样、去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去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去战胜别人战胜不了的敌人。团党委决定、裴正义同志亲自前往领导你连。再从四连抽调一个机炮排加强你们连，抓紧准备，近日起程。”

我们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项任务，特别是我爱戴的裴副政委直接领导，真是喜出望外。临行前队伍集合完毕裴正义同志叫连长我俩去团首长处最后告别、请求指示。我同连长全副武装到团首长跟前报告：“一连整装集合完毕，等待出发，请团首长最后指示，连长姚维孝、指导员齐凤仪。”几位团首长说：“你们走吧，要说的早说了，望你们为我师我团争光，团结友军、尊重地方政府、纪律严明，祝马到成功。”连队征尘刚洗又踏上新的征途。

一九五〇年八月下旬，二百人的加强连行军十余日，北经杭锦旗、鄂托克旗境内穿过伊盟西北高原到达北渡黄河的渡口。西渡黄河时寒冬季节冰上行军，而现在滔滔河水直泻万里，非船莫行。我们刚到河边，用望远镜观察到对岸有少量武装人员，能运载牲畜的大船全在对岸集中，这边只有一只小船。正在这时，对岸连开数枪，裴副政委指示我们要冷静，不要还击。示旗联络后对岸不打枪了，裴副政委派姚维孝带一个班三挺轻机枪先乘小船渡河索取大船返回后再渡大队人马过河。叮嘱说：“船在河中行进时，如对岸再打枪、当即还击强行登岸。”同时我们在南岸架起四挺重机枪，四门八二迫击炮以备掩护。果然如此，小船刚下水行驶，对岸又连续射击，我们在船上刚一还击，对岸武装人员立刻离岸逃走，连长他们取回大船渡过全连人马到对岸时，天已黄昏。等走到计划驻地渡口塘镇天已大黑，连夜找房住下后已到后半夜二、三点钟。

谁知道，天刚黎明，就在全连人困马乏酣睡时，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悄悄来临了。驻地外城四周及内城天主教堂大院内到处是连珠炮般的轻重机枪声。各排、班马上进入了预先分配的外城墙阵地，严阵以待。裴正义同志命令不要还击，派人联络分清敌我，我们一枪未还。因为我们看到围城部队训练有素的情况不可能是叛匪，内城开枪是地方武装更非敌人，经过联络误会解除，枪声停止。而我连副连长张建功同志却在与内城

连络时中弹身亡，倒在自己人的枪弹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我们渡河遇的是地方武装。他们误认我们是敌人，所以连夜派人报告离渡口塘最近的驻军一野二十兵团某营。该营连夜从外面包围，城内天主教堂大院住的地方政府及武装人员。天一亮我们便遭到内外火力攻击。

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阵亡的不少了，这是我连第一个牺牲的连干部，而且死得这么不幸。张建功同志四五年十月参军，从战士到副连长，一贯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农民出身，家境贫寒，卓子山县人。连队西进时，去过他家看望，有父、母妻室和一个儿子。我又悲痛又气愤，对裴正义同志讲：

“把区政府和地方武装围起来缴了械再打官司。”他说：“你可千万别胡来，咱俩别当了云政委说的名符其实的冒失鬼，相信领导会正确处理。”

巴盟军政领导机关都来了人，同友军、地方政府开会讨论这次事件的是与非。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直接责任人做了组织纪律处理。上级军事指挥机关通讯连络不灵也有原因。开了几次会，组织军政联欢、军民联欢，问题解决了。庆祝第一个国庆节时，全镇召开军民大会，规定鸣炮十二响。我们怕炮弹不安全、用手榴弹代替了。表面上背去了炮、到现场接连投掷十二个手榴弹，声响也很大，群众信以为真打了炮。

我们守渡口期间，未发生其他战斗，一直住到十一月底。这时，我连九班长谢贵率领数名乌审战役我连伤员伤愈归队，同时送来了新棉军装。真是有了自己国家好，被装比战争年代的好多了，带上狐皮帽，战士们皆大喜欢。我们临出发时谢贵同志因是全师战斗英雄，到绥远军区参加英模代表会，未随连出征。等他开完会回来，连同养好伤的同志一起带着棉衣赶来连队。在途中他们遇到五名鄂托克旗保安团士兵。因有敌对行为，被谢贵他们缴了械，把人押来连队处理。

经过审问，他们交待了如下情况：他们属于鄂托克旗起义的保安团，副司令刘保才，他们听说乌审叛匪头目贺永禄、巴特夫妻已逃到刘处，暗中勾结，对部下搞反共宣传，准备闹事。我们又问及了有关人员数量，武器装备、骨干姓名、地址住址等情况后，忧心忡忡，灾难深重的蒙汉人民恐怕又要为之流血了。自己没有电台，只好通过巴盟剿匪指挥部电告绥远军区再转伊盟我师。对几个俘虏教育后释放，交还枪支。并由裴副政委写给刘宝才一封信捎去。劝其站在人民立场，交出乌审叛匪，不与

人民为敌，权衡利害关系，接受乌审叛乱教训等语。

此事之后，裴正义对我讲：“老弟，可能还得血战一场，建国都一年了，打到何时为止？”“打不打由不得我们，只好奉陪到底。叛匪的枪枝不最后缴完，早晚出事。”五〇年十一月底，巴盟剿匪结束，我连奉命返回杰尔庙归团。

鄂尔多斯高原的最后枪声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连队远归杰尔庙后，我们没有过上一天安静日子。全团主力授命东调回渡黄河住京包线附近各地，以防止整个绥远起义部队调防河北省老解放区接受解放军化的改编整训中发生更大问题。杰尔庙尚须留有少量部队以备敌人死灰复燃。团党委又决定我连留守，这回云一立同志留下直接领导，配属一部电台与师部直接联系。

到五一年一月底以前，我们主要任务是收编整训驻地附近陶力中民心区的各支原地方武装，命其到杰尔庙限期集中，教育后交枪回家为民，抗命不来的全连分散为班、组四出活动、收缴枪支、武装抵抗的就地歼灭。约在五一年一月中旬左右，我连驻地二百华里范围内，在陶力中民心区完成收缴枪支、解散伪地方武装任务，未发生大的有组织的反抗。共约收缴大小枪千余支，解散伪武装人数多于枪数。

快过到伊盟后的第二个春节了。农历腊月廿三日（公历五一年一月卅日），突然发生了鄂托克旗中北部地区武装叛乱。数日后地方政府报来情况，叛匪头目是鄂托克旗保安副司令刘宝才、乌审战役漏网匪首贺永禄、乌审巴特夫妇，另加一个杭盖巴特（因二人重名、才在人名上加旗名以区别）。人数约二百余人。他们乘我团主力调离之机，以为一个连留守打不了他们。迫不及待的扩大叛乱地区、到处抓兵抢马、摧毁我地方区乡政权多个，杀害地方干部，反革命火焰正迅速漫延。在叛乱地区就近的杭锦旗和鄂托克旗西北部以黄河为界与宁夏、巴盟为邻的阿尔巴斯山区尚有千余名起义保安团队持观望态度、暗中来往，如这帮匪徒得势便群起响应参加叛乱。

当时，团的主力早已东调月余，只有我们一个连单独作战了。说实在话，我们一连全体指战员并没有把这点匪徒放在眼里，视他们为乌合之

众。建国前后连队积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饱经严寒酷暑，枪林弹雨中身经百战，没有打过一次败仗。战士们都打野了，打狂了，滋长了严重的轻敌骄兵思想。当然，这种情绪也包括我这个廿三岁的指导员在内。连队这时已在发展锻炼中逐渐成熟。风雨同舟飘遥共济的一百五十七个阶级弟兄由伟大理想、战斗友谊为基础而产生了同生死共患难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使我们任何时候都能高举马刀勇往直前的奔赴杀敌战场。武器装备早就从敌人手中缴来归己，就当时的标准讲，算是武装到牙齿了。十二挺轻机枪，四门六〇炮、冲锋枪、骑枪齐全，一百五十把马刀，弹药充足，可谓人强马壮。一九四八年秋，连队补充了约三分之一的经过教育训练有觉悟的新兵入伍，使连队建制满员。

云一立政委在大年卅除夕之夜，把我和连长叫到他的住处，心情沉重地说：“眼前情况刻不容缓，我们早行一时，人民少流一点血。大年别过了，明天就出发剿匪，算是我们献给新中国和伊盟人民的拜年礼。”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看看我俩，又接着说：“我领你们这些年了，我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全师全团都看着我们，伊盟的苦难群众也看着咱们，地方政府看着咱们，我们必须不负众望，打出十三团的雄威。可是，我也了解你们，战士们打仗打狂了，你俩不能打狂了，尤其是你——齐凤仪，指导员不是好当的。连内同志多数比你年长，你怎样才能变成象长者那样去教育引导比你年长的人呢？这点是不容易，但是战争可以教会你，把你锻炼得超越年令的界线去当好指导员。千万别轻敌，这帮家伙不是好打的，不是一般敌人。其中核心部份是死心踏地反对我党反对新中国，要不怎会在建国已经一年又经乌审战役覆灭还搞叛乱呢？”他又说：“我已发报请派援军，但半个多月才能到达，眼前我们单独作战，初战必须打好，一个连一百五十人经不起重大的伤亡，初战打不好会使敌人气焰更高，叛乱地区扩大，人数增多，我们最后要负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消灭他们。你们要爱护战士，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牺牲。这次战斗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尽量减少自己伤亡，活下来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政委的话我默默的记在心中。

连夜先开党、团员会，然后全连战斗动员大会。五一年春节大年初一（公历二月六日）连队整装出发，战马踏着齐膝深的大雪奔向鄂尔多斯高

原西北战场。我骑马立在队伍旁边，从头到尾审视我的一百五十个出生入死的战友，思绪万千。心里想：我们又去打仗了，正象苏联小说《恐惧与无畏》一书中讲的一句话：“战士的命运，不是荣归就是阵亡”。我们这些人谁是最后的烈士和生还者谁也没法预料。只有一条可以预料，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行军数日，进入敌人叛乱地区。我地方政府同志积极协助我们解决食宿和通报敌情。陶力民中心区公安特派员、老革命、人称伊盟通的周海子同志随军同行，他是活地图，用不着响导带路。初四夜间（二月九日）得知敌人住在苏米图村。云政委领我们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决定夜间袭击敌人。在夜幕茫茫下急行军于凌晨三时左右到村，马上实行徒步包围，封锁出口。但未放一枪，扑了个空。老乡说：“敌人已于昨晚迁走了”。我们行军一天一夜，人困马乏，安排警戒之后宿营了。因为夜间进村，周围地形不熟，未派出外线警戒，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天刚黎明，我们正酣睡养，突然听到西、北、东三个方向连续发出猛烈枪声。显然是敌人设计叫我们扑空并包围主动攻击我们了。我心想：“政委讲的真对，多么顽固的敌人，找上解放军的门先动手打。”政委住地离连长我俩稍远一点，未经请示我俩商量几句后确定：“先解除三面包围，我领一、二排冲出去先打垮东、北山之敌，再最后打西山之敌。他领三排和把一，二排的机枪、炮留到村内坚持，保护政委和电台。”全连机枪、炮，集中火力压制东北山敌人火力。我领一二排骑马冲锋，一鼓作气攻下东、北山两个山头。敌人向西方山头逃窜，企图同西山敌人会合。我们攻下山头后连马都未下，紧紧尾追敌人不舍。马慢的敌人不是被冲锋枪打死就是被刀砍落马。追到西山北角下时，山上敌人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我先打死一个敌人后又去追杀一个较远的敌人，等追到用手枪把他打掉马时，已离敌火力太近，全处在有效射程之内。刺耳的子弹呼啸声不断，马匹周围到处是子弹落地打出一条条雪沟翻起雪花和尘土。先是感觉到有人强力拉扯我的衣、帽、裤，我知道这是子弹穿过。接着马匹突然向左跌倒，把我一条腿压在它的身下。估计不到一分钟时间，在敌火力射击下，上来几个战士在战马奔跑中弯身拉开死马，同时五班长李明拉住我的一只手跳上了他的马二人合骑，退到北面一百米处一座独立房屋还有羊圈

的隐蔽处。李明说：“你真危险，我还以为完了呢。”下马后援救我的少部同志与山上敌人对峙射击。多数战士由一排长刘占元同志带领继续追击向西北逃窜之敌。等到他们返回之后，派人与政委、连长他们联系，决定向西山敌人主力从东、北两方实施冲击。西山地形平坦，无隐蔽死角，先骑马冲到山下，然后下马徒步攻山。一场山头攻坚战开始了。我们北方攻击的队伍没有机枪、炮掩护，因为早晨冲锋时都留到连部了，全靠冲锋枪和手榴弹，敌人真顽固，直到几百枚手榴弹炸得他们没有藏身之地时，才退下山去西逃。我们随即下到山底，组织人员准备追击，东、北两方向的战士集中了，互相转告伤亡情况。东方：“三排副排长李海同志牺牲”二排长张占成、军医拉斯冷、机枪手黄玉山桂花……；北方：一班副冯平、五班长郭玉珍牺牲……。”同志们听到看到战友们牺牲眼睛红了，悲愤满腔，催促连长和我，要继续追杀敌人。我也控制不了自己，不知怎么办。政委过来阻止我们继续战斗。他说：“敌人跑的较远，我们快两天两夜人马都没有休息了，伤亡又较多，来日方长，跑不了他们。你们要冷静，赶快打扫战场，处理伤亡同志后事。”

战斗结束了，当然是个胜仗，敌人被打败了，伤亡比我们多的多。但是，我还是悲痛极了，今天的战斗，是我参加过的战斗中最不满意最令我伤心的一次。副连长牺牲刚几个月，又伤亡了这么多的班排长。这次战斗班以上干部三分之一阵亡，三分之一负伤，战争是无情的啊！抬下牺牲同志的尸体，救护完伤员，我牵着自己的马，低头走到驮我牺牲的战马跟前，两眼泪如雨下。看着这个不会说话的战马，以追忆它的主人和这次牺牲的同志。原来它是张建功同志的坐骑。早晨冲锋前，我的马一贯性情暴烈，枪声一响，别的马子一动就控制不住。通讯员苗荣山稍未注意，被它挣脱缰绳跟先跑的马子奔走了。我随手骑上这匹马冲锋，是天意如此吗？没想到它随它的主人一道间隔数月也被打死了，身中五弹，看马思人的感情占据了我的心，我在自问：“齐风仪，你怎么了？这样伤感，过去怎不？是不是建国后想得多了，要是裴正义同志再给我开开心就好了。”正在这时，云政委从旁边走过来了，他可能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头。他问：“怎么，张建功的马子死了？”我说明原委后，他长叹一声：“唉！命中注定，人马都和我们永别了。”他又说：“你越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冷静，当好榜

样。打仗嘛！伤亡在所难免，敌人手里拿的不是豆腐，没有一个指挥员敢保证自己无一伤亡。但你能哭，眼泪咽到肚里去，要哭当我的面咱俩偷着哭，不能叫战士看见，懂吗？”我牵着马跟他步行，默默地点头，说“是，政委！”他问：“是不是想裴副政委了？”我笑着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也不想想我比你大多少！”“怪不得任广政委你们三个争当我的指导员。”这是头几年一次闲谈中，裴正义说：“要是有齐风仪这样一个连的兵，我当指导员去。”那时的团长云一立说：“什么你都抢先，该我改行锻炼政治工作才对。”政委任广说：“这样的好事轮不到你俩。”云政委说：“你看你象个讨吃的，棉衣开花满身，帽子上也有，住下求老乡补上。”我一摸，大金星钢笔也被打断了。我告诉政委：“我的武器也给打坏了。”他说：“再给你发一支，喂，年轻人，挺起胸来，继续战斗。今天看出来，这帮家伙挺难打，连队现在战斗减员较多，送伤员还须非战斗减员，今天晚上再给师部发报，请求增援吧！”我说：“政委，叛乱发生后，不就请求增援了吗？现在我求你，千万别发报求援，只报告今日战斗情况。师的援兵一定正在路上，火急前来，要再发报，好象咱们打不了敌人，多丢脸。经今日战斗，敌人除死、伤外，肯定要逃散众多。我估计剩下的顶多百人左右。咱们除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可以还有一百二十个人，一个换一个也要消灭他们。”他说：“求援意见按你的办，可一个换一个我们不干，我们比他们值钱得多，不跟敌人搞这样的买卖。”别的同志在我俩谈话时，都上马返回宿营地。我的马又不老实了，四蹄刨地直想跑，拉着我往前走。我拍拍它的脑袋，自言自语：“坏东西，早晨为什么扔下我跑了，叫‘别人’，替你去死？”政委接上说：“叫它下次战斗立功补过，咱们也走吧。”

回到宿营地，掩埋牺牲同志尸体，组织担架向后方护送伤员。唯一的一个军医也给打伤了，他只好躺着指挥三个卫生员工作。晚间政委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当日战斗，确定今后打法。对当日战斗，政委提出了深刻、正确、尖锐的批评，他说：“党委批评你们轻敌、骄傲何止一次？怎么就改不了。今天为什么一开始就冲锋夺下东、北两山头，你们就知道冲出去，砍杀一阵才痛快。这不是打狂了是什么？你们叫他包围去，不暴露自己火力，还假装怕他们。从他们主动围打我们的气焰上看，很可能向村

内攻击。你们想，他们二百多人能经得住十几挺机枪和手榴弹的杀伤吗？等用火力打垮他们之后，你们骑马再去砍杀还不行！这就等不了啦。”我首先抢着说：“是我的主意，承认错误，接受政委批评，根源在思想，我向团党委作检查。”连长说：“我俩一块研究的，军事指挥上我负责，与指导员无关。”政委说：“你俩一路货，谁也别包庇谁。我是讲的道理、经验教训，触触你们的骄傲轻敌思想。未打败仗，不犯错误，检的什么讨，负的那回责。现在，讨论今后怎打。”经过讨论，意见集中如下：“一、这股敌人狡猾，富有经验，诱我中计扑空，主动出击，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少有的；二、抵抗较坚决，有几个好射手；三、附近地区耳目多，了解我们行军宿营情况；四、这次战斗后可能剩下百人左右，肯定再不敢应战，象乌审战役一样。”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给敌人以假象，假装伤亡较大，而撤回杰尔庙；二、把部队踪迹完全隐蔽起来，叫敌人不知在哪里；三、今后行军日宿夜行；四、再次战斗不在夜间进行。”

会后，布置战士在群众中大量散布返回杰尔庙的言论，并于白日行军，还叫不少人扎白绑带装伤员，真象失去战斗力的样子，向杰尔庙方向行军。如此，一直走了三个白天。第三天晚间宿营时，黑暗中告别伤员，护送人员送他们连夜向东南奔回杰尔庙。连队则同时回返西北奔向叛乱地区。到天明宿营时，全村戒严，许进不许出，完全封锁行踪。同时，地方政府相随同志，发动基本群众，探听敌人行踪。这种办法果然生效，消息传到敌人耳中，他们真以为我连伤亡过大撤走了。再来进剿起码需要二十天、一个月以后，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感。后来据第二次战斗后的俘虏说：“经苏米图一次战斗后，我们除伤亡外，多数逃散回家。剩下留队的五、六十人。听到你们撤退后，几个头高兴极了。刘宝才说：‘解放军叫打跑了，你们还往家跑？’抗盖巴特说：‘给我再都抓回来，不回来的崩几个示众。’乌审两个匪首则说：‘咱们打跑人家个啥？是我们人多，没打过人家，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剩下这点子人，还能成气候，都是怕死鬼。那些八路真回假回还俩说。’刘宝才问：‘你说不真回，那他们在那？’贺永禄说：‘这要派人去杰尔庙才知道虚实。’敌人也可能真派人长途前往杰尔庙刺探军情。但是，时间已经无情地不留给他们存在的机会了。注定灭亡的命运越来越临近他们头上。”



齐凤仪（左四）与原一连负责同志，深入战地访问时听取公其嘎小学校长杨学斌介绍烈士安葬情况。
杜守恒 摄

第一次战斗（正月初五）后第七天（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三个方面摸准敌人住在百眼井村。两个情报是自己人送来的，一个是敌人耳目被捉审问出来的。离我们驻地什尼乌苏才二十华里。云政委领我们开了一天战斗准备会。地方干部周海子和知情群众一块参加。先凭老乡口述，绘制一个全村简图，周围地形图。然后，讨论战斗方案。云政委强调：“这次战斗一定要打歼灭战，不使一个敌人漏网，特别是几个匪首，最后结束伊盟的叛乱问题。为伊盟各族人民，最后打好这一仗，立最后一功。”经反复讨论，集中意见，制定如下方案：

一、今晚后半夜三点，夜行军到敌人住地东一华里下马隐蔽。

二、天亮后，一枪不放，骑马迅雷不及掩耳地冲入村内。

三、战斗分两个部分进行。即：连长带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全部机枪、炮，围歼村内之敌，封锁全部退路，包围每座房屋，实行徒步战斗；我和一排长刘占元带领四十个人，挑选全连快马，冲锋枪集中，马匹轻装，除人、武器、弹药外，其它行装、食品均留在冲锋出发地，准备在野外追歼乘马逃跑之敌。

前半夜，人马吃饱喂足，擦枪磨刀，检查子弹，装满机枪、冲锋枪弹夹。略睡一阵觉，三点出发上路，响导带路直扑百眼井。行进中，我骑马走到云政委眼前说：“我带的人留下一个班保护你和电台。”他说：“用

不着，团部留下的警通班五个人够了。”我又说：“交了火后，你不能到前面去，行吗？”“为什么？”“出了三长两短，我们没了主心骨，也无法向上交待。”

“离了谁地球都转，你们不怕三长两短，向我一样不能交待。”

“你是首长。”

“首长怎的？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属于党，并不属于自己。”我有点气了，怎么，我说一句他顶我一句，顺口说了：“你和我不同，出了事对不起额尔敦（他妻子），我是光棍一个。”他笑了：“齐风仪你怎么象小孩子似的，发的什么火。好了，我们是为胜利去战斗，不是为死，不会出事的，我知道我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放心吧，这还不行？”

“不行！你非得答应你在指挥员的位置上，指挥战斗。要不我就派一个班围住你不叫动”。

“行！行！非得裴正义在才能制服你。”

“他在，他也会象我这样做。”

“行啦！咱俩一块要打最后一次仗了，争什么，说点亲热话不好？”

“亲热话现在没有时间说，等打完仗再说。”约在天亮前一小时，到了村东一华里处下马等天亮。刺骨的寒风冻得大家不敢停顿一时，牵着马来回走，呼吸的热气把帽子皮毛和眼眉吹成一层白霜，眼毛形成一个个小冰球相互碰撞，坠的眼皮好疼。不能点火抽烟，难熬极了。我带的四十个人，把不该驮的东西取下马鞍，就地存放。好容易盼到天亮日出，先用望远镜瞭望，果真，敌人住在村中，马匹成群，三个哨兵成三角形，在村边放哨。经请示政委，连长命令上马。我高声最后动员：“同志们！我们战斗在马上，胜利在马上，为死难战友和人民报仇，向敌人冲锋！”

一百二十匹战马四蹄腾飞，一百二十把战刀，顺着东升的太阳闪出耀眼的光辉，象狂风巨浪般猛袭百眼井这座三十户人家的村庄。距离一华里，不到一分钟便冲进村内。三个敌人哨兵吓呆了，只来得及打一、二枪报警，便顾自己上马逃命。睡梦中的敌人，手脚快的约四十人跑出屋，慌如惊弓之鸟，丢盔卸甲上马逃命。多数是骑光背马，鞍具来不及备上，备上的马肚带也来不及紧，仓慌向西狂奔。剩下七、八十人连屋都不能出来，被我两个排紧紧围住，等待死亡的命运。跑出去的敌人向西方

拼命逃去，企图逃脱注定不能逃脱的命运。我和排长刘占元、副排长赵久富、五班长李明、九班长谢贵等几人，带领预定的四十名战士，从东向西直穿村落中央而过。别说停，连看都未看一眼，便在一望无际覆盖白雪的草原上，展开了追杀逃敌之战。天气异常寒冷，加上马匹的飞奔速度，更冻得我们五指都伸张不便，脸部被风吹得象刀割一样痛。但是，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顾消灭敌人。冲锋枪只能打一梭子子弹，手冻得换不成弹夹。但30发子弹足够敌人享用了。何况多数战士喜欢用冷兵器马刀砍劈。现在，那里还算得上什么战斗，简直是虎入羊群的任意吞食。敌人骑的伊盟小马，怎能跑过久经沙场锻炼，又是挑选出来的标准蒙古快马。不出五华里距离，前前后后一个不剩的全被枪打刀劈地消灭光了。

我的马是全师有名的快马（我用一块俄国毛毯从锡盟兰旗大马群的马倌手中换的他自己骑的套杆马）。从开始出村，我连续超越敌人，留给后面同志消灭，直奔最前边的三个敌人。赶到第一个敌人，几乎是手枪挨着脑袋，连发三枪，打他落马。第二个追到的敌人是个五大三粗穿着我们同样军装的叛匪，因我未拿出刀，慌乱中，他误认我是他的同伙（叛匪中有一部分是起义后叛变的，穿解放军一样的军装）。用蒙古话说：“别跑，顶住打。”我心想：“你他妈自己跑的比兔子还快，叫别人别跑，死到临头了还顶住打什么。”真逗人好笑。近距离内我连续向他后心开枪，子弹发发命中，顶进棉衣的深坑，都看得真真切切。可他就是不掉马。现在他已明白我不是他的自己人，头也不回光回手，用手枪还击，真把我气坏了。这小子真经



齐凤仪等同志重访百眼井时，与本村群众一起回忆昔日战斗经过。

杜守恒 摄

打，打完了剩下的整整七发子弹，他才摇摇晃晃的掉下马来。我前边十几米处，剩下最后一个敌人，战马飞快的速度不容我思考，转眼追到跟前。战斗的兴奋使我把空手枪插在套中，顺手抽出哥萨克骑兵弯刀（我们用的骑兵马刀，来自两个部分：少部分是在察盟对布里亚特蒙古白匪作战缴获的俄国骑兵马刀，布里亚特蒙古是从蒙古族中几百年前分离出去的一个宗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苏联境内贝加尔湖地域居住，今为苏联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苏联十月革命时，少部上层反叛参加白匪，反对苏维埃政权。苏联内战胜利后，携家带口逃往外蒙古，外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又逃到内蒙古察哈尔草原南部占据一块地盘定居下来。由于其反动本性，解放战争中理所当然的投靠国民党。解放战争初期我师对其进剿时，逃到多伦县城，多伦解放逃到张家口市，张家口解放再无处可逃全部就俘。后中央将他们交给内蒙古自治区安置在呼伦贝尔盟他们回族的聚居地定居下来；大部分是日本骑兵马刀），这马子好象真通人性，补救前次战斗过失，给它同类报仇，紧挨敌骑左边，一跃而过。我来不及劈砍，借助马的前冲力，把刀斜着从左至右刺进敌人体中，它连拔出刀来的时间也不给我，只好顺手松开刀柄，跑向前方。我爬在马脖子上拍打她：“老伙计前边没有人啦，站下吧！你可真立功了。”勒住马转回头，扫视整个战场，都是自己的战友，一个马上敌人也不存在了。几十个敌人，横尸遍野，白雪上被一片片热血染红。我叫通讯员苗荣山，把我的刀抽出来。他抽出刀在敌人衣服上擦净交给我说：“指导员，也不给我留一个。”我说：“后边那么多，你不打！”他说：“我不敢离开你，政委、连长多次嘱托我。”这时，战士们兴高彩烈的靠拢我说：“杀的痛快极了，一排长刘占元挂了花，三班班长高登牺牲了，云政委的通讯员太平也牺牲了，别无伤亡。”我问怎么回事，他们都说：“牺牲两人都是大意，是他们下马后，收缴被砍伤而未死的敌人的武器时，被打死的，真不应该。”此时，村内还有枪声兼有手榴弹爆炸声。我叫赵久富同志领几个人打扫战场，搜寻有无匪首尸体。我带多数人急返村内，支援战斗。还未到村，那里的战斗结束了。最后的手榴弹声是匪首之一杭盖巴特负隅顽抗，被我七班长张生举用烧燃弹击毙，浑身烧的精光。事隔三十五年，当我写这篇回忆录时，随同杜守恒同志（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和当年连长姚维孝、副排长

赵久富等同志实地访问时，六十八岁老人杨二子、六十七岁老人杨文山，对当年战斗还记忆犹新。他俩说：“当年五师背着枪举着大刀打仗，杭盖巴特叫(电子)打死，烧得就剩下一双靴子。”从战斗打响到结束约一个小时，全歼敌人一百余人，其中俘虏三十余人。我们牺牲两人，负伤数人。村内村外查遍敌尸，不见匪首贺永禄、刘宝才、乌审巴特夫妇。后经审讯俘虏，才知道这几个狡猾匪首从来不和大股匪徒住在一起。他们离村五华里住宿，听到枪声早跑了。真可惜，我们事先未搞到这个情报，气得我们跺脚捶胸。政委命令，派出二十个人，九班长谢贵带领尾追不舍，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要消灭这几个敌人。再不能使之漏网作乱，留有后患。谢贵同志授命领兵出发，向西追了五、六天之后贺永禄、乌审巴特夫妇三人被鄂托克旗西部四区阿尔巴斯起义部队团长布林特古斯抓获交给我们(后被镇压)。布原持观望态度，同叛匪有瓜葛，现见大势已去，为洗清自己，逮捕了找他避难的匪首。这样做我们也欢迎，以礼相待。另一匪首刘宝才，慌如丧家之犬，只身带两个亲信，跑的快，越过黄河，奔向阿拉善旗。后于同年四月前后，被我师支援部队警卫连派人追入阿拉善旗的布拉罕乌拉才巴登庙围歼击毙，带回人头。

战斗结束当晚，我听到在早晨战斗中，团部警通排战士太平牺牲时，云政委也在跟前。我实在有点后怕，又有点气他。要是把他打死了，我们取得天大的胜利也不光彩。我气呼呼地找他去了。

“政委，早晨打仗的时候，你在那？”

“我在指挥战斗的位置上。”

“你言而无信。”

“怎么言而无信？”

“太平牺牲时你在跟前。”他笑了，知道我是找他算后帐。

“我是在跟前，谁知道被砍掉半个脑袋的人还能抬起手枪打死我们一个人。”

“你应该和维孝同志在村内指挥。”

“当时，村内问题不大了，不放心你们，所以，去了野外战场。”

“有啥不放心的！不相信我还是战士？”

“我都相信，以后给你换匹马。”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因为打仗时，谁也不敢承担照料你的责任，给谁任务，谁说你马快赶不上你，除非换匹马。”

“以后没仗打了，换不换有啥用，你反而批评我了。我要向团党委报告你今日的危险，并批评你，你不对自己负责也得对全师全团负责，要是你被打死了，敌人该作如何宣传？你想想。”

“行啦！年轻人。今天打了大胜仗，我们要高高兴兴，你批评得对，还不行？咱们再研究一下工作吧。”

政委说：“把今日牺牲的两个同志同前次牺牲的三个同志合葬在一起留作最后纪念。几年来，从东到西作战几千里，到处埋着我团烈士忠骨，到此为止了；把敌人的尸体也给收起来，运到西北的×××庙里去（庙名忘记了），叫他们的家人自己去认尸领尸；敌人伤员分散交给附近居民照料，等家人接回；俘虏交地方政府处理。我们抓紧准备一下，恐怕快来令回团了。”

伊盟各族人民多年来的战乱灾难，就此永远结束了，走上建设自己家园之路。我的战斗生活也就此结束了。第二次战斗结束约数日，师作战科长严平，率领师警卫连和后勤人员二百多人的支援部队，日夜兼程赶来支援我们。肃清零星逃散匪徒，收缴枪枝和已开展的镇反工作任务，交给了他们。云政委准备率领我们归队回团，返回当时师、团驻地，今伊盟达旗树林召。

五一年三月下旬，春天来了，天气转暖，积雪融化。归途经过苏米图村埋葬我们五位烈士的墓地时，连队围坟地一周，向牺牲的同志告别。我骑马站在队伍中央，高声讲道：“亲爱的战友们！我们一连全体同志，随全师从祖国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草原战斗到鄂尔多斯草原。在祖国的解放战争中，许多同志为国捐躯，葬身异乡他土。而今天牺牲在我们眼前的五位烈士，是在最后战斗中与我们永别的！我们幸存的战友们，为悼念他们，现在脱帽静默三分钟！”全场鸦雀无声，一百多个钢铁的汉子，流下热泪，低头默哀。我闭眼沉思，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烈士遗容：李海副排长，蒙古族，有为青年，二十四岁；郭玉珍，文娱骨干，几个月前，还给大家唱华北军区战友刊物登的“蒋介石在台湾自思自叹”歌谣；冯平，一贯吃苦耐劳，四八年参军时才结婚一天……。不知我

想了多长时间。直到政委在旁边捅了我一下，方才猛醒，忙喊戴帽。接着说到：“对战争中牺牲的战友，最好的纪念是战斗中的枪声。”我示意连长。他命令：“步枪五发子弹、机枪、冲锋枪一弹夹，号兵吹冲锋号。预备！对空鸣枪，放！”顿时，枪声齐鸣，淹没了号音。敏感的战马，四蹄飞起刨地，前蹄跃起，后腿直立，原地打转，它们以为，又是真的打仗了。

云一立政委最后讲话：“一连的同志们！你们远离主力、独立战斗、每战必胜，大刀见血，杀得叛匪人仰马翻。为伊盟人民立下最后战功，你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高喊：“为人民服务”，政委接着说：“我代表全团谢谢你们，你们无愧于我们英雄团队无畏勇士的称号，你们给十三团光荣而染满鲜血的战旗上，增添了最后光彩。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将永世记着你们和牺牲的烈士们。我们将走向新的征途，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永远战斗到底！”

迎着东升的太阳，雄壮的骑兵连，凯旋荣归告别了半年的亲爱的团队。

附 记：我写这篇回忆时，看到了武能齐、图布升宝、严平、高乐四位同志忆述的《内蒙古骑兵第五师进驻伊盟》一书初稿。对我帮助很大，因我知情有限，在回忆录中几处的情况、时间、地点、人名，参考借用了书中所述。

在此，向以上几位原部队首长、战友，致以谢意。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脱稿

本文作者齐凤仪，曾任中共昆区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首届昆区政协主席兼党组书记，现已离休（地师级待遇）。

我与电影

〔蒙古族〕汪 焰

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曾短暂的有过一段和电影制片工作的接触，不过，那已经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了。

我生长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农村，家住喀喇沁王府附近。到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期，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着东北，我的家乡的文化开发虽然比内蒙古其它地方早一些，但以一个小小的集镇来说，既没有电厂，也没有影剧院，戏剧或电影是难得经常看到的。常见的只有皮影戏一种，大戏（在我们那里主要指京剧、河北梆子和评剧）只在举行盛大集会的时候，临时从赤峰等城市请戏班来搭野台子唱几天。放映电影嘛，大半也是这样，一年之中顶多能看个一两次。每逢这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简直就象中了魔似的，晚上是非看不可的。白天，有时候因为上着课看不成，难受得抓耳挠腮，一旦能听到隐隐约约的锣鼓声，就说什么也坐不住了，心早就飞到戏台底下去了。看戏的时候尽管人家不让观众到戏台上看，我也许是因为沾了是小孩的便宜，总是要想方设法地爬上台去，站在台口一侧看个真切。看电影我也是挤到最前边去看，总觉得不这样好象不过瘾似的。但是非常可惜，这样红火热闹的日子和机会，在一年里边没有几天。及渐长，到了高小和中学时代，同学们利用暑假寒假期间到赤峰、平泉、承德等城市旅行或办事的时候，进影院、戏院看看影剧，倒也是常有的事了。后来到中学临毕业前，一则因为自己爱好，二则有老师们的引导，我们在学校里自己也演起了文明戏，这些戏多半是自编

自演，有用蒙语演的，也有用汉语演的，内容大多反映蒙古青年为复兴蒙古而奋发进取，最后在事业上或成功或捐躯一类，自己看着也相当感动。当然，演出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可贵的是同学们那股子闯劲儿和热心劲儿。

一九四四年冬我从中学毕业。毕业前，一些功课好、家境又富裕的同学们纷纷报考大学，准备日后登上仕途或从事经济工作。我呢，论学习成绩还算是名列前茅的，只是家境窘困升不起大学。在这时候，伪满洲国电影制片厂相当于专科学校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养成所招生，对学员官费供应，于是我和另外三位蒙古族同学欣然报考到这里，出乎意料，竟被全部录取。这样，我们就成了蒙古人中首批走上电影制片岗位的青年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四名同学相约到长春红旗街（当时称“新京”市“洪熙街”）的“满映”入学。我们的教室就设在制片厂办公大楼的三楼上，宿舍在办公楼东侧，那是一幢没有后窗、后高前低、形似仓库的砖木建筑，里边是通着的一间长筒屋，上下两层通铺，下铺离地面约一尺，都铺着日语称作“榻榻迷”的草垫，地上摆着同学们用来放置碗筷、家具的一些桌椅。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个电影学府全班四十多名同学的寝室的陈设。伙食呢，差不多总是不换样的玉米面窝头、高粱米饭加一碗烩菜。一个月里偶尔吃一两顿大米饭或是馒头，副食方面记得仅难得喝过几次咖喱汤。由于吃不很饱，或是因为馋，同学们有时到外边买点煎饼、面包，就着臭豆腐吃，算是改善生活，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当学生的生活差，倒也罢了，那些电影明星、电影演员们的生活又怎样呢？他（她）们除非在本市有家的，住的条件或许好一点以外，在厂区家属宿舍住的，全是又窄又低的砖木平房，而且室内采光也不好，屋里全黑古隆冬的。至于吃的他们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经常吃的也是高粱米饭、窝头一类，顶多蔬菜副食方面稍微好一些。演员们的收入是微薄的，拍片子的

要好一些，因为可以拿到一笔演出津贴，不拍片子的人就靠那点工资收入了。由于生活贫困，一位演员的家属不得不在自己的宿舍兼开一爿煎饼铺来维持开销。他们家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常去她家买煎饼吃。

我们这个厂办学校以前已办过几期，每期仅开一个班，有时培训演员，有时培训技术人员。我们这一期又轮上学习摄影、录音、剪辑等技术了。课程设置除一般政治和日语、数理化之外，还有光学物理、光化学等许多与技术有关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决定将来要搞摄影或是录音之后，可以选学有关部分，其它就可以免学了。为了了解电影的基本原理，校长也向我们讲授放映知识，并进行操作。此外就是看电影，到摄影棚参观拍片。看电影固然是好事，但有时却又成了我们的负担。有些日本原文片，特别是那些古装片，故事情节既枯燥，对话也似懂非懂，弄得同学们直打瞌睡。但是不看又不行，因为事后还要进行讨论，同学们换着个儿都得发言。参观拍摄电影也没什么意思，三两分钟的戏，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戏，总要翻来覆去地折腾个没完没了，有时一上午也实拍不了三五个镜头，我们对这些都感到很腻烦。

到了五月份，同学们听说学校里存放着一套布拉斯班道（铜管乐器），大家很想学着吹奏。于是我们再三缠磨着老师取出来，分发给每个同学一件。我当时觉得斯拉伊特（拉管）有意思，吹起来一伸一缩，时长时短，就要了它。从此以后课余时间大家有事干了，一有空闲同学们就拿起乐器咕嘎咕嘎地吹呀练呀，直吹到周围邻居嫌吵提出抗议为止。我们的进步居然还相当快，也就是两个月的工夫，我们就练出了三四个军乐合奏曲，什么《分列式曲》呀，什么《军舰进行曲》呀都能演奏了。大家还索性壮着胆子拉出队伍去，到制片厂院内，到大街上演奏过。当时我们自以为自已吹得蛮有味儿、蛮不错了，可是当听到“满映”乐队和长春其它专业乐团的演奏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还差得老

远，自己吹得很不是味儿。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全班去吉林旅行参观，顺便还带几部35毫米提包式放映机，分别为与制片厂有关系的单位、学校放映电影。我们白天去松花江边、小北山游玩，划船，晚上为别人放一阵电影，而后回到我们的住所——吉林的一家大影院的观众厅的长椅上安眠。几天来吉林五光十色的街景和红男绿女的旅游人群浑然进入我们的梦境。这样过了几天，有一天夜间大家正睡得香甜，骤然间天崩地裂“咣咣”几声巨响，把我们从梦中震醒，有的同学尚自惊愕未定，有的同学竟从睡铺上摔下来。我们于朦胧中摸黑赶紧来到地下室，惊魂未定又听到几声“轰轰”声，震得连地下室的空油桶都跳了起来。紧接着又听到许多飞机嗡嗡的盘旋声和不断的爆炸声，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后来有的同学根据当时世界大战形势和近几个月来的伪政权处于极端紧张状态猜测，可能是美国B52型飞机来轰炸了。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是苏联对日宣战了。这天正好是八月八日。由于炸弹爆炸，有几天整个吉林市还断电、断水，铁路也不通了。我们于恐慌不安中停留了两三天，大约于八月十一、二日返回了长春。回到学校，于不安中等待时局的变化。八月十五日中午，从广播中传出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和近似哀乐般的日本《君加代》国歌。十六日晚“满映”总裁甘柏正彦在他的官邸服毒自杀。甘柏其人早年曾参加过对日本皇室未遂的政变，以后又参与策划伪满洲国的建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双手沾满蒙汉人民的血迹。树倒猢狲散，整个制片厂一片混乱，有人乘乱顺手牵羊乱拿东西，埃姆（小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电影机镜头、各种乐器纷纷被人取去和拆走，一些想护厂的人也一时无能为力。十七日制片厂宣布解散，宣布疏散人口，让大家有亲投亲，有友投友。临走还分给每人不少疏散费，我们学生每人给伪币1,500元，过后几天我和一个同学回厂

闲转，正遇厂里分钱，我俩每人又分得1,500元。乐器方面我带走了我的拉管，我的同学带走了他的黑管。以后我们两个几经周折，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历尽艰险，终于于九月底返回我们喀喇沁旗故乡，结束了我这段电影生涯史。

“满映”厂以后被我八路军接收，迁到鹤岗。一九四八年冬我偶然中碰到“满映”的熟人，他告我厂子已迁回长春，说很需要人，在多方邀老“满映”人回去，共同重建已经回到人民手里的制片厂。当时我已加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从事音乐工作，所以就无意再重操旧业了。现在我的同学中的许多人仍在从事电影制片工作，其中有的还做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从革命工作来说大家都是各有千秋了。

为什么我要提及上述这些个人琐事呢？主要的，我是想告诉读者和文艺界、电影界的同志们，时间已经不复返了，过去从事电影制片工作的同志是相当困难的、艰苦的，过着朝不保夕，寄人篱下的生活，那时候哪有个人创作任意驰骋的天地呢？！而今“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境况绝对地不同了。世道变了，条件变了，生活变了。电影界、文艺界的同志们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尚感不足的问题和困难，但时代在前进，党的方针、政策在调整，经济物质条件也在改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日子已经到来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我们经历的那些苦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五六年夏天，在我任包头市文化局副局长期间，内蒙古自治区首次决定成立自治区电影制片厂。自治区文化局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以我过去接触过电影制片工作，决定让我参加自治区制片厂的筹建工作，随后留厂任职，我当然很高兴。但是当时形势急剧转化，制片厂停建，这样，我也就无须离开包头了。

现在情况更不同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许多地方都已经

建起了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已于一九五八年初建，经十年动乱停顿，现已恢复并开始拍片了。故事片《阿丽玛》已同观众见面，《母亲湖》正在拍摄中。我们内蒙古终于有了自己的制片厂并正式出产品了。这是何等重大的变化啊！抚今追昔，人们无不由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包头市文联于一九七八年末恢复组建，一九八〇年本市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之际，包头市电影工作者协会筹备组得以组建。这前后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文艺界同志拨乱反正，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艺术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许多同志纷纷执笔撰写电影剧本，有的已刊载于各报刊，有的正准备开拍，还有些同志多次参加了电影摄制工作，从各个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这都是令人欣慰的，值得人们欢迎的事情。从包头电视台建立以来，电视又已闯入人们家庭生活领域，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内容。写好电影，看好电影，看好电视，熟悉它们，用以宣扬五讲四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青少年和广大读者宣传爱祖国、爱民族，爱科学，爱劳动，搞好恋爱、婚姻、家庭关系等，这已成为我们电影协会筹备组工作的重要课题了，有鉴于此，我们还创办了《电影与电视》专刊，辑录了本市作者撰写的《寂静的边陲》、《迷途》、《弥合》等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许多评论文章。这一切，都说明我市的电影与电视事业，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作为文联的负责人，抚今忆昔，心情感到无比欣慰！

汪焰，蒙古族，前包头市文联主席、组党书记，《鹿鸣》文学月刊主编。现为市文联顾问兼任包头书法家协会主席。

我对中蒙两国划界定桩的回忆

〔蒙古族〕 郑林台口述 鲁玉华 整理

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定了《中蒙边界划界树桩协议书》，同时，成立了联合委员会。我方代表有外交部东欧司司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嘎秘书长等人，并且下设了三个大队，即巴盟为一大队，乌盟为二大队，锡盟为三大队。大队下面根据盟属旗县的数目，又设了小组。三大队的大队长是锡盟的副盟长格瓦，副大队长是国家测绘局的苏同志。该队下设三个小组，第一组组长是东苏旗的副书记哈斯宝力道，副组长是军人老布森；第二组的组长是阿巴嘎旗的副书记岗巴图，我是军人代表，所以任副组长；第三组组长是东乌旗的副书记孟根，副组长是东乌旗边防总站副站长巴特尔。每个组都有一位国家测绘局派来的技术副组长，都设有技术材料组、秘书联络组和后勤组。

蒙方的机构设置与我方相似，也设三个大队。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方省的副省长任大队长，和我锡盟三大队相对应。我第二组的对方组组长是蒙古边防站站长巴特尔少校，也有一位技术副组长。

我三大队的划界树桩地段是：西到乌盟，东至小兴安岭的宝德善。我们二组分担的地段是：西至阿巴嘎旗的白云温都热，东至东乌旗的希热温都热，大约有二百华里的边界线。

一九六三年三月，我方边界划界树桩人员第一次会议在包头召开，主持人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嘎秘书长。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认真讨论了划界树桩的重要意义；学习和熟悉了《中蒙边界划界树桩协议书》及《边界线走向图》（协议书是以历史上的习惯界线为主制定的，《边界线走向图》是根据协议书绘制的）；熟悉了有关外事人员的守则、礼节、注意事项等。会议期间，根据蒙方的要求，在包头定做了水泥界桩。界桩的规格是：高两米，是由两截一米高的水泥桩衔接而成；厚度是十公分；宽度是二十公分。向我方的界桩面上方，刻着“中国”两字，中间刻着界桩的顺序号码，下方是树桩的年号；向蒙方的界桩面上方，用蒙文刻着“蒙古”两字，中间也刻着界桩顺序号码，下方也是树桩的年号。

会后，各大队做了约两个月的准备工作，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初，便各自就位。在边防线上，中蒙双方联合开了三天大队会议。内容是：宣读了联合委员会关于双方大队长的任命书；双方互相介绍了全体人员；共同讨论了《中蒙边界划界树桩协议书》和《划界图》。对有分歧之处，则经过双方充分讨论而统一了意见；共同确定了会议制度；树桩工作中期和结束时，各召开一次联合会议；双方各自指派了联络员；经过讨论，对搬运、埋桩工作做了分工：一组是中方派人，二组是蒙方派人，三组又是中方派人；具体安排了工作日程，每星期工作六天（其中野外作业四天，室内作业两天），休息一天。此后，双方人员便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我们的野外工作程序是：双方技术组长首先各自同时测定边界线的走向和树桩位置。测定的方法是利用方位物，以前三角找树桩点（要以《划界图》为标准，确定边界线的走向和树桩位置）。测定完毕，便共同协商。无分歧就写成报告，上报组长。双方组长也无分歧，便可在报告上签字，而后树桩。若双方技术

组长有分歧意见，经过协商仍不统一，便要上报组长；双方组长协商后意见也不一致，再报告中蒙划界树桩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再派人协商解决。但有一个原则，如果《划界图》与《中蒙边界划界树桩协议书》有出入时，则以协议书为准。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仍要出现问题，双方往往因为两三尺领土相争执，这就是寸土必争。阿巴嘎旗有一个叫呼和尼宝勒格（是“母泉”的意思。这里有十三眼泉水，呼和尼宝勒格最大）的地方，水草丰美，极宜放牧。双方技术组长在此测定后，对所定树桩点没有分歧意见，双方组长也已签字，蒙方才发现图纸上的树桩点有差错，便争辩道：“协议书上的树桩点在呼和尼宝勒格上，可现测定的树桩点已深入我方三百米！”因为《中蒙边界划界树桩协议书》上明确规定：双方组长一经签字，便形成事实，不可改动。所以我们也据理力争：“既然如此，当初你们为什么要在报告上签字？”这样，各持理由，意见难以统一，便报告了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指示：划界树桩工作继续向前进行，留下这个有争议的地方，待以后解决。在划界树桩工作结束时，联合委员会派人来，以蒙方让两个争议点为条件，我方也作了合理的让步，问题才得以解决。

在野外，中蒙双方小组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进午餐，所带食品共同享用。下班后，回归各自的驻地。双方的驻地，都在各自边界线以内五华里的领土上；双方的活动范围，不得超过对方边界线以内十华里。

室内工作两天，是指中蒙双方小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在双方驻地各工作一天，各自将野外工作情况整理成中蒙两种文字的材料，双方组长互相在材料上签字，分别给各自的大队报一份。

整个划界树桩工作，从六月起，到年底结束。我们二组的工作，由于中蒙双方的共同努力，于十月份提前结束。最困难的是

第三组，他们分担的地段是宝格德山，全是深山老林，测定时已是冬季，气候严寒，又下了雪，行动极不方便，吃了许多苦头。

划界树桩，是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特殊任务。因此，在野外四个多月的工作、生活中，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风餐露宿，都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

一九六三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物资仍然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对我们边界工作人员的生活特别关心照顾。我们住的帐篷，全是新帆布做的。工作服、大衣、鞋帽、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吃的全是细粮，烟酒在当时来看，都属高级品。还配备了足够的交通运输工具。另外，边境各旗县都在牧民中宣传了划界树桩工作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无论到了哪个边境公社，公社的领导和牧民都要来探望、慰问我们，经常给我们送马奶酒和各种乳品，附近的农场还给我们送来各种蔬菜。这一切，都是我们顺利完成划界树桩任务的前提和保证。

本文口述人郑林台，前昆区政府副区长，离休干部

追记包钢副总工程师周同藻

祝 福

他，周同藻，酷爱钢铁这一行。一九三七年从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后，辗转于大西北、西南，先后担任过工科大学助教、钢厂冶炼工程师……。为了事业，他直至三十四岁才成家。一九四七年，他以前三名的考试成绩，赴美留学。翌年，解放军进军号响彻神州，美国政府进行封锁，许多人留在异乡了，以后成了博士、富翁。而他，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向所在工厂一个看门人借了路费，匆匆搭上最后一艘轮船，游子归来了。从此，三十八年坎坷，命运多蹇。然而，他一往深情终不悔，直至埋骨大青山下，魂系包钢……

包头最大的污染源是包钢烧结厂。一九七八年前，这个厂室内粉尘浓度高居全国第一，超过国家标准一百一十三倍。每年，事故率惊人，达一万三千台时，全厂三分之一作业时间是处理事故。厂内废料达十万多吨，每年亏损达二千万万元……。烧结厂象一把紧合的铁钳，卡住了包钢的脖子。

一九七九年春，周同藻刚刚摘掉戴了十四年的“美国特务”帽子不到一个月，就迎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一缕春风，向包钢党委请求去烧结厂当厂长。他说：“我搞了一辈子烧结矿，烧结厂上不去，我吃不香，睡不稳。”在新中国钢铁史上，周同藻曾先后担任过鞍钢和包钢第一任烧结厂厂长。可现在要把这一位在包钢冶金资历最老的同志、六十八岁的老人派到包钢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却叫人为难，众说纷纭。周家的人也都摇头，表示不同意。可周同藻却吟起心爱的诗：“镜里流年两鬓残，寸心自许尚如丹。”公司领导知人善任，力排众议，同意了周同藻的要求。

烧结机主楼高四十多米，登高远眺，包钢十里厂区一览眼底；低头下看，头晕目眩。周同藻戴着深度眼镜，一只背着的手扶着过去受过伤的腰部，迈着发颤的双腿，气喘吁吁，登着一百七十二级台阶向上攀。球团车间氟气污染最严重，那里连玻璃都被氟气潮得发白。而这又是烧结厂最关键的岗位。周同藻每天都要上去好几趟。工人们看着他肿得连鞋都难以穿进去的双脚，心疼地说：“老厂长，你以后不要上上下下了，你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我们心里也痛快！”周同藻说：“我最不赞成坐办公室指挥生产，那是官僚的作法。”经过调查研究，周同藻提出了烧结厂产量、质量创设计水平、超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的设想，制订了厚料层、低炭、中水的操作方针，改变了烧结厂自投产以来沿袭相陈的“薄铺快转”的旧操作方针。周同藻到厂两个月后，陆续签发了“精矿仓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岗位责任制，打破了吃“大锅饭”之陈规。看火工序是生产人造富矿最关键的岗位，以前被忽视。周同藻将它定为全厂奖金最高的岗位。他还和厂党委书记刘玉秀商量，把一些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种种原因被长期冷落的有能力的中年知识分子，提拔到了重要岗位。

烧结厂变了！一九七九年，产量第一次突破百万吨大关，翌年便上升到一百五十九万吨。作业率也比七八年上升百分之十五点八三。从一九七九年起，他们修复了三十四台除尘设备，还修复了净化系统，除氟可达百分之九十五，基本上治理了废气对周围大气的污染。以后周同藻调离了，新任厂长陈德民等人沿老厂长开拓的路子继续干。在包钢，烧结厂是第一家产量破设计水平，进入同类企业先进行列，第一个获企业整顿验收合格证，第一个实现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

烧结厂生活最困难的，是家属没户口、在张家营子自盖小土房住的工人。每到雨季，他们都提心吊胆。周同藻带着干部挨家查看，看到有的工人因房子小，只好蜷腿睡觉，他难过得直掉

泪。他说：“工人们有这么多的困难，我们当领导的不去关心，谁关心？”他几经周折，用厂里的废料盖起三栋职工宿舍，使五十多户工人搬入了新居。

古稀之年的周同藻先后担任了包钢科技办主任、科协主席，还被选为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一身兼任数职，每天忙个不休。一九八二年，他任晋级评委会副主任，主持包钢首批晋升高级工程师人员的考核、答辩。第一批六十四名高级工程师中，有八人外语不过关。周同藻奔波在呼包二市之间，为这些长期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辅导外语，终于使这些同志顺利过关。近年来，他两次去西德考察，一次去日本考察，回来就结合包钢实际写报告，为发展我国的原料工业不遗余力地工作。一九八二年底，他心爱的大女儿不慎触电惨死。一封电报把正在北京准备去宝钢的周同藻召回。老年丧子，巨大的不幸击倒了他的老伴，接连发了两次脑血栓。可周同藻强忍悲痛，顾不上安慰相濡以沫的老伴，不到一个月，又匆匆踏上去西德的班机。八五年底，他已七十四岁高龄，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可他一天也没在家休息过。一九八六年四月，周同藻出席武汉举行的金属学会时连续发高烧一周，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最后的日子，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因为他听说包钢将实行退休工程师回聘制度，他听说国家可能拨款给包钢，就不顾孱弱的身体，抱病写了三千字的“七五”原料平衡建议书，提交给包钢党委；他还准备好好写一篇关于原料工业的论文，说：“这回要一直捅到《红旗》杂志。”他口述，二女儿周家娴记；另一篇关于人才问题的题纲也已拟好。十月八日，死神已接近了他。前来看望的包钢经理张国忠对周同藻说：“你写的规划常委讨论了，决定按规划的意见办。”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女儿说，三十多年来从未见他这样开心地笑过。次日，他离去了。但是，包钢人觉得他没死，在与草原钢城一起腾飞。

缅怀昆区文史委员希格同志

杜守恒

昆区政协委员希格同志，是一位蒙汉语文兼通的知识分子。1937年3月出生于昆都仑河畔的一个牧民家庭，自幼能歌善舞，爱好狩猎，具有蒙古民族正直与好客的性格。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一直从教于包头蒙古族中学、市教育学院等，曾任学校工会主席、党支部委员、书记等职。他多才多艺，业余时间创作过不少蒙语歌曲、散文和诗词；他在音乐方面也是多面手，不仅会谱曲，还会拉马头琴、二胡等几种乐器。1984年10月，他以土生土长的当地蒙古族知情者身份，应区政协邀请参加了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之后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三次陪同我们深入乌拉山及昆河两岸广大地区，跋山涉水普查文史与有关实物。

这位文史工作的热心人，短短一年多的工夫，即撰写了《昆都仑召沿革》、《哈德门沟初探》、《木尼山与乌拉山之说》和《关于包头一带的鹿及绝迹年代考》四篇史料翔实的稿件，共约三万八千字。经核编，均被刊载到《昆都仑文史》一、二辑上。由于他在文史方面的卓越贡献，于去年五月的二次全委会上，光荣当选为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时隔不久，他又被包头市和内蒙古政协文史部门聘为“特约撰稿人”。今年三月，我区政协召开经验交流表彰会时，希格委员以优异成绩受到表彰。

会后，为了完成《包头的蒙古族》文史专稿和《昆都仑文史》第三辑的稿件，他不辞劳苦地抱病踏遍了呼和浩特与巴彦淖尔等盟市的山山水水，寻师求教，查证和核实手头的史料初稿。正当

我们期待他的新作早日脱稿入辑，希格同志突因癌症住院。在我前往医院探望他时，他紧握住我的手说：“材料都搞到了，只要病情稍一好转，我马上就动笔……”说着，便从床头上拿出一些稿子，交给我看。我见他双手抖得厉害，便安慰他养病要紧，不宜过度操劳了。

很快，第三次全委会开幕。当我和其他委员再去医院看望他时，这位可敬的文史干部，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了！大家噙着惋惜的泪花，默默的凝望着他……就在全会闭幕的那天晚上（五月三十一日下半夜），年仅四十八岁的蒙古族政协委员、建国后党培养的第一代牧民出身的大学生敖特恒贺希格同志，枕着厚厚一部文史稿纸，与世长辞了！

啊，尊敬的希格委员，他虽然比我年龄小得多，但在艺术修养、文史知识，尤其是在民俗学方面，都是我最敬重的良师和益友。记得在我整理《夫人河的传说》、《阿塔山的故事》这两



图为希格同志（左二）和政协机关部分同志深入乌拉山普查文史实物时，在昆都仑召西北界石前合影

篇蒙古族民间文学时，他读了初稿后，毫无保留地将幼年时代祖母讲的故事，为其校正和充实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而发表时一再不让署上他的名字。这种高尚的文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去年三月，我们一起到哈德门沟后口，一个山陡路滑的悬崖上拍照古代岩画时，因我体力不佳，每爬一步，都要气喘腿颤，希格同志象兄弟一样，生怕我有所闪失，自始至终一直搀扶着我。这一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更令人钦佩的是，他那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态度，也为我们文史干部树立了楷模。在他撰写《包头一带的鹿及绝迹年代考》这篇史料时，为了查证几个细节，经常翻阅几万字的蒙文资料；甚至还走访不少年逾古稀的老牧民、老猎手，寻找各个年代的鹿角进行考证。他的每篇文史稿件的字里行间，不知凝聚着他的多少心血！在我结识希格同志的两年间，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東西。

尊敬的希格委员病故了，他象千里草原天际的一颗银星，划着皎洁的光芒流逝了。然而，他留在人间的生命之光，将伴随着他的篇篇文史著述，传之后世，永不泯灭。

安息吧，希格同志！

1986年6月2日

本文作者杜守恒，系本届政协驻会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血红蛋白研究专家秦文斌教授

朱企泰 阎充英

包头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秦文斌，二十多年来，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血红蛋白研究工作上，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他的血红蛋白研究跨入先进行列，成为我国当代有名望的血红蛋白及血红蛋白病研究专家之一。

(一)



秦文斌走过的是一条同许多专家、学者不同的生活和科学道路。他一九二八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个贫苦家庭。他少年时代，东北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奴役之下，父亲母亲做过苦工，当过劳工，终日操劳，全家仍难以糊口。秦文斌自幼聪明好学，但饥寒交迫的生活，几乎剥夺了他读书的机会，他从小就分担了生活的担子，边读书，边拣煤核，挖野菜，饱尝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他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厚爱。父母不忍心让他中途辍学，甘愿双双卖身充当劳工，挣下钱节衣缩食，供秦文斌继续读书。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前，秦文斌同时考入辽宁医学院和沈阳医学院（后改为中国医科大学），他家的日子更苦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不得不在课余时间挑担上街卖菜。对公子哥们的嘲笑和小姐太太们鄙

蛋白之间存在种间杂交。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内，秦文斌和他的同事也开始了同样的工作。在文献资料奇缺、实验设备极差的条件下，年轻的秦文斌充分显露了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天才和毅力：他们自己去跑血样，自己搞设备，用多种动物血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的机遇是那样小。据数理统计，世界上第一例血红蛋白杂交的“杂种分子”占百分之五十；第二例则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五。秦文斌他们将遇到的仅是百分之十二点五。在单调的，但又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实验中，他渡过了数不清的白昼和夜晚，忘记了多少假日和节日。在汪洋大海中他终于抓住了那“百分之十二点五”，摘取了世界上第三颗血红蛋白杂交的“杂种分子”的“宝珠”。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他成功地进行了羊与犬、羊与兔血红蛋白之间的杂交，共发现四组新“品种”，给分子进化、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等学科提供了新知识。这一成就使他的科学研究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一九六五年《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学报》刊登了他的论文；一九六六年，我国科学技术界权威杂志《中国科学》对国外发表了该论文的英文稿。他一时间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目，世界上有十七个国家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函向他索要资料和交流经验。

“有怀疑才有希望 —— CS
型血红蛋白H病的发现

在我国，血红蛋白H病是郁知非教授发现的。秦文斌则发现了另外一种血红蛋白H病 —— CS型血红蛋白H

病。

一九七六年初，广西田阳医院寄来一批血样请秦文斌帮助分析诊断。在实验中他经过反复观察，发现一种与一般的血红蛋白H病不一样的奇异的“慢泳”。他把结果告诉了广西田阳医院，希望他们再寄血样。不久，血样寄来了，并同时告诉他，第一批血样也寄给了国内另一个研究单位。那里并没有发现他所看到的现

象。秦文斌见信后思绪万千：难道自己观察错了？他的这种疑虑不是无端产生的。因为那个研究单位设备条件好、研究人员多，又有血红蛋白研究前辈做指导。但是，他确实看到了奇异现象。

“有怀疑才有希望”。这句不知谁讲的名言启发他继续探索。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最终弄清患者血中确实存在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含量极少的异常血红蛋白。秦文斌通过比较认定，这就是国际上所说的CS型血红蛋白H病。他的这项科研成果再次得到医学界肯定，中华医学杂志先后以中英两种文字发表了这项成果的论文。

从牙买加到中国 血
红蛋白康士坦斯普瑞英

在地球的那一边，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共和国，有一个为世界许多学者知道的村庄，叫康士坦斯普瑞英（Constant Spring）。

一九七一年，英国学者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异常血红蛋白，他以此村名命名，这个小小的村庄成了引人注意的地方。一九七六年，秦文斌在广西田阳的血样中发现了血红蛋白康士坦斯普瑞英。它存在于患者血红蛋白杂合体中。一九八四年春天，广西又寄来了类似血红蛋白纯合体血样。此时，秦文斌的研究室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学科研究机构之一，建立起结构分析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室认真分析了这批血样，证明 α 链e末端多出来三十一一个氨基酸。这种多肽链延长者国内还是第一次看到。至此，秦文斌在国内首次发现了血红蛋白康士坦斯普瑞英。国内《遗传学报》、美国《血红蛋白》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

化实验室中的新发现 血
红蛋白与糖尿病的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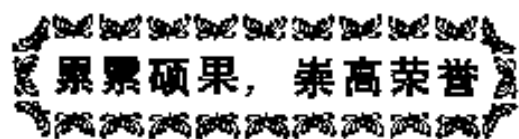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正在动乱的高峰，学校停课，武斗升级。内蒙古医学院基础部的教师被打发到附属医院当

“大夫”，这对许多人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听诊器”比当老师

吃香得多。秦文斌却要求到化验室当“化验员”。在一些向往听诊器的人看来，这简直是天大的傻事。但是他心甘情愿地去了化验室。原来，秦文斌心里藏着个秘密：在完成常规化验工作之后，可以利用化验室设备，观察自己早就开始研究的血红蛋白与糖尿病的关系。一天，“机遇”终于来了。他下班时因走的匆忙，关掉电源，可忘掉了撤实验。第二天该撤实验了，他犹豫了一下，又接通了电源。晚上，秦文斌进入实验室，突然高兴起来，他看到了那盼望许久的现象——血红蛋白 A_1 增多，其量远远超过国外文献所描绘的程度。他高兴了一阵，不久又沉默了。刚刚捕捉到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他又因“革命需要”被迫离开了化验室。这一停，就是七百多天。两年后，他在校办工厂才又开始用实验检验自己的设想。他终于成功了。用他设计的实验方法，不用特殊试剂，几小时就可测定出患者病情，效果比国外同类方法明显提高。一九七八年，秦文斌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公诸于世。中华医学杂志用中文和英文向国内外推出了他的论文。

其后，他又发现了一种国内外文献没有描绘过的自然现象，秦文斌称之为“血红蛋白 A_2 现象”。在这个科学迷宫里，他已经找到了几个藏宝处，可是这个“斯芬克同”之谜尚未完全解开。他还在继续深入研究……。

(二)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秦文斌的血红蛋白研究也掀开新的一页，他开始对过去自己发现的异常血红蛋白进行化学结构分析。几年来已经完成了二十多例。其中除了国内首先证明血红蛋白康士坦斯普瑞英的存在外，还有国际上首次证明蒙古族中血红蛋白D旁遮普，部分支持了国际血红蛋白研究权威雷曼教授关

于这种异常血红蛋白来源于蒙古族的假说。到目前为止，他在国内外发表的重要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并有《高脂蛋白症与冠心病》、《血红蛋白病》两部专著出版。后者是国内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有广泛的影响。

鉴于他在血红蛋白研究中所取得的成绩，几年来曾多次获得荣誉称号和奖励：一九七七年获包头医学院科研特等奖，包头市科学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奖，获包头市劳动模范称号；一九七八年连续获自治区科学大会、全国卫生科学大会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科技工作者奖、成果奖；一九七九年再次被授予包头市劳动模范称号；一九八〇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一九八二年有四篇论文获包头市优秀论文奖，获包头市先进工作者称号；一九八三年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表彰座谈会，获奖章、奖状，并获内蒙古自治区高教先进工作者奖；一九八四年有七篇论文获包头市优秀论文奖；一九八五年获内蒙古自治区遗传学会科研论文一等奖。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日本学士院访华代表团成员、国际“无过氧化氢酶血症”发现者、冈山大学及川崎医科大学名誉教授高原滋夫院士，由北京专程来包访问秦文斌教授。这位德高望众的国际知名学者在做学术报告时说：“秦文斌先生是一位很好的教授，他在血红蛋白研究方面做出了很了不起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四月，秦文斌应高原教授邀请访问日本，在那里他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活动，与日本血红蛋白权威柴田进教授等同行恳谈，交流学术成果。一九八六年九月，秦文斌应邀参加了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七届人类遗传大会。



秦文斌在从事多年生物化学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他讲课循循善诱，理论联系实际，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一九八五年

第一个教师节时，他被评为包头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优秀教师。

秦文斌教授治学态度非常刻苦、严谨。为了掌握科学信息，开阔眼界，提高学术水平，五十年代他就曾自费去北京查阅资料。整个暑假，他冒着酷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认真摘录、记下需要的材料。在做实验时，他认真观察，认真记录。仅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他就作了九十本实验记录，约一百万字。他在困难面前从不气馁，勇于进取，善于开拓，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在十年动乱中，实验室被封闭，他的实验被迫中断。为了追求科学真理，他决心在家里建一个简易实验室。从委托商店买回两台旧收音机，请人帮助改装成整流器，需要电泳槽、支持体，自己花钱买。需要淀粉，他和孩子们一起擦土豆、澄粉浆、晒淀粉。需要光密度计，当时市场价格为两万元。他那时每月收入只八、九十元，自然不敢问津。但他也没有动摇、退缩，决心自己动手制做。在一种伟大坚定的信念鼓舞下，土光密度计做成了，土高压电泳仪做成了。土造的仪器自然落后，药液、试剂都不完全合乎标准。因此，实验过程就要比别人长。有时人家一两个小时就可做完的实验，他却要用三、四十个小时。电子计算机瞬间处理完的数据，他用算盘要拨动成千上万次。当他偶而获得一些最新材料时，只能用自己那架普通照相机翻拍，坐在土阅读机旁，象修钟表匠人一样，戴着目罩阅读那针尖大小的文字。在这样条件下，他刻意求精，勇于创造。国际上最初使用的血红蛋白的杂交方法，一次要用四十八个小时左右。开始他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追求、探索，逐步改进操作技术。终于使血红蛋白杂交的时间下降到一分钟，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两千八百多倍。

党和人民的信任激励
他不断攀登继续前进

秦文斌教授的科研工作，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志宏等曾亲自来包头医学院

视察观看他的实验室,帮助解决经费,购置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

党和人民充分信任在科研工作中做出出色成绩的秦文斌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曾被选为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多次出席会议,与各族各界代表共商国家大事。秦文斌在学术界也享有较高的声誉,参加了国内外许多学术活动,他先后担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医学遗传工程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和医学委员会委员、血红蛋白病科研协作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内蒙古分会副会长、包头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生理科学会内蒙古分会副理事长、《遗传学报》及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编辑委员会会员。一九八六年十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又聘请秦文斌为该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物科学部第一届第一次学科评审组专家会议。

一九八四年三月机构改革中,秦文斌同志担任了包头医学院党委常委、院长的领导职务。他走上领导岗位以后,面临新的繁杂的行政事务和众多的难题。象在科学难题面前一样,他没有退缩,依靠集体的领导和广大教职工的支持,夜以继日地工作,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在实践中摸索领导工作的规律。他注重领导方法的科学性,讲究效率,十分珍惜和节约时间,说短话,开短会,扎扎实实解决问题。他同其他院党政领导一起,带领全院师生员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改革包头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其他各项工作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仍担任着生物化学教学任务,更继续着他那探索血红蛋白奥秘的科学事业,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上,向着新的目标,奋力拼搏,继续前进!

本文作者朱企泰,系包头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阎充英系该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从医五十年

郭体绪

我从事眼科医疗及教学工作至今已五十年了，其中河北省四年，天津市一年，包头市四十五年。我是包头市的第一个眼科医生。初到时是一般医师，1951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62年评定为包头医学院讲师，1981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1957年至1985年除“文革”期间外，一直担任五官三科主任，并一直任中华医学会包头分会理事及历届眼科学会主任委员。五十年来，我从一个一般医师成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回忆1948年秋，包头市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民脂民膏被他们搜刮殆尽，致使“米珠柴桂”、民不聊生。当时我虽然是绥远省立包头医院的眼、耳、鼻、喉科医师，但月工资仅给银元券三元，连一个人的月口粮都不够，怎能养家糊口呢？正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包头市解放了，劳动人民如久旱逢甘露，拍手称快，欢欣鼓舞。蒙绥军区卫生部长李振智及主任军医罗定州同志等接管了包头医院，罗主任兼任院长。医院中原大多数职工照常上班，干劲很足。我们眼、耳、鼻、喉科也很忙。当时就诊的多数是解放区来的军政干部和战士。记得李振智部长陪着蒙绥军区司令员姚喆、副司令员王长江、市公安局局长郑孝先等都来眼科看过病。姚司令员和王副司令员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与旧中国作威作福、盛气凌人、欺压人民的官吏相比，真如天壤之别。解放期间，医院职工每月领到

米、面、油、毛巾肥皂等生活必需品，生活得到保障。因战斗需要，解放军自动转移。两个月来军民结下鱼水之情，医院职工依依不舍，含泪相送，以不久再见握别。这段难忘的岁月至今记忆犹新。1949年9月19日，包头市永久解放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解放后至“文革”前十七年，我是壮年时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使自己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解放初期包头市只有一个人民医院，我是这个医院五官科的唯一医生。土改后农民翻了身，购买力逐步提高，城市建设使职工队伍日渐壮大，因此患者数量增多。五官科每天门诊病人常达百人，有时多达一百三十人次。我和两个护士白天看门诊，晚上查病房、做手术，早晨六至八点给卫校学生讲课，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累。1957年支援包钢建设，人民医院一分为二，我被分到第一医院工作（当时院长邢青芸、副院长康子铮），任务依然很繁重。但是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尽管医疗、教学以及社会工作等任务繁重，可我仍觉心情十分舒畅，并不觉疲劳。能为患者解除病痛是我最大的快乐。例如乌兰计村的计色小，失明十八年，经我治疗后他重见光明，使他从五保户中解放出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的欣喜之情，不亚于计色小本人。

如同恶梦一样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多数人民遭浩劫，知识分子更难幸免。我被关“牛棚”、强迫劳动七年。做为一个医生，一个共产党员，做梦也想不到会被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在数百人的大会上多次在“打倒打倒”的口号声中挨批斗、武斗。被冠之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朝元老”、“内人党”等莫须有的罪名。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为一系列冤假错案平了反，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我也得到第二次解放，如释重负，重新抬起头来，振作精神，投身四化建设。除了担任

医疗、教学、党务工作外，还撰写了医学论文十几篇，其中两篇被评选为优秀论文并获奖，在专业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八篇，其余在自治区和市学术会议上交流。

五十年来，我为人民做了微不足道的贡献，但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5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我当选为昆区人民代表，同年获市教育工会优秀积极分子奖；1959年获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奖；1978年获市医学科学学术活动积极分子奖；1985年被推选为昆区政协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诚乃受之有愧。

总结我五十年的医疗与教学实践，有如下点滴体会：

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应视病人如亲人，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体贴入微，运用各种检查手段，仔细诊察，做到准确的诊断。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做到恰当的治疗，收到预期效果。倘遇到疑难、复杂慢性病人，还要在精神上安慰他，使之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医生配合治疗，才能治愈顽疾沉痾。病人感到温暖，对医生产生信任感，治愈疾病才有事半功倍之效。要全面诊疗疾病，一丝不苟，不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一种症状，可能原因不同，应查清病源，予以根治。治疗中要以“缓则治本”，“急则治标”的原则认真诊疗。

医生为患者服务，反过来患者又促进医生业务技术上不断提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充实理论，循环往复，精益求精。

给学生讲课，不但是传授知识，同时又促使我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这就是教学相长。我先后为包头护校、包头卫校、包头医学院的学生讲课三十多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认真备课，自己的理论水平也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应感谢学生。教学体会是：要重点突出，标题明确，深入浅出，举例通俗恰当，使学生记有重点，听有兴趣，印象深刻以利记忆。

董其武副主席对我的几次接见

刘发林

最近，我又重看了全国政协董其武副主席写给我的几封信，信中的谆谆教导至今激励我将跟着生活去探索努力，跟上时代的脚步，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使自己能逐渐成熟起来。于是，董老在北京寓所接见我时的一些情景，又不断地展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个清晨，我怀着景仰之情，在董老秘书人员的陪同下，走进外院南房董老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北京人家的四合院，里院有正房、西房和东房，外院是一排南房，包括大门口的传达室，董老的办公室就在这排南房的最西头。

屋内陈设简单，一进门是一套沙发和茶几，正面是两个并排的书柜，旁边还有两个办公用的柜子，靠窗处是写字台，上面摆着文方四宝和一本本整齐的书籍杂志。我们走进去时，董老正在用放大镜查阅字典，好象在写什么文章。当董老把我的一些有关创作《绥远演义》一书情况问完之后，便让秘书把他刚写的有关绥远起义的回忆录，给了我一份，并坐下来详细谈了他跟傅先生的一些情况。

董老高兴地回忆说，他早年因仰慕傅作义先生，毅然脱离原部队，从上海奔向天津，投效于他的门下。他先后任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上尉，少校参谋，后到部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至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

主任。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起义止，他在傅将军领导下任事二十余年。绥远起义后，他们又一道工作一年多。后来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他们时常来往，互相劝勉。他们俩决心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党和人民所交给的一切工作。直至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将军逝世，他们俩在一起相处近半个世纪，可见感情很深。

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我记得董老还给讲了这样一些有趣的事情，使我至今印象很深。觉得很新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包头市警察局局长马秉仁扣捕了一名所谓共产党要犯，名叫黄静斋。傅先生得知后，即令将黄静斋解送归绥。在交谈中，傅先生得知这个黄静斋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便甘冒风险，对王若飞采取优待措施：一是变相关押；二是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王若飞做伙食补助。为了不露马脚，傅先生告诉王若飞：对外仍用黄静斋之名。后来，何应钦、阎锡山等人都要傅先生把“黄静斋”解送给他们，由他们处置。傅先生均以托辞，保护了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同志在押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次，他要求傅先生给他几本书看，傅先生便送给他一套《四书》。王若飞同志在这书上作了万余言的批注，大讲唯心与唯物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理论。然后，王若飞同志将书退给傅先生。傅先生还常派人将王若飞同志接到自己的住处，交谈至深夜。有一天，王若飞同志问傅作义先生：“你省政府对面影壁墙上写了《礼记》上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篇文字是什么意思？”傅先生答：“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也就是我的政治设施要达到的目标。”王若飞听后笑着说：“今天，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整个的贪污社会，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光凭你自己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

一九三六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傅作义派人将王若飞

同志护送到太原阎锡山处。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王若飞同志即回到延安。此后，傅作义将军与王若飞同志交成朋友，对王若飞更加钦佩。给干部讲话，常说：“你们看共产党的王若飞，那才是个人才哩！”后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傅将军每去重庆，王若飞同志总是找机会与傅将军会晤并赠送共产党的书报。

董老说这些话时，心情很激动。我知道他是让我理解没有北平的和平解放，就不会促使绥远起义。那么，北平解放的时代背景又是什么呢？傅作义将军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正确选择呢？为这些问题，董老又给我做了详细的介绍：

说来话长，早在一九四六年秋，傅作义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也就在这年十一月间，当董老接任绥远省主席，从张家口去绥远前，傅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同董老谈话时，就曾问过董老：“其武，咱们为谁打仗？”

这突然的问话，使董老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半晌答不上话来。

傅先生微微一笑，又推问道：“其武，你说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

董老想了一会，才说道：“你说为谁哩？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先生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说完此话，傅先生停了片刻，又问道：“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

董老回答道：“人家看见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

傅先生点了点头，又问道：“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董老答道：“青年学生是求进步的！”

傅先生这时习惯地又在地板上踱步，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停了好一阵子，又问道：“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呢？”董老说：“干脆不去。”傅先生问：“为什么哩？”董老沉思了一会，说道：“让我们到北平去，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老风趣地回忆说，他当时说这话时，还存在一些小封建思想，总认为把察哈尔绥远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到水落石出。那次谈话，董老记得很清楚，所以也给我讲的有根有叶，使我听得入迷，手中的笔也停下来，只顾听董老说，傅先生同他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的内心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的政权。

在这方面，我几次见董老时，他都谈得比较多。董老对傅先生非常钦佩，他说，“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傅作义将军在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形势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

我听到此处，便忙着问董老：“您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董老看我聚精会神，提着笔，等着往笔记本上写的样子，高声说道：“最大的阻力来自蒋介石。”随后，又给我详细介绍了当时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刚结束，蒋介石让傅作义将军参加南京政府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就用封官许愿的伎俩，拉傅作义将军南撤。

蒋介石先让他儿子蒋经国到飞机场迎接傅作义将军。随后由何应钦出面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然后蒋又邀傅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一方面大骂陈诚、熊式辉丢掉东北；一方面却对傅作义将军慰勉有加。当即向傅再次谈了他的安排：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华北部队完全南撤；此后所有军队都归傅指挥。

对于蒋介石这种安排的含意，傅作义将军的心中是清清楚楚

的。说到这里，董老还怕我听不明白，又给我讲了一段一九四八年春天，他去北平开会见到傅先生时的情景：开完会后，他便去北京西郊傅作义将军办公室辞行，他们之间谈了很多话，最后傅先生试探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头！”董老说：“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走到哪算哪吧。”傅先生当时沉默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反复在地上踱步，好象在想什么问题。过了一阵，才兴奋地告诉他道：“其武，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这句话当时董老说他还不太理解，事后才知道话中的内情，傅先生所以对他要说这句话，是在充分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得出的结论。所以，当时傅先生听了蒋介石这句封官许愿的话后，也不能当面断然拒绝，只好装出满有信心的样子，对蒋说：“我对华北局势，还不象别人所说的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蒋介石同意了傅的说法，才使傅作义将军安全返回北平。

我听后觉得还真有点传奇色彩，所以在长篇章回小说《绥远演义》一书当中也插叙了这方面的情节，目的是有性格地塑造这位人物。

我记得犹太作家辛格曾经讲过，一个人在进入创作时要具备三个条件：对于你所要描写的事物，1.你必须熟悉；2.你必须感兴趣；3.你必须相信只有你才能把它写好。这可以说是一句由衷的创作经验之谈。在这里，也请允许我既谦虚又适当地吸取点现代观念。学一学获奥斯卡奖的女演员的坦诚风度。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奥斯卡奖的发奖仪式上，荣获最佳女演员桂冠的演员上台领奖，并作了即席演说，只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既出人意料，又精彩之极。第一句话：“我当之无愧。”第二句话：“谢谢大家。”真是简短而耐人寻

味。全场热烈鼓掌。我认为我比较熟悉傅作义将军和书中的董主席，我对描写这两个人物感兴趣，所以，在董老接见我的几次谈话中，通过董老介绍傅先生情况，也谈了他当时思想活动和一些绥远起义的决定因素。为了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我再把董老接见我时就这些问题向我做的解释写在下面：

1、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傅作义将军参加完南京政府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安全返回北平一两天后，傅将军即通过他的女儿傅冬（中共地下党员）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派南汉宸同志来北平商谈和平合作事宜。当时，十二月十三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城。这个时候做为蒋介石还真不知道傅作义将军与共产党暗中有联系。他为了保住平津军事实力，蒋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到北京，要求傅作义将军先把部队分两路撤到塘沽和青岛，待机南撤。傅作义将军以种种理由，回绝了徐永昌。这个时候，北平城内的市民、工人、学生要求和平的呼声好高，蒋介石对傅将军的所谓“扭转华北局势的办法”，开始产生怀疑，揣测傅将军可能与中共和谈。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一、二天后，蒋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带着蒋介石给师以上军官的信（每人一封）来北平。郑表面上要大家听从傅作义将军的指挥，暗地里却与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秘密晤谈。郑介民对傅说：“部队南撤以后，我听你的命令和听委员长的命令一样。”对郑介民，傅作义将军仍象对付徐永昌那样，将他打发走了。蒋介石不久又派次子蒋纬国到北平，再次劝傅南撤。蒋纬国见傅时，转达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表示对傅信赖、倚重、盼傅率部突围。傅将军同样婉言拒绝。也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对傅将军也大耍政治手腕，说什么今后美国要把美援直接支持傅，他的太平洋舰队将全力援助傅。要知道此时傅作义将军同共产党之间的和谈，正在多方秘密进行当中。对于白吉尔的拉拢和许愿，傅将军心里很清楚。所以，巧妙

而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此等事应该向我中央政府去说。”接着又说：“我们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也办得了……”

2、当时北平城里的情况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这是傅作义将军进行“北平和平”的又一重大障碍。北平围城中，原来的布防大体是：天安门以东为蒋介石嫡系死党的第九兵团防守；天安门以西为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团防守。而傅作义将军所属的一个师驻防德胜门、西直门一带，两个师为总预备队。这种形势对傅作义将军走和平的道路可以说是相当不利。当时傅将军为了防止意外，能够达到顺利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他果断地将蒋嫡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嫡系部队。如北平城内的制高点景山，原由蒋嫡系十三军一个师据守，后来由三十五军十七师接防。很多事实以后证明，傅将军所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为胜利实现北平和平扫除了障碍。

3、北平和平后，董老于一月二十二日乘飞机来北平会晤傅作义将军。这在《绥远演义》一书第一回已经写到这方面内容。当时董老是要向傅将军请示绥远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当时傅将军是这样回答的：“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董老听后特别对“走人民的道路”这句话，傅将军是用特别郑重的语气重复地讲的。这时，董老才真正明白，半年之前傅先生对他说的“走人民道路”的意思。董老从北平回到绥远后，决心在傅先生的引导下，做好绥远和平的准备工作。他当即召集部队军、师、旅长级以上干部，地方厅局以上干部、省议会议长、高等法院院长、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谈了话，传达了与傅先生晤谈的情况，使大家对绥远走和平道

路有一个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傅先生在北平也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促进绥远起义的工作。他指定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三人，为绥远方面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大体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卜齐附近的古力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军队均不得越线。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立即恢复通车；恢复两地区商业贸易往来，通邮、通电。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双方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保持社会安定。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

4、有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傅先生又派随从参谋刘庸笙和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到绥远征求董老的意见，并传达毛主席“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的指示。后来，傅先生听说个别反对起义的军、师、旅长在归绥瞒着董其武主席，秘密开会反对起义时，傅先生觉得需要立即派老一点的高级干部帮助董其武主席控制局面，便让他的司令部老参谋长张濯清和原“华北总部”副秘书长王克俊等人来绥。行前，傅先生对他们入绥后如何开展工作做了详尽的交待。傅先生说：“有了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事情就好做了。不过绥远当前的局面很复杂，不是过去那个可以想象的样子了。”董其武将军是跟随傅先生多年的部属，对傅先生十分忠诚、信赖。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特别是在傅先生的《和平通电》发表之后，董即在归绥着手集训军政干部，开展“革新运动”，为和平起义制造条件，把已掌握的百余名特务集中起来“学习”，限制和打击了破坏活动，改组省级机构，改革人事制度，为走和平道路扫除障碍。傅先生特别对他们再次强调说：“入绥后要以董为主，帮助

其武做好内部统一认识的工作。”

5、国民党特务破坏绥远起义。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许，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等四同志途经归绥警备司令部门前时，三个便衣上前挑衅，恫吓。王等当众严词斥责了他们。慑于众目睽睽，特务未敢动武。行至慈善院附近，尾随而来的三个特务乘地旷人稀便动手行凶，先投了两颗手榴弹，又疯狂射击，致使王士鑫同志重伤牺牲，另一同志也受伤，造成了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严重事件。傅先生接到董其武将军的报告，立即转报薄一波同志，使党及时了解董的态度立场。

在接见快结束时，董老感动地又说了这样一些话，我都原原本本记下来了，觉得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当绥远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尚有个别问题急待解决时，傅作义先生受毛主席委托，和邓宝珊先生一起亲临绥远，及时而坚决地给他以支持。傅先生携带大批慰问金，慰劳了驻绥部队。并在董的陪同下，三次召集旅、师、军级高级将领和各族各界代表分别谈话，着重说明了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走和平道路是最正确的道路，对国家好，对人民好，对绥远地方好，对个人也好，前途是光明的。并讲述了毛主席的宽大照顾和既往不咎的政策，进一步消除了一些人头脑中残存的对共产党的顾虑，纷纷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奔向光明。

由于篇幅所限，董老在京接见我的几次情况不能一一细述，只大概回忆这些，以后如有机会再续写，就此止笔。

本文作者刘发林，系包头市文联组联部副主任，昆区政协委员

后 记

当我们编完本辑《昆都仑文史》最后一篇资料，将要交付印刷厂排印的时候，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和喜悦！这倒不是因为书编得好而满意。令人高兴的是，首届政协常委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每年征集、研究、整理、编纂一部《昆都仑文史》的重任，已经付之读者。当初，那种认为昆都仑区历史短，无史可写的片面论断，亦在事实面前被否定。

这是区委、区人大、区政府殷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区政协各位领导亲自抓的结果；也和全体委员与撰稿人辛勤劳动、积极供稿分不开。回顾三年来，每当我们在工作上、经费上，甚至在征集稿件中遇到难题的时候，区委书记李敬三，区长云德禄等领导同志，均及时指出方向并帮助解决。我会主席们如鲍振华、白玉、姜兴等，从始至终把文史资料工作放在政协首要议事日程之一过问，不但每次到会为文史资料征集提要求、谈意义、找线索，而且还亲手审定重要稿件。尤其前政协主席齐凤仪同志，在职时，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离休后，亲自撰写回忆录。没有这些领导的高度重视，我区文史资料工作，绝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本辑《昆都仑文史》，我们遵照领导的意图，围绕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结合昆都仑地区的具体情况，选编了“古代史料”、“昆区建区三十年”、“厂矿与科研”、“文教卫生”、“名人轶事”，“回忆录选登”、“人物传略”等栏目，

通过大量史实，以记载和歌颂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成就。

当然，由于在征集史料中还欠缜密，所载稿件线条粗细不一，有的资料内容，与已出的第一、二辑《昆都仑文史》中个别情节相近。我们想，这在作者撰稿中也是难免的。今后，将加强征集文史资料的统筹规划，仍把昆都仑建区前后，特别是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兴建初期，各条战线的重大事件及其有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创业的元老、英模、名人等，尽力“抢救”上来，载入史册。

限于我们编辑水平，本辑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不周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7年3月12日

责任编辑：姜 兴

责任编辑：杜守恒 卢月文

特邀编辑：王晋峰 马国庆 张 清 鲁玉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 8 4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